

前 言

資本主义工商业和資產階級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范例。在本书中,我們对过去十二年的經歷作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紹和分析。其中不免有錯誤和不全面的地方,希望讀者給以批評和指正。

本书于1958年10月完成初稿,經過修改,又于1961年改写了一遍。

本书是在許滌新、管大同同志指导下,由吳承明、方行、梅瑩、汪士信执笔写作的。在編写初稿中,还有方卓芬、高云樵、梁思达、黃仁勛、胡鉄文参加。全书經許滌新、管大同同志审閱、修改。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資本主义經濟改造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1962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1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and 它的特点	21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35
第二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 和政策	51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51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	67
第三节 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	78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	97
第一节 反对市场投机的斗争和国家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	97
第二节 调整工商业	108
第三节 “五反”运动	121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131
第四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	144
第一节 有计划扩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	144
第二节 工业和运输业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发展	156
第三节 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发展	166
第四节 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性质和作用	178
第五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190
第一节 个别公私合营的发展	190
第二节 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203

第六章 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212
第一节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212
第二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	226
第三节 公私合营企业的改革、改组和调整公私共事关系·····	232
第四节 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241
第七章 对资产阶级分子政治思想的根本改造·····	249
第一节 所有制变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249
第二节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工商界的整风运动·····	259
第三节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	270
第八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	286

第一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三千年左右期间，中国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中断了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道路。近代中国没有能够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自然经济解体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力图向中国伸展侵略势力、开辟中国市场的時候，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日趋腐败。为了防止人民和外面接触影响其封建统治和为了防范西方海盗商人的劫掠，清政府对外采取了闭关政策。这种政策是当时封建经济结构的反映。原来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

換。”^① 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結合着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对于外国資本主义工业品的侵入有一定的抵抗力。当时对中国进行貿易侵略的主要是英国。十八世紀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国本国的資本主义工业产品，沒有一样能在中国暢銷，它在輸华的商品中，60%到70%是靠印度的土产，主要是棉花。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对华貿易上經常处于逆差的地位，它們主要是依靠把大量的鴉片偷偷运到中国来攫取中国白銀，并用此来打开中国的門戶。

鴉片貿易使西方資產階級获得巨額利潤，但是对于开辟在中国的工业品市場效力不大，并且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事实上，資本主义侵略者要破坏中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障碍，总是要假手于政治强力，像他們在印度一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当作統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同时应用他們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經濟权力，为了要把这种小的經濟共同体破坏。……在中国，因为沒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所以[破坏的]程度还是更小。”^②

馬克思所指的这种政治权力，很快地就在中国建立起来了。1840年西方資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鴉片战争，1857年它們又发动了第二次鴉片战争，1884年又发动了中法战争。用武力打败中国以后，資本主义列强不但强迫清朝政府割地、賠款、开放商埠，并且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約，在中国取得了駐軍权、領事裁判权、內河航行权和其它許多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海关，壟断了中国的对外貿易和交通事业。

在这些政治、經濟特权的保护下，外国商品大量輸入。在八十

^① 毛澤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8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2—413頁。

年代开始时，洋货进口平均每年有七千八百多万海关两，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增至一亿七千多万海关两。进口除鸦片外，以棉纱、棉布为主，煤油、五金次之。在洋货大量倾销下，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首先是手工纺织业，逐步受到破坏。1880年到1890年，棉纱进口由十五万担增至一百余万担，许多手工织布就改用洋纱作经线。据估计，1890年时全国土布生产中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系洋经土纬。以后这一过程加剧，将纬线亦用洋纱。同时，洋布也逐步排挤着土布。其它一些手工业也受到破坏。例如，煤油输入内地，“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大量进口，“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①等。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起初丝、茶出口急速增加，刺激了国内丝、茶的生产。其后豆类、花生等出口也不断增加，刺激了国内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但是，例如丝的生产，过去往往是养蚕、缫丝都在同一家庭内进行，现在则多是將茧直接运往上海等地的丝厂，由外国洋行监制出口。茶、豆、花生等方面也有类似情况，外国洋行设有制茶、榨油等工厂，直接收购农民的产品。这样，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就逐步被破坏，中国愈来愈深地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逐渐变成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给地。

1894年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投降了外国资本，整个封建经济和封建的上层建筑成为外国资本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输出逐步压倒商品输出而成为重要的侵略手段。结束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获得了利用中国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设厂制造的特权。此后，各国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开辟商场变为划分势力范围——占领港澳，割据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

租借地，攫取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特权等。它们到处设立银行、工厂、洋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又通过大量的军事政治借款，进一步支配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权。

1931年起，帝国主义又开始了把半殖民地中国进一步变为殖民地的过程。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在日本垄断资本统治下，东北的经济完全变成日本本国经济的附属物，为它提供原料、半成品、指定的农产品和劳动力。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全中国的战争。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最后才在苏联出兵的帮助下，把日本强盗赶出去。但接着，美国强盗又独占了中国。1946年美国 and 蒋介石政府签订了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全部中国的领土、领海、内河、领空都向美国开放，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勘察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

在中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原来的自然经济不断地遭到破坏，基本上瓦解了。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商品性生产在农业中日益发展。而农民受着租税和债务的重压，甚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口粮。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产品的出售部分一般已占一半左右，有些区域高达60%到70%；农民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有三分之一左右系购自市场。市场对农民的支配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直接间接波及到农民身上来。三十年代以后，在国内外种种剥削和压迫下，我国农村经济处于破产状态，农民到处流亡，人口和地主阶级的资金向大城市集中。传统的手工业也日益衰落，手工业者大批失业，变成无产者，勉强维持的也陷于债务，并受商业资本的支配。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的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一些使用机器的“商办”工厂出现。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将在下一节专论。

但是,資本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它们侵略中国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是违反它们的願望的。这只是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相反、阻碍这个变化的一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封建剝削制度的延續 为了侵略的必要,外国资本主义首先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把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供给封建统治者以軍火和貸款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扶植封建軍閥、制造割据局面以便利它们瓜分中国。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剝削形式——封建土地制的剝削、商业和高利貸的剝削以及各种奴隶制残余的剝削,并力图使之永久化。因此,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制度剝削的根基——

^① 毛澤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0—621頁。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直到解放以前，我国广大的农村中，仍然是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残暴的剥削制度。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帝国主义者还竭力扶持着那里原来的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可以这样说，本来已经濒于崩溃的中国的封建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扶持，又“僵尸复活”了。只是它已不再是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被卷入国际资本市场，成为一种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了。

解放以前，在我国农村中，大约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70%以上，而占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占有全部耕地的不到30%。农民每年要向地主交纳大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地租形式以实物为主，劳役地租仍有相当地位，货币地租始终没有多大发展。地租之外，又有押租和预付租，以及由佃户代负差徭赋税，提供无偿劳动和家庭服役，各种勒索等更为原始的剥削形式。土地占有愈来愈集中，经营则愈来愈分散，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农场的平均面积不断缩小。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绝无仅有，仅有的所谓农林公司或垦植公司，大都只是买卖土地的机构，或把土地分租给佃农。富农经济不发达，并且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带有半封建性。这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村中迄未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农牧业产品出口的品种不断地增加，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903年的26.8%增为1920年的36.4%，1930年的45.1%。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日益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许多农产品价格都是由外国洋行垄断，像棉花与烤烟等并且有外国厂商直接在农村收购。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 为了侵略的必要，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许多中国未曾有过的近代化企业。最早是银行、轮船公司、洋行和一些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厂、出口品加工厂以及主要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服务的企业等。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种

投資已經具备了資本输出的性質，不仅是为商品貿易服务，而主要是为了直接剝削中国工人的剩余劳动。帝国主义銀行的性質也变了，它不再是中介人，而与产业資本合一，成为在中国进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这时候，外国資本的数量迅速增长，投資范围也日益扩大。总的說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仍以金融、貿易、交通運輸等商业性的掠夺資本为主，投資于生产者所占比重很小。这是因为中国是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的半殖民地，只有在它們的統治比較穩定的地方(例如 1931 年以后日本之在东北)，外国壟斷資本家才大量地投資于生产。但是，仅这些已足以控制中国的工业了。在抗日戰爭以前，帝国主义資本壟斷了中国发电量的 76%，煤产量的 70%，鉄产量的 95% 以上，棉布产量的 64%，卷烟产量的 58% 和絕大部分公用事业。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虽然是資本输出的性質，然而它們实际运用的巨額資本，却大部分是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不仅获取了最大限度的資本主义利潤，它們还通过不等价交換的殖民地貿易，强制輸进鴉片和軍火，勒索战争賠款，霸占房地产和矿区等，进行着原始积累的掠夺。它們又利用发行鈔票、发行公司債、銀行存款以及引誘中国人入股等，吸收中国的資金，变为它們的資本。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不仅是一种資本输出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資本掠夺制度。

帝国主义資本又不仅是高額利潤和資本的掠夺者，它首先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服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銀行、洋行和工厂，并不是普通的資本主义企业，而是一种殖民主义的特权机关，它們执行着控制中国經濟命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工业、阻止中国現代化的任务。許多大的企业不仅具有經濟特权，还具有財政、政治乃至外交、軍事的权利。像英国的汇丰銀行、日本的南滿

铁道株式会社，都曾經成为中国的太上政府；后期的“美援”和执行“美援”的机构，尤其是这样。帝国主义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造成中国經濟的对外依賴性，实现“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計劃，或者把中国变成“美国工业的边緣”。因此，帝国主义資本在中国的增长，絲毫不表示中国經濟的发展和生产的現代化；相反，它只說明中国經濟日益淪为国际壟断資本的附庸，中国民族工业日益受到压迫和限制，中国社会积累日益用于破坏中国工业化的目的。

根据主要是外国資产阶级提供的材料估計，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包括企业财产、政府借款和房地产，在二十世紀开始时約合八亿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到十七亿美元，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又增加到近四十一亿美元；其中企业投資，即以在中国開設分公司或設立企业形式出現的“直接投資”，分別占总数的58.9%，58.5%，64.5%。此外，还有巨額的“庚子賠款”，其未付部分要由中国負担利息，实际也成为帝国主义剝削中国的資本。

投資的內容，金融、貿易、交通運輸(包括鐵路借款)三項合計，1914年約占41%，1936年約占50%；工礦等生产事业投資，1930年以前只占百分之十几，1936年連日本在东北的以掠奪中国資源出口为目的的工礦業投資合計，也只占20%左右。其余部分为房地产、一般政府借款及其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外資的主要形式变成“美援”，即美国政府对蔣介石反动政府的“援助”。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8年，这种“援助”估計达六十亿美元，主要是軍事“援助”、財政借款和美軍在战争中的“剩余物資”。美帝国主义以此武装蔣介石的軍隊，对中国人民进行內战。

九十三家在华外商企业的公开帳面利潤平均率是：1934年13.2%，1937年18.4%，1938年20%。据估計，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国家輸入中国的企业資本合十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輸入的政府借款合七亿美元；同时期，自中国汇回去的企业利潤合二十亿零八百万美元，汇回去的借款本息合十四亿二千九百万美元。

买办和官僚资本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又在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培植了为它们服务的官僚资本。早期的买办，主要是由封建社会的旧式商人和清朝特許专利的广东对外贸易商人转化而来的，其中很多是原来鸦片走私贩子。早期的官僚资本家，则主要是大地主阶级中带有买办倾向的一些当权派，即所谓“洋务”运动的主持者。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殖民地化，当权的反动军阀和大官僚日益买办化，同时一些买办也逐步爬上统治阶级地位，从而形成了代表买办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分别隶属于自己的主子——各个帝国主义。他们办了一批资本较大但很少获得成绩的近代化企业。他们替他们的主子，从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便利其剥夺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它人民大众。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叛变革命、建立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后，又凭借这个政权的力量，利用战争、公债、赋税、专卖、金融和商业投机、贸易和外汇管制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发展起来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①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急速发展，战后达到了最高峰。解放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53页。

业、交通、金融、貿易等近代化企业資本的 80% 左右。

金融和商业投机，是四大家族聚斂他們的資本的最主要和最先下手的方面。1928 年蔣介石反动政府一成立，就設立了中央銀行，同时控制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随后又設立了中國農民銀行及其它許多銀行、銀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利用銀行集中資金和外汇，发行紙幣，承購差不多有 50% 利潤的蔣介石政府为进行內战而发行的公債，并从事种种金融投机。1935 年实行“法幣政策”，利用紙幣把全国的白銀攬为已有，而把“法幣”变成英鎊集团的一員，后来又变成美元集团的一員，以美元为“法幣”的本位，并为此大量举借外債。这就完成了中国貨幣的殖民地化，使中国的金融財政成为外国壟断資本的附屬品。以“法幣”为依据，濫发鈔票，造成延續十几年的恶性通貨膨脹，瘋狂地掠奪人民財富。据估計，在 1948 年发行“金元券”的半个月內，就掠去了黄金和外幣合一亿九千万美元。

金融独占支持了四大家族的商业投机，战争、內外債、外汇、黄金、地产、商品囤积、貨幣贬值等，都是进行大規模的投机手段。1936 年設立“农本局”，統制粮食、棉花的运銷；以后又实行貿易統制，对蚕絲、茶叶、錫、錫等重要物資的貿易进行壟断，陸續成立了各种壟断出口貿易的公司。1941 年又实行专卖制度，盐、糖、烟、酒、火柴等都由四大家族独占經銷。抗战末期，又設立了許多以“民营”形式出現的貿易公司，代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傾銷商品。抗日战争中开始实行田賦征实、征借和征購，成为掠奪农民的最重要手段；在抗战前开始的“农貸”，即四大家族的高利貸事业，也更加发展起来。

官僚資本完成了对金融財政的控制以后，就运用政权的力量伸乎到工业方面来。1935 年設立“資源委员会”，依靠美、德、英等帝国主义的資本和人員設厂开矿；又成立“工矿調整委员会”，用接管、加股等办法吞并民族工业。1935 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經營的工业企业（不計铁路机厂和电厂）还只有三十五个，雇工一万七千三百一十二人，到了 1944 年，已增为一百四十六个，雇工五万三千四百一十七人。抗战胜利后，又把敌伪的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工厂收归“国

有”(其中有10%后来发还或标卖)。到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已经壟断了全国发电量的67%,煤产量的33%,钢铁产量的90%,石油产量的100%,有色金属产量的100%,水泥产量的45%。四大家族的其它机构还壟断了全国纺织设备的38%,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交通运输方面,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輪船吨位。

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国家壟断資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壟断資本大抵是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般壟断然后进入国家壟断的。中国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则正是利用了工业落后和自由資本主义的不能得到发展,由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它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中小资产阶级,而直接造成国家壟断的。这种国家壟断資本,除了具有一般壟断資本的壟断性、腐朽性或寄生性以外,其主要特征是具有深刻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实际是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代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而在旧中国的条件下,壟断資本的形成又必然而且只能是以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为其支柱。四大家族,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总买办,是中国最大的农奴主和高利貸主。这种壟断資本,又表现着浓厚的軍事性质。战争一向是四大家族聚斂财富的捷徑,他们发行的公債也极大部分是投之于内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依靠政治强力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軍事的国家壟断資本,反过来又成为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基础,成为蒋介石集团反动、卖国和好战性的主要经济原因。

官僚資本的这种性质说明了,它虽然是以近代化大企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并不是反映中国国民经济和中国資本主义的发

展，恰恰相反，它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破产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落。在后期，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喧赫发展，则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反映了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排挤了英法等帝国主义、独占了中国这样一个事实。

为了侵略的必要，使中国的封建经济殖民地化，建立外国资本的大企业，造成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这就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

经济成分和生产关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除了封建制经济和原来从属于它的个体劳动者经济以外，又加入了帝国主义资本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此外，有些边远地区还有残存的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公社制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原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但一般除了一种是主导的或者新兴的经济成分以外，其它都是从属的、残存的或者过渡性的经济成分。在旧中国，则外来的帝国主义资本和它的代理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占有统治地位；但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并不是作为一种残存的或过渡的经济存在，而是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支持、保护和利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比重。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则受到压制，居于不重要的地位，并且不可能发展和代替其它经济成分。这种经济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4页。

结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形态。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的情况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①又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②

由于有了现代性工业，在我国就除了原有的封建的和个体的生产关系之外，又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各有其特殊性，它们的性质和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不同的。帝国主义资本的企业，代表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国际资本在殖民地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归外国垄断资本家所有，而被剥削者是中国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它基本上是一种买办的生产关系，又带有深刻的封建性。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除具有垄断、腐朽和寄生的特性以外，又都是建筑在军事政治的强制力量之上，并且以落后的封建剥削制度为支柱的。它们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82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31页。

都是极端反动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制度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束缚、阻碍和破坏的作用。

但是，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都是高度集中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样，它们就又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①

至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则基本上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同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这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有推进作用。

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

原来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后，地主阶级更加反动和腐朽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成倍地加重了；同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最后也都落到农民的肩上。因此，不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起来，又产生了日益激化的农民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中国经济绝大部分是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个体手工业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农民相似），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主要问题就是解放农民的问题。农民是这个社会中创造财富的基本阶级，也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②。这就决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32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78页。

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实质上就是解放农民的革命的斗争。

事实上，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农民反对外国资产阶级侵略和本国封建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并形成像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震惊世界的巨大规模。但是，由于农民阶级是同小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具有狭隘性；如果没有同现代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先进阶级的领导，这种农民革命不会成功。

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又出现了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出身主要是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他们都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变成资本家的。另外也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逐渐上升为资本家。

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又和国内的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他们是当权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阶层，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典型的代表。大资产阶级是反动的阶级。但是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子的指使，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代表中小资本主义成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两面性，是一个中间的、动摇的阶级。对这个阶级的特性，将在第三节中分析。

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而来，并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企业和其它经济事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更长，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最早出现的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上的海员。以后，在外国资本的工厂中，清朝洋务派建立的工厂中，和稍晚的民族资本的工厂中，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工人。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除码头工人外，中国的产业工人已有四万至四万五千人左右。远在1879年，就发生了上海外商船厂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和外国监工殴打工人的罢工斗争。1882年开平煤矿工人，1883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都曾举行罢工斗争。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五十万至六十万；到1919年，大约已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这一时期，工人所受到的压迫加重，生活更困苦，罢工斗争也愈来愈增多。从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起，到1911年，工人先后举行了一百多次罢工，而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出现了一百三十多次罢工。同时，他们开始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工人们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开始组织了一些较为原始的工会或其它工人组织。这些，都说明中国工人阶级正处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的阶段。经过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完成了这个过渡。

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特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有下列特出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

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①

由于有了新的阶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出现了新的形势。在这个社会中,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代表这个社会中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即束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际殖民主义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买办的生产关系。他们建立了这个社会最反动的政治上层建筑,即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集中地表现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也就是人民大众同这三个敌人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其它社会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居于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半殖民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89页。

地和殖民地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但是，在这个革命斗争的前八十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的道路，没有抵抗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所有的斗争都失败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这个最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从此，中国的革命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革命的这个规律，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这个社会阶级矛盾的集中的反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是这个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民是这个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必须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农民，这两个阶级结成亲密的联盟，是整个革命力量的基础。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他们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反对三大敌人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他们有两面性，是无产阶级的动摇的同盟者。

这个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①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311页。

在中国的统治,消灭买办的和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人民民主革命阶段,并不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所以这个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不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它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不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它的前途,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它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民主主义革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我国的革命已是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到它垂死的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已经汇成一个洪流,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在已经有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我国,这种性质的革命,就必然是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了。毛泽东同志曾正确地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①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像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只反对一个封建主义,而是要同时打倒三大敌人,包括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敌人具有庞大的武装,实行着极端专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83页。

制的反动統治，人民只有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才能取得政权，此外别无道路。又由于中国是个政治、经济、文化上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革命战争必须首先在反动統治比較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从小块的少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大块的多数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而不可能一举在全国取得胜利。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主要是解放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的問題，它又必須是在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动员广大农民，并克服其狹隘性，实行全民大联合，而不是依靠少数人进行軍事冒险所能取得胜利的。领导这样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人民武装的大革命，絕非軟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所能胜任。历史証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的要求，但他们曾經对清朝統治者有过幻想，对帝国主义有过幻想，对蔣介石有过幻想。他们即使参加革命的时候，也不願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更不願意彻底反对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他们是自私自利的阶级，他们十分害怕群众运动。

毛澤东同志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狹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①

^① 毛澤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7頁。

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and 它的特点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由一部分商人、地主、买办投资建立近代化工业而开始发展的。随着市场的扩大，也逐渐有一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积累了财富，开办一些小工厂和手工业工厂。当时，它们被称为“商办”企业。

到十九世纪末，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这种商办企业大约已有一百二十二家，资本共二千二百七十余万元，范围包括采矿、缫丝、纺织、机器修造、印刷、制茶等。进入二十世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1900年到1911年，在史料上有记载的不下二百八十六家，资本共六千三百四十余万元。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一产生时就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外资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和清朝官僚资本的企业又都凭借它们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排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它的发展是缓慢的，也是不正常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洋货进口大为减少。国内，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处于群众反帝斗争高涨中，1915年掀起了反对日本强迫中国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运动，1919年又掀起规模空前的五四运动。这样，就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唯一的繁荣时期。从1912年到1919年，八年間新建的厂矿有四百七十余个，资本近九千五百万元，超过过去四十年的总数。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仍限于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和面粉工

业。从1912年到1920年，华商紗厂的紗錠由五十万枚增加到八十四万枚，織布机由二千三百台增加到四千三百台；染織厂、針織厂各增加了十余家；上海絲厂的絲車由一万三千多部增加到一万八千多部。同时期，全国机器面粉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二十四家，产粉能力从每昼夜四万五千余袋增加到二十二万余袋。

在大战期間，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就趁机扩充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数目增加了两倍多，紗錠增加了一倍多，其发展速度超过中国紗厂。战后，欧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它們为了补偿在战争中的损失，更加重了对中国的掠夺。从1920年起，中国的民族工业，除了在大战期間筹設的几十家紗厂陸續开工，紗錠仍繼續增加外，其余都逐漸消沉。1923年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出现了暫时的相对稳定局面，資本輸出規模空前扩大。国内，則連年軍閥混战，交通阻滯，捐稅繁苛，农村购买力下降。1928年蔣介石反动政府成立后，又日益加重了官僚資本对中小工商业的压迫。随后，又受到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危机和美国白銀政策的影响，日本侵略东北和霸占华北市場的打击。这样，民族資本主义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和不断发生危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許多民族資本的工业陷于衰退乃至破产的境地。輕工业中如卷烟、火柴等都大为衰落，尤以制絲工业为甚。重工业情况更坏，冶鉄业除一、二厂偶有生产外全部停頓。过去比較有点基础的如棉紡織工业这期間仍有些增加，但經常陷于困难，成为帝国主义資本和官僚資本吞噬的对象。从1921年到1936年被外国資本收买或因借外債而被接收的华商紗厂有十八家，紗錠六十八万三千九百枚，还有一些紗厂不得不借用官僚資本銀行的貸款并受其监督。另外，也有一些新的工业部門，如酸碱工业、橡胶工业、染料工业等掙扎着創建起来，有些日用品工业有所发展。总的

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迄 1936 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厂数和设备上虽然有所增加，但新开设的多属小厂和工场手工业，它们的平均规模愈来愈小。并且，在生产上更多地依赖外国原料，或为进口半制品加工，乃至过去的一些大厂也放弃全能制造而变为进出口货的加工厂；在经营上则不断出现产品滞销和价格危机，经常陷入财务困难。这期间，外国商品进口大量增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資也迅速增长；无论在市場上或在生产上，民族工业的地位都大大削弱了。例如，全国棉紡工业中外国資本紗厂所占紗錠的比重，从 1921 年的 33.6% 增为 1936 年的 46.2%，所占織布机的比重，从 1921 年的 41.5% 增为 1936 年的 56.4%。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商品輸出有利或矛盾不大的金融业和許多商业行业，却在市場投机的旋风中畸形地发展起来。1927 年至 1936 年，中国資本的銀行由五十二家增长为一百零五家，保險公司由二十几家增长为四十家，替外国洋行做轉手交易的进出口商和百貨业等零售商，也都有发展。这种种情况，反映了中国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迁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留在敌占区的除在上海英、法“租界”内开设的一些企业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一度畸形发展外，一般都遭到极大的摧殘。后方各省在抗战初期，由于軍需民用的扩大，民族資本的工业曾有一度发展，从抗战开始到 1942 年在国民党政府登記的新設工厂有二千八百零九家，大都是小型工厂和手工业工厂。但不久，由于官僚資本的压迫和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下人民的购买力日益下降，这些工厂就陷入困境，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大部分都停閉。从抗日战争結束到解放前夕这一段时间，在美帝国主义商品傾銷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恶性通貨膨脹政策的夹击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瀕于全部破产的境地，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也受到严

重的打击。

六七十年来，民族资本主义经历着艰涩曲折的道路。它有了某些发展，但力量很弱，始终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除了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性以外，又有它本身的许多特点。

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进步作用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当然也是建立在私有、剥削和阶级对抗之上的。但是，它和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其它剥削形式有所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机械化的大生产，至少是具有了劳动社会化形式和一定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同封建制度下的个体生产和家庭手工业比较起来，它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形式，具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民族资本主义商业，虽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还具有较多的对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封建性的剥削，但比起封建制度下的商业和高利贷剥削形式来，也仍然是进步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商品的流通有较高的效率。至于同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比较，则如前节所说，这两种剥削形式，虽然是建立在近代化大生产之上的，但它们都是殖民地的垄断资本，代表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而民族资本基本上是自由资本主义，其作用与之相反。因此，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生的力量，是当时国民经济中比较先进的经济形式，代表着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矛盾。民族资

本主义工商业为了打开出路，也就不能不同帝国主义进行某些形式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有利形势的支持下，有时也取得一些成绩。例如：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抵制英日货的运动中，民族资本曾建立了一些日用品工业，打击了某些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独占（个别的次要的外国商品甚至被排出中国市场）。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中，民族资本曾经力图扩展一些机器制造业，以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在其后的抗日高潮中，它们又力图向基本化学工业方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乃至部分金融业，也曾经要求脱离外国洋行、银行的控制，建立自己的国外贸易联系和自己的储备金库。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本身力量过于薄弱，它们的这种斗争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种努力，对整个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利的。

事实上，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它一出现后，就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存在的。它之所以同帝国主义的侵略相对立，是基于资本主义本身追求剩余价值和竞争的内在要求而来的，但客观上，这正是它区别于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之所在，反映了它的民族性特点。有些资本主义企业，是在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实业救国”的口号下建立的。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来说，“实业救国”的思想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当然，这个口号是一种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而希冀中国工业化的幻想，因此，对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来说，它又是一种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我国封建社会中原有的其它经济成分，或由于本身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或由于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生产方式，都不能成为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抗的经济力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以前，是唯一的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它

的发展，与当时中国人民在经济上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有一致的一面。

总之，在这一方面，即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中国的封建落后方面，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进步因素，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可资争取和应当利用的一个重要经济力量。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有它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它本身十分软弱，不能不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助手。并且，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同三大敌人的竞争中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它就特别加强了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对小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某些形式的剥削。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性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性首先表现于它在发展上“先天不足”，而又“未老先衰”。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发展起来的。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准备阶段，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它们又大部分没落和破产了，不能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资本的原始积累，即强力剥夺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的果实，主要是落入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官僚手中。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勒索赔款，通过鸦片走私和不等价交换的殖民地贸易，通过在中国设立银行和其它企业，吸取了极大部分社会积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受帝国主义支持始终占优势地位，土地、商业、高利贷利润很高，又吸引了一大部分社会资金。这些，都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的特点。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小的和中等的企业，生产和经营分散，设

备和技术落后,手工劳动占很大比重。资本组织形式也是以独资、合伙为主,股份公司很少。企业资金不足,捉襟见肘;有的建设厂房和设备后就再没有流动资金,以致停产;有的在开办的时候就负了重债。由于根底薄弱,经不起风险,许多企业开办不久就夭折了。

解放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根据1953年统计,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雇佣职工在五十人以上的工厂只占工厂总数的3.8%,五百人以上的只占0.1%,而十人以下的占69.7%。又据1954年统计,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79.1%的户数是工场手工业户,它们的产值占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28.6%。在商业中,分散落后的情况较之工业有过无不及。在1950年,私营商业户中大约有96.7%是个体经营的小商小贩。又据1955年统计,私营商业户中(进出口商除外)雇佣职工在二人以上的只占2%,雇佣九人以上的只占0.15%。

根据1953年二十个主要行业的六千九百四十一家私营较大工厂的统计,独资组织的占38.1%,合伙组织的占53.8%,公司组织的占8.1%。

根据1936年八十九家较大私营工厂的统计,它们的负债平均占资产总值的39.4%;1946年上海十家纱厂的负债平均占资产总值的80%。

根据1953年调查的材料,在二十个主要行业的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八家较大私营工厂中,按它们设立的年龄计算,四岁以下的占40.2%,七岁以下的占60.0%,十六岁以下的占81.6%,满二十五岁的只占8.2%,满四十岁的只占2.4%。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一般的内在规律,也有着资本积累、积聚和集中的发展,有着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和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要求。但是,它们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容许它们正常地发展。剩余价值的分配,经常要以大部分乃至极大部分,通过商业利润(特别是在取得生产资料时)、利息、捐

稅和其它形式，轉交給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資本；一部分工商业利潤，并且还流回土地。資本的集中，时常只是資本系統的联并，而无能力扩大原来的生产单位和生产規模。尤其是，資本积聚和集中到一定程度，往往就成为帝国主义資本吞噬的对象，或为官僚資本的財团所控制。扩大再生产，不仅受市場，特别是外国商品壟断的限制，还要受生产工具和原料的限制，这些，也都是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之手。另外，它們还受到反动統治者軍事、政治强力的压迫，受到侵略者和战争的破坏。因此，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始終未能排除个体手工业，始終未能完全代替家庭手工业，更完全没有能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而促使其資本主义化；就是在工商业方面，也是局限于狭小的范围，許多重要产业部門根本无法插足。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始終未能成为国民經濟的主要形式，并且，它在国民經濟中的地位反而下降。二十年代以后，它就走上了下坡路。它的平均規模日益縮小，生产更加分散，最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1932年，上海五家华商紗厂，平均每包二十支紗的剩余价值是四十一元，其中分割給官僚資本的稅款和利息为二十三元，占56.1%。与上海的日本紗厂比較，每包紗所負担的捐稅和利息大于日厂五倍半，商业費用大于日厂三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36年的总收入中以捐稅形式分給官僚資本的竟达八百八十一万元，分給商业利潤和金融業利息一百八十万元，公司純利十三万元，占1.2%。

棉紡工业是民族資本中最有发展和資本較大的工业。从1897年到1936年，被帝国主义兼并的紗厂有二十三厂，七十七万紗錠。开平、灤州、撫順、門头沟、焦作、井陘六大煤矿，都是中国資本(包括清朝政府資本)創辦，在經營有一定規模后，都被帝国主义强占或实行“合营”。“火柴联营”是民族資本集中的比較具有規模的一个

組織，但它一成立时就有瑞典資本参加，后来变成了“中日火柴联营”。荣宗敬、荣德生棉紗、面粉集团是民族資本中最大的資本集团，这个集团同样受到英、日資本的侵襲，它的一个紗厂曾一度被英国資本拍卖，荣德生本人并曾被蔣介石派人綁架，勒索巨款。民族資本最大的輪船公司民生公司，最大的卷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先后为官僚資本所控制。截至1937年上半年，官僚資本的銀行、銀团利用債務关系侵入了十一家民族資本的紗厂，又直接投資經办了四家紗厂，共有紗錠三十五万錠。

根据北洋軍閥政府公司登記的統計，資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公司，1912年占公司总数的15%，1914年占19%，1916年占16%，1918年占22%，1920年占34%。这期间投資的規模有扩大的趋势。根据国民党政府工厂登記的統計，每年新設工厂(合于“工厂法”的)的每家平均資本額，1928年为四十七万一千元，1929年为三十五万六千元，1930年为三十七万八千元，1931年为二十四万五千元，1932年为十六万八千元，1933年为十五万九千元；其規模趋向縮小。抗日战争期間，在国民党統治区設立的工厂的每家平均資本額，折合战前的币值，1938年为四十一万四千元，1939年为二十八万九千元，1940年为十万三千元，1941年为五万三千元，1942年为九千元，1943年为一万四千元，1944年为六千元；其規模更迅速縮小。

生产各部类間的不均衡 民族資本主义經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經濟体系，它沒有自己的重工业基础，也沒有相应的原料生产基地，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比例极不均衡。1949年，民族資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总值中，消費品占到81.5%，生产資料只占18.5%，其中机器业只占1.4%，并且主要是做装配修理业务，基本化学工业很少。因此，在解放前，民族資本主义工业經常要依靠帝国主义供給机器設備，并且依靠帝国主义供給許多重要的原材料。国产原料，也有不少是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如日本紗厂控制着中国长纖維棉花的运銷，英国

卷烟厂控制着烤烟的种植。钢铁的生产全部被帝国主义掌握，煤和电力也基本上是由外商经营。这种情况，也造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地域分布的不合理，它们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控制的沿海大城市，远离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解放前，上海华商纱厂使用的纱锭，有96%是外国制造的；织布机有72%是外国制造的。上海面粉厂中，外国制造的磨子占80%，其中大型磨占97%，电动机全部是进口的。抗日战争前，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所需的原料，全部依赖进口的有八十五种，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有三十九种；面粉厂所需的小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来自美国，毛纺厂所需羊毛有82%仰给国外。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一段时期，纱厂所用棉花，卷烟厂所需烟叶，以及工业的包装木料、纸料，也都依赖进口了。

根据1953年对雇工在十人以上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厂的调查，上海、天津、广州三地占全部雇工人数的39.7%，占资产总值的66.2%，占生产总值的58.9%。大工厂更是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很少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

这种情况，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剩余价值的积累为根据的，而“剩余价值能转化为资本，只因为剩余生产物（剩余价值就是它的价值），已经含有一个新资本的各种物质成分”^①。在民族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存在这种条件。它必须依赖于外部，在当时条件下又必须依赖于它的对手帝国主义，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转化，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乃至才能补偿生产中生产资料的消耗。这种情况，对于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任何社会经济来说，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都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社会生产力的真正发展，在任何制度下都是表现为：用于生产资料生产的那部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26—727页。

社会劳动比用于消费品生产的那部分社会劳动增加得快些。至于资本主义，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没有担起这个任务。

民族资本主义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完全没有地位，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富农是资本主义在我国农业中的主要形式。但我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富农约只占农村户口的5%左右，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反而下降。尤其是，我国的富农大多出租土地，具有半封建性。富农经济同在农村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主经济密切结合，而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很少直接的渊源。无论富农经济或地主经济，都是以手工生产的小农业为基础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不能给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原料，在品种、规格、运销、价格上都要受封建经济的限制；资本主义产品的销售，也要受市场的限制。更不用说由于封建割据、关卡厘金、军阀混战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摧残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一般是作为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结果而实现的；或者是，使土地所有权“完全从统治和服从关系解放出来”，“脱却了以前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品和混合物”，而“取得纯粹经济的形态”^②（从而使地租变成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无法实现这种变革，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也就没有可能。

产业资本和商业、金融资本的不协调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畸型发展，和工业资本的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5—806页。

比例很不协调。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一部分是原来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一部分是随着外国商品的侵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建立的。它只是部分地为民族工业资本的商品流通服务，而很大部分是为外国商品、封建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品的流通服务；这是它数量相对庞大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农村经济破产，资金集中都市，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生活日益奢侈淫靡，市场投机日益猖獗，又都造成商业资本的畸型发展。尤其是在后期，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以通货膨胀作为掠夺人民财富的手段，物价上升如脱缰野马，商品囤集和金銀、外币的买卖成为最有利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破坏，大量资金转入市场投机，商业资本更形膨胀。民族金融业资本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来封建社会的钱庄、票号，一部分是后来建立的银行。银行资本发展很快，但这种发展，主要也不是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国商品倾销和金融、公债投机活跃的结果。

根据上海私营商业重估 1950 年底的财产的结果，在九十三个行业八千五百二十三家重估户的资产总值（大约占这些行业全部业户资产总值的 75%）中，以经营进出口商品为主的十九个行业的资产占 60.3%。在上海，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以外国洋行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私营商业有二十一个行业，一般都是资金较大的批发行业。又，专经营出口的有九个行业，一千四百多户，它们的商品在解放前也主要是卖给外国洋行。天津、广州等沿海大城市情况也相似。1950 年上海、天津、广州三个城市的私营商业约占全国私营商业销货总额的三分之一，批发总额的 36%。

另一部分私营商业，主要是经营农副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在解放前多半是和地主经济结合在一起，许多地主兼营商业，许多大商人又兼作地主。这种商业资本又很多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商人经营实物（主要是粮食）贷放和货币贷放。根据 1934 年二十二个省七百七十一一个市县的调查，农民的借款中有 38.1% 是借自

商店和商人，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内地省份更超过50%。这种商业资本又通过种种方式控制手工业生产。在采矿业中，手工窑户差不多全是为煤商和五金商生产，土布、土纸、山货、陶瓷、鞋帽等生产也是这样，某些行业中并有由商人“发原料收成品”的制度。

1936年我国有私营商业银行七十四家，钱庄约一千五百家，另有典当约五千家。这时银行的投放中，投放于工业的不过占12—13%，投放于商业的占30%左右，而投放于公债和政府机关的占40%以上。钱庄的资本主要是地主、富农、大商人的个人积累，较少利用社会积蓄，其资金主要用于商业。1946年，商业银行增加到一百九十余家，它们的业务主要是从事物价投机；钱庄和典当则衰落了。另外，又出现很多“地下钱庄”，从事投机活动。

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关系的不正常不只表现在数量比例上，还表现在商业之时常支配工业生产，商业占用工业资金，某些商业经营外国商品有利时排斥对民族工业产品的经营，银行拒绝对工业投放或对工业实行高利贷式盘剥，商业和金融业的利润高于工业利润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违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规律的。它们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资本之大部分处于流通过程和货币形态这一事实，说明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整个旧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因为，“生产越是不发展，与一般投在流通中的商品的总额比例而言，商人资本的总额就会越大，……。所以，在这种不发展的状态中，真正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是在商人手中”^①。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点是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分不开的，它们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和掠夺中国的结果。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 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剥削工人，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6页。

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本身既然十分落后，又处在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下，资本家要同他们竞争并获取利润，就尽量从对工人群众的残酷剥削中去找出路。工人的工资，多的不及外国工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少的不及十分之一，一般只有十分之一、二。工作时间很长，一般每日十一小时，多的十二、三个小时，有高达十八小时的。为了加强剥削和便于统治，工厂大量地使用女工和童工。劳动条件更是极其恶劣，厂房狭小，空气污浊，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大多数工厂没有宿舍和食堂，没有医疗设备。

资本家为了争夺利润，还要经常借助于各种封建性的乃至更原始的剥削形式。例如：很多工厂和矿场中实行把头制、包工制、养成工制、包身工制等。在把头制和包工制中，工人一方面受资本家剥削，一方面又要受封建把头和包工头的剥削。养成工制是旧学徒制度的残存形式，养成工在学徒期满后规定要在工厂服务若干年，在这期间，工资大大低于一般工人水平。包工制实际上是一种卖身奴隶制度，工人为取得很少的一点代价，在一定年限内把人身卖给包工头。商业方面，很多商业实行包买、预买、高利盘剥、发原料收成品等办法来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很多企业利用封建的、宗法的、行帮的关系来把持市场和统治工人。同时，许多资本家还经常要依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政府和法律，借助于军阀、地主、国民党的势力，借助于道门、黑社会势力，乃至直接依靠于帝国主义势力，来压迫和剥削工人，镇压和破坏工人运动。

根据1933年对上海雇工在三十人以上的工厂的调查，在棉纺工业中，工资支出只占生产总值的9.3%，在棉织工业中占5.7%，在机器制造工业中占8.5%，在化学工业中占6.4%，在卷烟工业中占3%。抗日战争前，上海工人的收入，包括工资及各种变相工资和年

終分獎等在內，平均每月只合十四元八角一分，而工資差距极不合理，一部分管理人員工資很高，生产工人低的只有三元八角。工人实际收入不断下降，从 1933 年到 1936 年，上海物价指数上升为 105，工資指数下降为 96.8；从 1937 年到 1941 年，重庆生活费指数上升为 2,680，工資指数只增为 1,377。根据 1933 年对全国二千四百三十五家雇工在三十人以上的工厂的調查，男工占 41.1%，女工占 49.4%，童工占 9.5%；女工工資約比男工低三分之一，童工工資不到成年工的一半；工头約占工人人数的 6%，大都是封建把头性质。

商业資本对小生产者的剝削主要是預买制。如 1934 年調查浙江长兴县的“买夏米”，商人所付价格只有夏熟时米价的一半；平湖县的“买寒叶”（年底預买明春桑叶）的价格只有平时的 50—57%；江苏南通县的“买期花”（預买棉花）作价不过合市价的 30—40%。此外，又有以高价工业品和农民換貨，賒卖收息等方式。如 1934 年調查甘肃武威的商人賒卖布給少数民族的农民，价格加三分之一，并按三分行息，到期还麦。余如“大斛进，小斛出”，扣斤压两等情况更为普遍。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必然会通过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反映出来，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他们对待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上。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的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有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或者在革命中保持中立的可能。从这方面說，他們同国

內其它剝削階級不同，也和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不同；他們是愛國的階級，他們還保持着在一定条件下反对外國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國官僚地主階級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对他們所願意反对的敵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具有对革命敵人的妥協性。即使在革命時，他們也不願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农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同大資產階級有種種往來，乃至有某些共同的利害關係，因此他們更加不願意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國內反动勢力。特別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工人群眾之間存在着階級对立的矛盾，他們十分害怕群眾運動。

毛澤東同志說：“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①

这种对待革命的矛盾态度，使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运动中經常处于動搖的中間地位，也使他們經常处于分化的过程中。他們的左翼有參加革命斗争的可能；他們的右翼，主要是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有投靠反革命的可能；而大部分人，則動搖于两者之間。

上层小資產階級，即僱用少量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业者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对中国革命也具有两面态度。但是，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比較低，受到的壓迫比較重，爬上中產階級地位的希望經常受到打击，所以，“到戰時，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胜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

^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义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7頁。

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①

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他们这个特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成为一个阶级，成为一个政治力量，大体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它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新兴阶级。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要求表现自己的最初尝试。这个依靠皇帝和绅士阶级的、完全脱离群众的上层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了。改良派分化，一部分人同封建反动势力妥协、甚至投降了。而另一部分人，在后来有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借外债、收回路权矿权、抵制美国货的运动中，却获得了一些“变法”中所没有能够争到的权利。

当清朝政府还在拒绝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要求时，这个阶级中就出现了革命派。革命派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一些开明绅士组成，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这是他们的一个巨大贡献，因为在这以前，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人还都只知道以恢复明朝或建立汉族帝国为口号。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民族资产阶级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企图依赖帝国主义。革命的果实即政权，最后落到了封建军阀袁世凯的手里。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更加深了。推其故，都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没有力量，而向革命的敌人妥协的结果。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页。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但是，这时已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思想武器。工人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中国资产阶级，连同他们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就都显得软弱无能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①他们中很多人随即同帝国主义妥协，或变成买办文人，或变成复古派。“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和觉悟了的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革命舞台，开始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此，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要角色了。

1924年孙中山在绝望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这样，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大部分中间派就又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中来。在这个战争的序幕——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比较积极的，他们也在人民抵制英日货的运动中得到了好处。但是，当武装斗争开展，特别是当工人、农民动员起来，城市和乡村都出现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摇了；认为“过火”，感到害怕。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叛变了革命，掉头对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随后，民族资产阶级也“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②

民族资产阶级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之后，希望从那里乞得“民主”和“自由”，依靠这个政权的保护，剥削工人，发展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0页。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0页。

资本主义经济。自1927年以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确是日益加重了，工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得到的权利又都重新丧失。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让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好处，反而日益加强了对他们的限制和排挤。帝国主义有了蒋介石这条得力的走狗，也加深了对中国的掠夺，并把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损失转嫁到中国来。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所得到的只是破产、半破产的境遇。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幻想也日益幻灭，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使他们大部分人，对革命逐渐采取了中立或者同情的态度，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逐渐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① 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农民；正是他们，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② 就是说，他们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大敌人的剥削和压迫，主要并不是对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如何，也不改变革命的性质。

但是，决不能因此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的参加者和同盟者，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损害，他们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他们较早地

^{①②}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86页。

領導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社会上有比較广泛的联系，在政治上有頗大的影响。他們是拥有知識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員較多的一个階級，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工人階級爭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或者使之保持中立，就有利于爭取其它的中間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影响。事实上，只有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参加革命或对革命中立，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孤立敌人。同时，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有重要的作用。他們所代表的資本主义工商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中的一个进步力量，是和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經濟、官僚壟断資本相对立的。由于中国經濟十分落后，这种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乃至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都能够对国民經濟的发展起有益的作用。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領導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对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統一战綫的政策，爭取他們参加到党所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战綫中来；对于民族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使它們成为新民主主义經濟的一部分。

革命必須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結成統一战綫，团結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瓦解敌人，这是任何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最大限度地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这是毛澤东同志領導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早在1926年，毛澤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这一著名的著作中，就鮮明地提出了：“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①在这个著作中，就科学地論証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两面性和他們之必然趋于分化，指出了“那动搖不定的中产阶

^① 毛澤东：《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頁。

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綫。”^①

但是，毛澤東同志這個光輝的思想，却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被黨內的机会主義者所拒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陳獨秀右傾机会主義者，只看見資產階級積極性的一面，看不見他們反動性的一面，因此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机会主義者，又只看見資產階級反動性的一面，看不見他們積極性的一面，因此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這“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証。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②直到1935年，清除了“左”右傾机会主義的路綫，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思想，才為全黨所掌握，在抗日戰爭時期，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才迅速地發展起來。毛澤東同志說：“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③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綫政策，是根據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兩面性而來的。聯合是對待他們革命性的一面而言，鬥爭則是為了克服他們妥協性的一面。否則，他們妥協性的發展，就會破壞革命事業，也會破壞整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因此，鬥爭又是達到聯合的必要手段。“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④

①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9頁。

②③ 毛澤東：《論政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59—760頁。

④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0頁。

1939年毛澤东同志总结了过去十八年的經驗，对又联合又斗争的統一战綫政策作了精辟的論述：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綫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产階級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綫。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产階級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間发展起来和鍛炼出来的。这里所謂联合，就是同資产階級的統一战綫。所謂斗争，在同資产階級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資产階級分裂时，就轉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資产階級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資产階級时又同資产階級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同資产階級分裂时不同資产階級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①

毛澤东同志这里所說的同資产階級的联合和斗争，是包括大資产階級在内的，因为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不仅包括民族資产階級，还包括大資产階級。这里所說之又联合又斗争，适用于整个資产階級，而这里所說之又联合又分裂，主要指同大資产階級的关系。对于大資产階級，也要利用他們和其他敌人之間的矛盾，利用他們派系之間的矛盾，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綫上拉过来”^②，同他們暂时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盟，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但是，大資产階級

① 毛澤东：《〈共产党人〉发刊詞》，《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9頁。

② 毛澤东：《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9頁。

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仍然是很反动的。他们在统一战线中极力限制和打击、破坏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到革命发展到同他们的反动要求不相容的时候，他们就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力量，这时工人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要破裂，斗争就变成武装斗争。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则是另一种情况。总的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这样：一方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其集中代表），不但残酷地压迫劳动人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向三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奋斗。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共产党对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积极的正确的政策，就能使他们的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在1927年到1931年间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不少人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即使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也应当在政治上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事实证明，党的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其中主要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即上面所说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这个联盟，对于工农联盟说来，是个辅助的联盟。

我国革命的实践证明，要建立和巩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首先必須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愈强大，基础愈巩固，民族资产阶级才愈倾向于参加统一战线。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問題。”^①

我国的經驗还証明，除了放手发展工农联盟使工人阶级有充足的力量以外，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在统一战线中“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給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給以政治教育。”^② 无论对于中农、富裕中农或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他們的党派，这两个条件都是适用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党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們积极的一面，批評他們消极的一面，竭力克服他們的妥协性和动摇性，领导他們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照顾他們的利益。在政治上，党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实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政权的人员安排曾采取“三三制”，即大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紳士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保护和照顾他們的合法利益。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

^① 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頁。

^② 毛澤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73頁

象，是封建主义和壟断资本主义，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党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壟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解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自从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革命军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起，在所有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内，就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了。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就开始有了国营经济（虽然它的数量还很少，并且主要是为了供应革命军需的），同时也逐渐发展了合作社经济。革命根据地仍以私人经济，主要是个体经济，占最大比重；但是，它们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了。在革命根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土地革命路线。同时，规定和执行了奖励私人经济，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并力争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实现领导的政策，这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逐渐增加和扩大了，并伸延到敌人后方，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随之有了发展。这个时候，党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和与这个阶级有联系的人们共同抗日，停止执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私人经济，不只是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并且有了一定数量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同志指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

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①这些政策，后来就被概括为著名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这对于私人资本，是又保护又节制其发展的政策。即一方面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它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性，使它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不使私人资本壟断国民经济和过分剥削劳动者。也就是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条件下，允许和保护私人资本的发展。这个方针，同国民党统治区内官僚资本侵吞独占、苛捐杂税重重盘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恰成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时期，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分配土地给农民，同时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对于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也予保护，并予鼓励。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城市的逐步解放，没收了解放区的官僚资本，国营经济有了发展，党也越来越注意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在城市，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毛泽东同志并指示：“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②这样，不但使解放区的私人工商业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且逐渐加强了对

^①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3、765页。

^②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83页。

它們的管理和工人監督，逐漸加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

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不但在解放區收到了發展生產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重大效果，在國民黨統治區也發生重大的作用和影響。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人士學習了黨的工商業政策，提高了認識。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把保護民族工商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如領導人民進行鬥爭，反對蔣介石的出賣權益，反對官僚資本的壟斷侵吞，反對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反對通貨膨脹等。黨的這些經濟政策，並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領導和改造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條件，積累了經驗。

克服民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鬥爭 在黨的正確政策下，經過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參加了革命的統一戰綫。但是，這並不足以改變他們兩面性的特點。民族資產階級在統一戰綫中是無產階級的動搖的同盟者，要克服他們的動搖性，必須經過一系列的鬥爭。愈是到革命接近於勝利的時候，這種鬥爭愈具有深刻的意義，愈具有重要性。

在這種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必然日趨於分化，而處於中間狀態的人，經常是占多數。在抗日戰爭中，民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人，比較堅持抗戰和堅持民主，乃至同蔣介石的反共獨裁作過鬥爭。另一部分人，則作了不少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的活動，乃至充當蔣介石的謀士；或者向往於日寇發還百分之四十九或百分之五十一股票的誘惑，乃至充當漢奸。而大多數人，則一方面是主張抗日的，一方面又對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存在着幻想；他們是“動搖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之間的抗日的參加者”^①。黨在抗日戰爭初期，正式聲明願以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

^① 毛澤東：《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87頁。

政策的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同时向反对和破坏这个纲领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党在斗争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由此空前地壮大了进步势力，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坚持到抗战胜利，并把他们的左翼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他们的中间分子提高到接近这个水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课题，就是建国和建什么国的問題。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求恢复他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专政。广大人民，以共产党为代表，则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各阶级联合政府，以便逐步过渡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时，动摇在两者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则又幻想在这两条道路之外另找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这条路线，实质上，就是早已过时的和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中间路线分子虽然也要求和平、民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但是，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抱有很大的幻想，害怕以革命战争反对美蒋的反革命内战，要求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阵地向美蒋换取和平。其结局，必然会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助手，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在这方面，中间路线不但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而且表现了很大的反动性。针对这种情况，党一方面团结和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欺骗；另一方面，对中间路线分子的妥协性和反动性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批评。这样，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增强了左翼的力量，缩小了右翼分子的影响。随之，蒋介石悍然执行其反革命内战政策，人民解放

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退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扭转了美蒋反革命的车轮，推进了自己革命的车轮。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自食其恶果，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在党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间路线的辩论。1948年5月，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迅速地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响应。至此，中间路线就完全宣告破产了。克服中间路线的斗争，是集中到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问题，集中到建国道路和承认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问题。因此，这个斗争，也就是要求对民族资产阶级，不只是把他们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要进一步把他们提高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水平。

当解放战争就要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使用缓兵之计，提出“和谈”的政治阴谋。这时，上海和南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影响他们的利益，也就附和起这种“和谈”来。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抵抗人民解放军，一面又设计使用一些同革命势力有联系的人，混进革命队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竭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不要太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右翼分子，就成了恰当的人选。他们装作所谓自由主义人士，又唱起“第三条道路”的调子，企图影响中间分子，破坏统一战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以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且明白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

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綫’。”^①

这样，才克服了民族資产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动摇，使得他們能够和工人、农民、小資产階級一道，进入了光輝灿烂的新中国。这个克服民族資产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动摇的斗争过程，也就是教育和提高他們的过程。

总之，中国民族資产階級在历史上曾經发展了近代工业，較早地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識和管理知識；他們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統治，在民主主义的傳播和在近代文化的傳播上有頗大影响；他們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中国无产階級領導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是，民族資产階級又殘酷地剝削中国工人階級；他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者服务；他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有幻想，在民主革命中曾变节和投靠过敌人；其后，也有一部分人具有反动政治傾向，从事不利于革命的活动。在整个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他們經歷了参加革命、附和反革命、中立、最后又参加革命的曲折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民族資产階級不断地有人离开革命陣营、掉入反革命泥坑，但絕大部分人是搖搖摆摆地跟着革命走，并且終于跟过来了。

^① 毛澤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380頁。

第二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和政策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延续达一世纪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两个革命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如上章所说，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在性质上虽然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原则的区别，但是它的发展和胜利必然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

的，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①。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像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损失。毛泽东同志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一方面，他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他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两个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集中表现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这一革命最伟大的成果，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巩固联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1页。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又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统治权，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可以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①

建国初期国内经济情况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成为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工业的规模狭小，其技术装备也是十分落后的，又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基础，不能独立自存。解放前钢的最高年产量只有九十多万吨，原煤只有六千余万吨，电不到六十亿度，机器和许多工业原料都依赖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农业也是一直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生产水平很低。解放前粮食的最高年产量只有二千七百多亿斤，棉花的最高年产量还不到一千七百万担。中国虽然是个农业国，但是在解放前几十年间，粮食和棉花也需要从外国进口。

这样落后的经济，经过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对中国人民发动的连绵十几年的战争，又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国民党反动派在溃败的时候，更丧心病狂地炸毁工厂、矿井，破坏铁路、航运设备和水利事业。1949年，全国粮食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水平降低了20%左右；棉花产量降低了48%。工业生产损失更重，生产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76页。

資料生产降低了53%，消費資料降低了約一半；这一年的年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較，鋼只占17.2%，煤为50.1%，电力为72.3%，棉布为67.1%。解放时，全国鐵路能通車的仅剩一万一千多公里，破坏将近一半。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工厂停工减产，物資奇缺，到处是严重的失业。在农村中，由于水利破坏，連年受灾，1949年受灾面积达一亿二千万亩，灾民四千万人。

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連同手工业只占30%。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資料的产值只占26.6%。

一切革命的最終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只有彻底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摧毁反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国民經济的落后状况，过渡时期开始，中国工人阶级就凭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一方面繼續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一方面，开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彻底地沒收官僚資本，积极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經济。廢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逐步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經济和文化残余势力。有步骤地实行彻底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样，就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能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軌道上获得迅速地发展。

沒收官僚資本 旧中国的官僚資本是一种国家壟断資本。它不但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反动的部分，也是資本主义經济中最集中和占最大比重的部分。列宁說过：“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①工人阶级为了掌握国家經济命脉，占領这个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基地，

^①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9页。

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对腐朽的、寄生的、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垄断资本采取剥夺的办法，这是毋庸置疑的。

官僚资本主义是同反动政权直接联系着的。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的国家政权机关，就可以立即把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我国对于官僚资本的剥夺，就是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政权的力量，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大规模地进行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原来官僚资本经营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政、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转到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手里。根据统计，到1949年，国家没收的工业企业共有二千八百五十八个，拥有生产工人七十五万多人。1951年1月，人民政府又发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对隐匿在一般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进行了广泛的清理工作。这样，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就彻底地被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国家就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铁路，绝大多数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

没收官僚资本，包括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和国民党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企业。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中，包括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本、德国、意大利在中国的企业。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承认其所有权。有些私人股份占一定比重的企业，由国家没收官僚资本股份后，改为公私合营企业。

广大职工热烈地欢迎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庆祝他们的解放。他们大都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就做好清册和其它准备工作，故没收工作进行得迅速、顺利。

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大大加强了。1949

年,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1950年国营经济占全国輪駁船載重量的43%,公路汽車客運量的52%。

人民政府对于沒收官僚資本的經濟机构和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在办法上有原則的不同。官僚資本主义企业有着自己一系列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它們一方面是从官僚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是奴役和压迫工人的工具,这是必須消除的。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从社会化的大生产所产生的因素,即这些大企业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系統和核算制度等。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保存和繼承下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服务。有一部分則是不合理的,不利于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企业的发展,必須进行改革。因此,沒收官僚資本,不是打碎它的机构,而是不打乱原来的技术組織和生产系統,把它完整地接收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就使得国家在一下子接收几千个企业的过程中,基本上沒有发生生产停頓或者企业設備被破坏的現象。民主改革主要是:彻底改革企业的领导机构,打破原来官僚資本主义企业殘留下来的压迫和奴役工人的制度(如包工头制、“搜身”制等),清除隱蔽在企业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势力,改善職員和工人的关系,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則逐步調整工資等。生产改革主要是:实行計划管理,建立生产和技术管理的責任制度,逐步制定合理的生产定額,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清产核資,健全經濟核算制度等。經過改革,提高了工人的階級覺悟和生产积极性,广大职工群众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展开各种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种种改革,归根到底是肃清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殘余,巩固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它是改造旧生产关系

的繼續。这种改革,只有在所有制根本改变以后,在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以后,才有可能。

沒收官僚資本具有两重的革命意义。一方面,官僚資本是买办的封建的資本主义,是蔣介石反动政权的經濟基础,因此沒收官僚資本,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反动統治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官僚資產阶级是中国的大資產阶级,官僚資本是中国的壟断資本,消灭大資產阶级,沒收壟断資本为社会主义国营經濟,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开始。

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經濟侵略势力 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經濟控制权,采取了有步驟地彻底地摧毀的方針。随着各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廢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盘据的中国海关,管制了对外貿易,实行了外汇管理。这时候,帝国主义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还剩下一千余家,主要是属于英国和美国的壟断資本集团。这些企业过去是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发展起来的,特权廢除后,这些企业就失掉了依靠。帝国主义在解放初期,为了窒息新中国,对我国实行了封鎖、禁运,許多依靠进出口商品和原料的帝国主义企业的业务,便陷于停頓状态。

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的。他們在中国的許多企业不执行人民政府的法令,实行怠工,制造困难和糾紛。他們的行為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憤怒。人民政府揭露和击破了他們的阴谋,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監督和管理。1950年12月,美帝国主义无理地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轄区内的公私财产。英帝国主义也追随美国之后,几次劫夺我国在海外的船只、飞机等财产。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人民政府管制了全部美国

在中国的财产，征用和代管了部分英国在中国的企业。还有许多帝国主义企业，在陷于难以维持的境地以后，不得不把它们残存的财产转让给中国企业，以抵偿它们在中国的负债。其余的一些帝国主义企业和侵略性财产，也通过各种形式，陆续为中国人民收回。这就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經濟侵略势力。转入国家手中的这一部分帝国主义企业，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帝国主义敌视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經濟的改造过程。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企业中：經人民政府管制的重要企业有属于美国壟断資本摩根財团系统的上海电力公司、沪西电力公司，属于美国最大电訊托拉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上海电话公司等。

經人民政府征用的重要企业有：美孚油公司，它是美国洛克菲勒財团的企业；德士古(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美国石油托拉斯的分支；慎昌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美国国际通用电气公司的子公司；亚細亚火油公司，它是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設立的企业，它和美孚、德士古过去曾瓜分了中国的石油市場。

經人民政府代管的重要企业有英商开灤煤矿，它是英帝国主义乘八国联軍侵略中国时騙取的财产。

轉让与中国企业的主要是英国企业：有属于国际壟断資本英美烟草公司的頤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有属于英国肥皂托拉斯利华兄弟有限公司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有过去一直壟断中国沿海和內河航运及中国对外貿易的怡和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有过去曾控制中国外汇、关税、盐稅，左右旧中国財政的汇丰銀行、麦加利銀行的在华财产。

土地改革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各个解放区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組織力量，发动农民自己解放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的方針，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就有步驟地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展开。这不仅

是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次大革命，也是消灭当时反革命活动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重大步骤。到1952年底，除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已在大陆上基本完成。经过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三亿农民从地主手里取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关系。这是我国农村中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在我国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富农经济由于一部分多余的土地被征收也削弱了，农民成为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可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给工业提供了原料和粮食，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这就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恢复和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 在没收官僚资本、肃清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在摧毁了旧中国反动腐朽的经济制度之后，我国还不能立即改变国民经济的落后状况。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解放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商业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在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这样，国家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某些发展，就可以利用它的积极作用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一，在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品还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以补助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一部分人民所需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并使国家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从事更重要的经济建

設。同时,我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一部分产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对于加强工农联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拥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人材和熟悉供销情况的人员,利用他们生产经营的力量,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是有利的。并且还可以通过这些企业培养出更多的技术人材和熟练工人。第三,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可以从资本主义企业中取得一部分积累作为建设资金。第四,资本主义经济拥有广大的商业网和国内外贸易联系,可以成为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内外交流的一支力量。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在建国初期还可以维持和吸收一部分职工就业,对于解决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问题也有好处。

在建国初期,在国外还存在着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广大农村还存在着中国人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为了增强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工人阶级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仍然是需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说:“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①这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就成为我国过渡时期初期的一种经济成分。

1949年全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十二万三千余家,职工一百六十四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54.6%;生产总值六十八亿余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3.2%。就若干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1949年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是:原煤28.3%,烧碱59.4%,电动机79.6%,棉纱46.7%,棉布40.3%,纸63.4%,火柴80.6%,面粉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4页。

79.4%，香烟80.4%。私营商业在1950年共有四百零二万户，占全国商业总户数的98.4%；从业人数六百六十二万人；商品销售额一百八十二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76.1%，零售额的85%。1950年私营轮船业占我国輪駁船货运周轉量的50.2%，私营汽車占汽車货运周轉量的47.7%。

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上述这一切，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我国过渡时期初期，国民经济中就存在着三种基本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联系，存在着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如列宁在1919年所说，任何国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①。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着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最进步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建立与扩大，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但是进入过渡时期以后，我国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成分，而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了，并且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对立的生產关系了。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但它所服从的占有方式却是资本主义的，即少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的产品。它所固有的这种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

^①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对抗性矛盾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这种矛盾就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以及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与全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生产能力增长的趋势和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等等。在过渡时期里，由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更集中地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对抗而表现出来。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矛盾，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受到破坏，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资本主义剥削与扩大社会积累的矛盾，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存在，加剧了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增长，不但会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建立和发展。这些矛盾的发展，就使得资本主义所有制不仅直接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妨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矛盾，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就经常成为一种对抗社会主义的力量。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长期共存，互不干扰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归根结蒂，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矛盾，也必然会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

农民个体经济(和手工业个体经济)是一种分散的小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一般地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或者极其微小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与个体经济也是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矛盾，

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与个体经济小生产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依靠农业供给粮食和工业原料，要依靠农业提供广阔的市场，要依靠农业积累一部分资金。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就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而且必然会限制以至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斯大林说：把工人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的，并且指出，这样下来，“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①。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个体生产关系的矛盾。小商品经济是一种过渡的，不稳定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小商品生产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仍然存在，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并且，“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②。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之间的矛盾，就必然日益尖锐起来。在过渡时期，长期地保留个体经济，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说明了，过渡时期这种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时期是个充满一系列剧

① 斯大林：《论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9—130页。

②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烈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时代。对于过渡时期这种历史特点，列宁曾经作过极其精辟的概括，他说：“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①“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采取剥夺资产阶级的的手段才能完成。”^②

因此，工人阶级在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一切领域里彻底地解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矛盾，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必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是一切国家和民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经的道路。

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全国解放前夕，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他指出：必须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生产；对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限制

①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

②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政策，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它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之一。这就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在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又提出了在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构成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基础。

在1952年年底，当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了一步不停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彻底消灭剥削和彻底消灭阶级的前提。所以，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来逐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并且，在逐步变革所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展开以至完成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总路线规定了一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一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方面的任务。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才能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组织、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才能用新技术改造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同时，只有

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组织和发挥它们的生产力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且，只有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否则，它们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障碍或破坏力量。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每前进一步，又都增大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扩大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可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断地深入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前进。

同时，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割断城乡之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小商品生产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系，而代之以它们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使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不得不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按照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发展。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并使国家掌握了主要的农产品，借以缩小资本主义的市场，直到堵死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重要的推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向资本家取得工业品，向农民交换农产品，并且使农民和手工业者逐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逐步摆脱资本主义道路对他们的引诱，这对于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起了重要作用。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想像，而是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必然性要求为根据的。这种客观的要求，是基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规律而产生的。这些规律，要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掌握与运用这些经济规律的结果。

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了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步骤和方法，展示了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前景。这个总路线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成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据

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 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这是一切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真理。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方法，首先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用革命手段对资本实行剥夺，并将它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即全民的财产。一百二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就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夺取了旧政府的国家银行，不久即宣布了银行国有。俄国共产党和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页。

宁曾准备通过工人监督，对其它大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逐步过渡到国有的办法。但是资产阶级先用有组织的怠工来反抗工人阶级，继而勾结外国帝国主义来谋求推翻苏维埃政权。于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先将中等以上的资本主义企业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其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加紧反抗和怠工，由于战争的严重情况，一些中小企业也被没收，集中到国家手里。

远在一百一十多年前，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这个问题时曾说过：“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①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和俄国工人阶级英勇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并以自己的首创行动，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

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立即剥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的、垄断的部分，即中国官僚资本部分，而对其余的中小资本，即中国民族资本部分，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的办法，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把它们逐步转变为全民所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在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办法，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确定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6页。

的，而是对我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进行了深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确定的。这就是說，在我国历史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通过和平的办法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客观依据呢？

我国对民族資本不实行强力剝夺而实行逐步改造的办法，当然不是說工人阶级沒有力量来剝夺他們，也不是說这种办法不需要强力。事实上，采取这种办法，同样需要工人阶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經济力量。因为这种办法，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时期內，既要允許资本主义經济存在，又要使其不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向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过渡。任何剝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既允許资本主义存在，它就必定会成为一种經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必然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为了战胜资本主义，也就需要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經济优势，并且不断加强这种优势，使资产阶级感到除了依从工人阶级以外沒有其它任何出路，他們才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专政 首先，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保証，也是党实行这个政策的基本依据。

馬克思在1875年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橫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专政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內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剝削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顛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31頁。

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社会,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个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通过这个政权从上而下的领导,把全体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取得他们从下而上地直接支持,就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使工人阶级有力量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顽强地和持续地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和其传统而斗争,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并且使工人阶级有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非劳动人民,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完成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的事业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经过抗美援朝斗争,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经过“三反”“五反”斗争,又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每一次斗争,都显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又都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壮大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这就使得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反对工人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普遍地获得了土地;由于工人阶级手里有了强大的工业,同农民兄弟之间建立了经济上的互相支援和交换;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财政、水利、救灾、技术、文化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并由于党和工人阶级进一步领导农民逐步向合作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长期革命战争(实际是农民战争)中锻炼出来的

我国偉大的工农联盟，又有了新的内容，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并且逐步提高了。工农联盟的发展，不仅加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也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五亿农民坚定地跟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走，这也使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考虑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己的道路。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发展，它是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有计划的活动，由于劳动人民有组织的活动而产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监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种成分，也必须服从国家的管理，服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和一切有关法律、法令，服从工人群众的监督。这种管理和监督，无疑地都是推动它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能够在过渡时期担负组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分子的复杂任务，这不但说明了它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优势 工人阶级掌握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势，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在全国解放以前，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结果，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人阶级就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培养了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经济管理干部。但这时，国营经济的数量还很小，体系也不完备。在工人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把它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官

僚資本是旧中国資本主义經濟的主要部分，沒收官僚資本，一方面使工人階級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經濟命脉，給社会主义經濟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又在整个国民經济中大大地削弱了資本主义經濟。

接着，党和人民政府在优先发展国营經濟的方針下，大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集中經營銀行信貸；建立了对外貿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建立了全国統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并发展了合作社商业；通过市場斗争巩固了社会主义經濟在全国市場上的领导地位；通过对主要农产品的統购統銷和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使社会主义經濟控制了商品流通的主要环节。强大的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奠立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国营經濟优势发展的結果，使国家迅速地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器材、工业原料和主要的商品貨源，迅速地控制了国内市場，并使資本主义生产逐步断絕了同自由市場的联系。原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經濟体系的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在原料和商品的供应，市場銷售和商品运输等方面不依附于社会主义国营經濟就更难以生存下去了。这样，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就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国营經濟的领导，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資產階級的两面性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階級，这也是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根据。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經濟的巨大优势是逐步改造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决定性的条件。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还要取决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态度，如果他們反抗工人階級的政权，抗拒社会主义經濟的领导，那么，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是不可

能的。

如前所述，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是一个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原有的两面性发展和转化成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两面性表现为：既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有剥削工人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要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革命的对象，是行将被消灭的阶级。从阶级本能出发，他们强烈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不经过斗争，他们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消极的反动的这一面，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一面，就决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则是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由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关系，由于他们在解放后所处的现实条件所造成的，并且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政策也是分不开的。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中有着长期的联盟的历史关系。在这个联盟中，在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下，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教育，有了提高。在全国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意了共产党提出的共同纲领，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这样，工人阶级也就没有理由中断这种联盟。正是他们的两面性中包含有积极性的这一面，就决定了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可以用特殊的方式，即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

来解决。

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只能是阶级斗争在一种特殊形式下的继续。工人阶级正确利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这种可能性，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国际条件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当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革命是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坚强的国际阵营，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进入高潮。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社会主义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磅礴于世界，国际资本主义则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加以伟大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对我国的热情支持和援助，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处在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看到这种东风日劲、西风日蹙的国际局势，也不能不想到当年俄国资产阶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悲惨下场。这种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促使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接受改造。

这些，就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依据。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权和工农的巩固联盟，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国内统一战线关系，并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就是我国所以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①

^①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第56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 “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①正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苏联工人阶级不得不对全部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强制剥夺的办法，而中国工人阶级则有可能对垄断资本采取强制剥夺、而对中小资本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上所呈现的这种不同的特点，只是形式、方法和手段的不同。而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消灭资产阶级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在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体现则完全是相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创造性的运用它们，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日益丰富和发展之所在。

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之后进行的。有人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用和平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件事混同起来。这是一种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真理，即列宁所反复阐明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打碎反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是一件事。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依靠这个专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又是一件事。这是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必须有前者，才能有后者。这一点，在苏联是这样，在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在我国也是这样。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继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6页。

过二十二年残酷的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国家政权的結果。同时，也是和对大资产阶级实行暴力剥夺結合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暴力剥夺办法的补充。

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对待官僚資本与民族資本——中国資本主义經濟中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对待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不同部分，历来是有区别的。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对两者都是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变革所有制这个重大的問題上，对官僚資本和对民族資本采取不同的办法，并把两种办法結合起来，則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無論在消灭資本主义或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問題上，都收到极其良好的效果。

从經濟方面看，由于对官僚資本实行沒收的办法而对民族資本实行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的办法，这就在人民解放战争震撼中国社会的革命大变动时期，穩定了资产阶级中占絕大多数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彻底孤立了大资产阶级，使工人阶级集中力量一举而迅速地消灭了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沒收了占最大数量的資本，掌握了国家經濟命脉，奠定了国营經濟的优越地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資本主义經濟，使中小資本处于孤立的地位，不得不服从国家的领导和管理，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而对众多的中小資本实行和平改造的办法，就使中国工人阶级在初創政权的时候，避免了拿出极大力量来組織遍布城乡的生产和供銷机构，并負担起安排千百万人生活和职业的重担；避免了由于广泛地剧烈变动所引起的生产停頓和人民生活的不便；反而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利用了民族資本有利于国計民生的积极作用，利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識与經驗，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經济服务。这样做，还使工人阶级赢得了时间，腾出手来，从事更

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从而奠定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这些，对于原来经济上十分落后的我国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从政治上来说，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就消灭了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头号帮凶，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则增强了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这对中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处理国外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疑是有利的。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中国人民在过渡时期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是有利于彻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资产阶级的消灭，不仅在于他们从事剥削的经济基础的丧失，而且必须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上背弃本阶级，转移到劳动人民方面来。如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是完全处于对抗的状态，而是处于有联合有斗争的状态，是有利于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地背弃本阶级的，他们转移到劳动人民方面来，必须有赖于工人阶级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即和工人阶级保持着有联合有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对他们采取强力剥夺的办法，而采取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可以继续同他们保持有联合有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把它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并且，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在这个改造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当然，在企业的改造基本完成，即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以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随着企业的这种转变，也给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可能条件。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有待于工人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从这一方面来说，在可能条件具备之后，正确地制定政策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总结了我党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工商业政策的经验，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改造。”^①

马克思关于赎买政策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之后，可以用没收资本家财产的办法，或者用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

^① 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7页。

就提到过“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①。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论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土地所有制说：“只有对于大土地所有制，事情才是十分简单的。这里摆在我国面前的是些毫无掩蔽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有任何迟疑的余地。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农村无产阶级大众，因而我们的任务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党一经掌握国家政权时，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所有者，也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至于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办法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决定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②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看成是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方式。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究竟采取什么方式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根据自己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列宁在评论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时候就说过：“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③

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 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7页。

②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439页。

③ 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8页。

义革命胜利之后，根据并且发展了馬克思的这一思想，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达到社会主义的計劃。

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国家的性质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着它的性质和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从属于工人阶级国家，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和资本主义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它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也为国家所承认并受国家监督，但它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在抵抗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并和他们作斗争。”^①

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是一个小商品经济占绝对比重的国家。这种自发的小商品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共同携手，反对社会主义。当时列宁曾经设想，通过工人监督的办法，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把当时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用来作为小生产与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和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手段、途径和方法来加以利用，使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他曾经指出：如果当时“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末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很容易，就会很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的，有监督的和会化的东西”^②。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478页。

②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9页。

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以发动国内战争来回答列宁的办法，俄国工人阶级就只得“用赤卫队来攻击资本”，实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列宁重新提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照列宁的说法是，“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①。这是因为，当时苏俄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生产十分凋敝。国家必须首先振兴农业，而振兴农业，又必须同时恢复工业生产，以掌握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巩固工农联盟。因此，列宁这时提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比不受国家节制的私人资本主义、比小生产更高的经济形式，利用它来提高生产；同时，又利用它作为反对小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工具，利用它来实现国家的统计和监督，利用它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说，在当时情况下：“或者是设法把这种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情况下必然发生的非国营的私人交换的一切发展，即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一概加以禁止，加以封闭。”“或者（这是最后一种行得通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封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同时提出，“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②。

苏俄在1921年后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把已经没收归国家所有的某些企业，以租让、租借等形式，在一定时期内移交给资本家去经营，承租人向苏维埃政府提供规定的义务。其中租让制主要以外国资本家为承租人，租借制以本国资本家为承租人。这是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此外，还有苏维埃政府与本国或外国资

①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

② 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5—336页。

本家合办的經營国外貿易的合股公司。列宁还提到，让資本家代銷国营企业的产品和替国家向小生产者收购产品也是一种国家資本主义形式。国家資本主义在苏联沒有获得显著的发展。租让制企业只有五万个工人，租借制企业只有三万五千个工人。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地恢复起来了，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很快地占了优势力量。社会主义已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建立城乡联系，无需借助于国家資本主义了。

列宁曾經設想在实现国家資本主义的过程中，把贖买办法和鎮压办法結合起来，把贖买办法同国家資本主义結合起来。他説过：“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資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資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繼續以投机、收买貧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維埃措施的資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資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資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資本主义’，能聪明絲达地組織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最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协，或向他們实行贖买。”^①

列宁对苏俄当时的国家資本主义的性質作了明确的闡明。列宁指出了当时苏俄的国家資本主义在企业內部的生产关系上虽然是資本主义的，但它已經是社会主义經濟与資本主义經濟的联盟，已經与无产阶级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列宁説：租让制“这就是苏維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資本主义締結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資本家。他們按資本主义方式經營。是为了要获得利潤”^②。他又説：“国家資本主义，就是我們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規定其活动范围的資本主义，这种国家資本主义是同国

① 列宁：《論粮食稅》，《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頁。

② 同上，第336—337頁。

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們。”^①

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他说：“租让制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赎买政策的思想，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苏联没有获得充分实现。但是，他们这种光辉的思想，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革命根据地关于工商业政策的经验 党制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人民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无产阶级政权起，就有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争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对私人经济领导政策。这是我国革命的一个特点。

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工商业政策，是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性和对它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而制定的。在革命根据地，买办官僚资本很少，封建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两个主要的剥削阶级。党对这两个剥削阶级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这就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抗日战争时期是减租减息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在以后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还明确规定，对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因为它们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② 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7页。

展,也不沒收,同样加以保护。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孤立反动地主阶级,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27年到1931年間,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人曾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那时,党的一部分领导者曾经对民族工商业采取过过左的错误政策,如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甚至提出“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这种过左的政策,就把中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批评了这种过左的政策,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且指出,就是对附和了蒋介石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仍然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应该保护他们。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全面地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并把它和“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经济建设总方针联系起来,使前者为后者服务。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重作用的经济,其消极作用的一面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破坏因素。党又全面地掌握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作用的特性,在执行保护政策的同时,又执行了领导的政策,以领导它们正确地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如在劳动政策方面,采取了“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①,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都根据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恰如其分的限制政策。对民族资本家严重的投机违法行为,还进行了必要的斗争,1948年在山东临清地区对私人资本操纵棉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2—798页。

花市場的投机的斗争，就是例証。

早在1932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制定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以后，有关工商业和市場管理的法令逐渐完备，1942年延安还設立了物品交易所。随着城市的相繼解放，各解放区扩大和联系起来，各項管理工作也逐渐統一。1931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的苏維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中，就規定对資本家的企业实行工人监督；解放战争时期，又实行在政府领导下由工人和資本家共同組織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办法。向私营工厂加工訂貨，特別像公粮加工、軍用被服加工，也是在解放区就开始了。

这些工作，和党在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其他革命工作一样，“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偉大演习”^①，在这种演习中，教育了群众，培养了干部，使党取得了丰富的經驗。这些經驗，就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制定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极为宝贵的借鑒。

統一战綫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发展 第一章中已經講过，在民主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統一战綫政策，这个政策在孤立敌人，扩大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毛澤东同志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經驗时指出：“統一战綫，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② 1950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毛澤东同志讲明了我們国家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然后走到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之后，接着說：“在这个远大目标

① 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

② 毛澤东：《〈共产党人〉发刊詞》，《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7頁。

上,在国外,我們必須堅固地團結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對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動搖。在國內,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必須鞏固我們這個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綫。”^①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仍然是一個法寶或武器。

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黨和工人階級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綫政策。這個統一戰綫,仍然是我國整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輔助部分。但是,由於有了新的條件和新的革命任務,對民族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綫的作用,又有了新的發展。首先,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已經成為革命的對象。因此,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聯盟,除了它原來的任務,即反對帝國主義等共同敵人的任務之外,它實質上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處理階級矛盾的一種形式,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工人階級通過這個聯盟,鼓勵資產階級分子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對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面進行批評和鬥爭,求同克異,逐步克服不同的一面,逐步把他們同化於勞動人民,同化於工人階級。其次,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由於工人階級手裡有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不能不依附於社會主義經濟,因而,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就有了更多的經濟方面的聯繫。這種聯繫,成為統一戰綫的一個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資本主義經濟是要被消滅的。因此,這種經濟方面的聯繫,同樣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工人階級通過這種聯繫,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作

^① 毛澤東：《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頁。

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逐步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因此,我们可以说,党和国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都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继续,是工人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基本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种发展,使它具备了新的内容。它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是依照宪法保障他们和劳动人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并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工作。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镇压资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并不是必要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①他又说:“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問題,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②在我国,既然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了联盟关系,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以民主权利,是其自然的結果。但是,这种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和政治团体,是采取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他们利益的問題,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安排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政府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和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①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8頁。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6—287頁。

造。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們，在談論无产阶级国家的普选制的时候，迷恋于“純粹民主”，抹煞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不平等关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給民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利，是与他們的修正主义观点有根本区别的。

我国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它們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們的知識分子。这些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机关的工作，但它作为一个阶级又要被消灭，这是一个矛盾的統一。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列宁說：“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識界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数結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終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① 列宁所說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同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則是无可怀疑的。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在历史上同工人阶级有联盟的关系，他們的某些代表人物也参加了革命根据地的联合政府的政权工作，現在他們又表示拥护共同綱領，拥护宪法，工人阶级也沒有理由不吸收他們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工作。工人阶级吸收他們参加政权工作，不但对于教育和改造他們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可以利用他們的知識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可以壮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

^①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騙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344頁。

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①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是采取没收或者挤掉的办法，而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如前所说，在我国过渡时期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增加物质生产、扩大商品流通、培养技术人员、积累社会资金等方面，还有一定的作用。解放后，国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对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在实行利用政策的同时，又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的一面实行限制政策，否则，资本主义的盲目性、投机性和贪得无厌的剥削，就必然要危害以至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解放以后，国家就对资本主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义工商业在活动范围方面，在市場购销和价格方面，在利潤和利潤分配方面，在工人劳动时间和不合理待遇等方面，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相冲突的。限制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斗争就成为一个时期内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但是，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须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概括地说，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不同程度上的联系和联合。一般说，它的初级形式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对资本主义商业社它们经销、代销商品；它的高级形式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这种联系和联合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保存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改造资本主义，并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它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结果，是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所以，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它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不同程度的、以至极大程度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经常处于领导的地位。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外部的联系，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从资本主义企业外部进入企业内部，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的扩大，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因此，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一个早晨的变革，而

是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进行的。

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任务。然而，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它另外一些特点和更广泛的作用。首先，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来执行的。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中，这三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这就可以更好地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起来，也就可以在逐步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它们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消极作用。因而国家资本主义是完整地体现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最好形式。其次，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说，在整个改造过程中，资本家并未被排斥在生产之外，并且，他们始终要对企业的生产与改造承担某种责任与义务，当然，也相应地给与他们某种权利和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在整个改造过程中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的技术知识与经营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更可以通过生产经营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帮助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又是教育资本家的学校。

第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采取教育的方法，把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逐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空前广泛和空前深刻的社会革命，不但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而且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根本改造一切剥削者和私有者，教育全体人民。只有这个改造工作做好了，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彻底解放全体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资产阶级分子经过了长期的资本主义实践，具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如果不对他

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們同社会主义始終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工人階級就不能順利地实现資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更无从消灭資產階級。所以,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包括了企业的改造,而且包括了人的改造。

党和政府对于資產階級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說服教育的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用“团結——批評或者斗争——团結”的方法,即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資產階級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必要的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只是作为补充的方法。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采取这种办法,是由于在我国历史条件下,民族資產階級是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属于人民的敌人的一部分。在1950年,毛澤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里就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說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时期內,不許他們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們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們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們成为新人。对人民說来則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許他們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們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进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①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采取这种方法,是能够实现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的。1949年6月,毛澤东同志在《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民族資產階級“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进行許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

^① 毛澤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頁。

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①。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是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进行的。在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就通过各项政治、社会运动，通过企业改组、改造的实践，通过政治以及政府的政策、法令的学习等，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使他們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必须爱国守法、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识社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这就可以在企业的改造过程中，减弱或消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腐朽力量来进行反抗；并且可以启发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培养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在改造中起骨干作用。就是在全部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后，仍然需要继续把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这时企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生产和工作实践的基地，成为他们接受党和工人阶级教育和监督的基地，而且通过企业中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残余的斗争，以及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斗争，使资产阶级分子学会劳动技能，学会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经验，并从生产和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否定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把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就取得它们之间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作用。

第四，实行赎买政策 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是无代价地收回，而是实行赎买政策，这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工人阶级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时候，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作为向他们赎买的代价。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82页。

曾經規定資本家除获取不超过年息百分之八的股息外，还可从企业盈余中分取相当一部分紅利。从1953年到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贖买的形式采取按比例分配利潤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四分之一左右給資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贖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若干年內，每年付給資本家相当于其股額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原在企业任职的資方人員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門分配工作，并保留他們属于剝削性質的較高薪金，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給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贖买办法。

我国对资产阶级的贖买，是結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結合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的。它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錢来贖买，贖买的代价也不决定于资产阶级私有生产資料的价值。資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資料，本来无非是資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把它收归全民所有，本来是不需要代价的。但是，工人阶级既然允許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內存在，逐步对它进行改造，也就不能不允許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剩余价值的剝削。而贖买形式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又起着限制剝削和最后消灭剝削的作用，起着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贖买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工具。

然而，贖买还有其更重要意义。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把对剝削阶级生产資料所实行的贖买，当作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考虑的。贖买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革命的最大胜利。在我国，由于实行贖买以及其他必要的措施，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統一战线繼續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發揮其作用。由于这种政策，使得资产阶级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絕或者反对社会主义

改造；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調动资产阶级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在整个变革过程中，不仅生产力沒有遭到破坏，而且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所有制的革命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交出生产资料以后，工人阶级仍在一定时期內給资本家以定息，并安排他們的工作，保留較高的薪金。这就有利于对他們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减少改造中的阻力。这种贖买，也恰当地体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关系，而有利于把革命繼續推向深入。

适合中国条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政策 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一整套政策，是一个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研究了中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既体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則精神，又体现了切合中国社会特点的高度的革命灵活性。它体现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进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极其高明的策略思想。

有人认为，既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有利于国計民生的一面，就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的。这实际上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保存下去，让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复辟。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两个对立的生產关系，它們之間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在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逐步展开，逐步深入的。社会主义建設愈发展，愈要求生产关系和一切旧制度、旧意識的彻底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愈彻底，社会主义建設才能愈順

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愈迅速。

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是“阶级调和”的政策，他们要求用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即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挤垮他们，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是一种出于教条主义的从“左”的方面来的误解。他们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看不见革命运动的复杂性。事实上，简单的没收办法，也并不能一下子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过来。在生产、分配和管理制度上，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经营思想和技术组织上，都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进行改造。没收的办法，由于不曾对资本家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也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在可能条件下，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是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采取这样的办法，工人阶级可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同时，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我国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他们实行逐步改造，对于争取和团结国内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和宗教界的上层人物，也都具有重要作用。采取这种办法，也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知识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采取逐步过渡的改造办法，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会拖长改造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1956年，就基本上实现了所有制的变革。

由此可见，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一种极其坚定的阶级政策。采取这种政策，能够在生产关系方面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能够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成为劳动者，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这当然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第三章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限制 与反限制斗争

第一节 反对市場投机的斗争和国家 統一管理財政經济工作

解放初期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扶植 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面临着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恢复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国民經济。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經济，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經济和合作社經济的同时，也要利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来为恢复国民經济的目的服务。

解放以前，資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党反动統治的长期压迫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摧殘下，已經普遍地陷于奄奄一息的境地。沿海沿江的工商业城市相繼解放后，由于战事还没有結束，交通運輸和城乡物資交流的恢复都还需要一定的時間，資本主义工商业在原料供应、产品銷售和資金周轉方面还都有不少困难。这时，資产階級分子在思想上也是混乱和动荡不定的。他們一方面对于摆脱三大敌人的压迫，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有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多数人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和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对共产党还有疑慮，不少人对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

否会卷土重来，还心怀犹豫，有些人甚至对反动派抱有幻想。许多人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他们怕清算自己对工人的剥削罪行，怕增加工人工资，怕工人不服从调度，怕无利可图。因此，不少资本家抽走资金，消极经营；有的人等待观望，要等政府有一定办法之后，再经营业务；有的甚至抱着“吃光、用光、蚀光”就散厂的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则调集了资金，积聚起力量，利用当时通货膨胀还未制止的情况，在市场上抢购、套购物资，屯积拒售，进行投机活动。少数大资本家在解放前后逃往国外，其中大部分人以后又陆续跑回来；也有的是狡兔三窟，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都留有后路。

在这种情形下，要想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来为恢复国民经济的目的服务，必须一方面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加以扶植，帮助它们克服暂时的困难；另一方面限制它们的消极作用，特别是要对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投机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在解放以后的大城市，党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立刻就采取了发放工商业贷款、供给原料、以原料换成品、收购或代销成品、委托加工以及国家暂时让出一部分销售市场等实际措施，帮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经营，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展开了宣传教育工作。1949年4月，刘少奇同志曾亲到天津视察，会见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对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与资本主义前途等问题，都作了深刻而详尽的阐明。各地党和政府的负责同志，也会见了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同时广泛组织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并安排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和政权机构的工作。企业里的工人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下，主动地帮助资本家

克服困难，搞好生产經營，并对資本家的消极經營进行教育和批評。經過这一切努力，1949年資本主义工商业中，除了一些有害于国計民生和不适合人民需要的行业，都在很短的时期内停止或减少了停工現象，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一改过去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那种奄奄一息的情况。許多資本家也开始从动摇、怀疑中逐渐穩定下来。

1949年各大城市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放款，一般占到国家工商业放款总額的20—25%以上，上海占52.3%，天津占46.9%。收购加工的工作，当时主要是在紗布、面粉等业进行的。北京市1949年一年中花紗布公司向染織业收购和以原料交换各种布匹，占該业总产量的54%；百貨公司以交换、委托加工、收购、包銷等方式帮助了一千七百多个工厂和作坊恢复生产。上海市花紗布公司1949年以代紡代染、短期定貨及收购等方式維持了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私营紡織染厂。天津市粮食公司对面粉业的加工占該业生产总量的70—80%。

經過这种扶植，根据上海市1949年12月对全市六十八个工业行业的調查，在一万零七十八家工厂中，开工的已达61.7%，其中鋼鐵煉制工业、机器造紙工业、棉紡織业等开工戶数已占全业总戶数的80%以上，造船业、碾米业、医疗器械业等甚至达到100%。天津市私营工厂，不但紛紛复工，东亚企业公司并筹建毛織分厂，橡胶、織染、五金冶煉、机器等业，不少工厂都在增添机器、扩大营业。該市十四种工业的用电量1949年10月比4月增加了279%。解放較早的沈阳市，1949年6月至12月，私人資本主义工业，由九千七百二十七家，增加到一万二千零零七家，即增加了23%，工人人数由四万二千五百九十人增加到五万零四百一十三人，增加了18%。

这些措施不但帮助資本主义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經济之間初步建立了一些联系，在工业中开始出现了国家資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要有效地限制資本主义的消极

破坏作用，特别是要改变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带来的各种劣根性，是非通过严重的斗争不能办到的。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第一场严重斗争，就是1949年和1950年初反对市场投机的斗争。

反对市场投机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除东北外，各地物价还处于剧烈上涨的局面。

当时国内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国民党反动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人员需要全部包下来，交通、工业需要重点恢复，众多失业人口尚待救济，财政开支巨大。而国家收入则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状态，一时还难于恢复。194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还有三分之二的赤字，不能不增发货币来弥补。它的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生产恢复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则仍然不能避免物价上升的局面。但是，如果仅是这方面的原因，物价的上升应当是缓慢的，并且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涨风。这时物价剧烈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私人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解放初期国营经济还不够强大，私人资本主义在城市经济中还占有很大比重。民族资产阶级中不少人对人民政府还不信任，不少人认为共产党是“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于是，他们就利用国家和人民的暂时困难，乘国家之危，凭借他们所保有的经济力量，捣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疯狂地追逐暴利，掀起物价风潮。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上海市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批发物价上涨了约二十倍。物价的剧烈上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给各项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家以“证券大楼”为总指挥部，利用几千部电话和专设的对讲电话与分布在全市的据点联系，银元贩子四出

造謠，在十天左右的時間內，將銀元價格哄抬近兩倍。銀元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上漲，從上海解放到6月9日的十三天內，物價水平上漲了二點七倍，黃金上漲了二點一倍。當物價瘋狂上漲的時候，有些商號居然拒絕用人民幣來標價。其它大城市在初解放的時候，也都發生過類似的金融投機。

北京市的“糧老虎”王振廷，在1949年11月的物價漲風中，利用國營糧食公司規定私商每出售一袋面粉可向公司購進六十六斤小麥的機會，在11月11日由他的長順號面粉廠拋售面粉六百七十八袋，但大部分又由他的聯號永盛德、永盛厚買回，這樣套購了國營公司大批小麥。他又利用空頭支票進行場外交易，指揮各聯號相繼提高面粉售價，並先後囤積了糧食五十萬斤，面粉四百三十八袋。類似的“老虎”在其它城市其它行業中也都存在。

囤積居奇是這時投機資本獲取暴利的主要手段。上海一個紗商在1949年10月10日一天中，非法拆款購進棉紗八十九件，在11月漲風中出售，獲利達棉紗八十件。囤積之風盛時，有些棉商也購進布匹，布商也購進糧食，來回套購，倒買倒賣。

私人資本進行這樣猖獗的投機活動，按其性質說是與國營經濟爭奪市場領導權的鬥爭。不制止這種投機活動，求得金融物價的穩定，就沒有可能進行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就沒有可能真正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也不可能恢復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的生產經營。

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依靠無產階級專政，國營經濟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以行政措施配合經濟力量，進行了反對市場投機的鬥爭。在鬥爭中，黨和國家除了積極恢復國營工業，建立和發展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逐步樹立社會主義經濟在市場上的優勢外，主要採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金融管理。在國民黨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下，金銀外幣成為市場物價波動的先驅。在各大城市中，情況尤為嚴重。根據這

一情况,在建立与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同时,各地党政部門都及时发动群众,組織反銀元、金鈔投机的斗争。同时,公布了金銀外币的管理办法,宣布禁止金銀外币自由流通,并由中国人民銀行举办折实存款,挂牌收兌金銀外币。在上海,还封閉了金銀投机大本营“証券大楼”,将操縱市場、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二百余人逮捕法办。金融管制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对一般私营銀行、錢庄加强管理与监督,对于专门經營高利貸成为投机資本調动樞紐的“地下錢庄”(黑市金融业)及其他非法信用机构进行了严格取締。这些作法,基本上制止了金鈔投机活动,私营行庄业务也逐漸被置于国家銀行控制之下。

二、控制主要商品,通过商品抛售,打击投机,平穩物价。国家加强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調运工作,实行了对外貿易的管理,迅速地聚集了强大的物資力量。例如,由于征收公粮,当时国家已可掌握大量余粮,国营商业已控制了煤供应量的70%,棉紗30%,布匹50%,食盐66%。这是打击投机,穩定物价的物質前提。正如列宁所說:“如果我們能获得縱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有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周轉,那么作为国家的我們,就能够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再加上經濟权力。”^①在几次物价漲风中,国营公司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地大量抛售物資,促使物价下跌,給囤积投机者以有力的打击,把漲风平抑下来。同时国营商业也在市場有利的时候,购进物資。这种市場吞吐政策,壮大了国营商业的力量,取得了主要商品的市場领导权。

在1949年11月的物价漲风中,同投机資本的斗争达到极其激

^①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頁。

烈的程度，这一次漲风是由上海开始的。当时在投机資本的哄抬下，进口工业原料，如五金、化工等的价格节节上升。接着紗价、粮价也猛烈上漲。在这一期間，上海物价每天上漲20—30%。上海物价的猛漲又刺激了各地物价的上升。当时各大城市的投机資本家連成一气，利用电訊呼应，在市場上大肆活动，气焰十分囂張。为了打击投机資本囤积居奇，上海国营商业部門从10月10日至11月10日的一个月中，抛售棉紗共达二万件，棉布三十万匹；粮食抛售量更大，仅11月7日一天就抛售了九百一十一万斤，相当于平时交易量的十倍以上。但是，11月漲风既已蔓延成为全国性的物价漲风，仅由上海单独作战已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及时周密地研究了这一情况，作了全面布置，在全国各大城市調集了主要物資力量，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地一致行动，进行大量抛售。26日起各地物价就都开始回落，囤积居奇者措手不及，受到严重打击。这次漲风，迅速被制止。

三、加强市場管理。行政管理是直接体现国家政权作用的。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公布工商业登記办法，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記，未經核准不得擅自开业。（2）严格管理市場交易，建立交易所，实行主要物資的集中交易，禁止棧单买卖及兼做业外生意。（3）运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場价格。主要是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而成为市場上领导的价格；对沒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議价、核价制度。（4）管理采购。把大宗采购工作置于政府监督之下，防止爭购。（5）取締投机活动。对一般私营工商业的投机違法行为，由行政部門根据情节輕重，予以处理；对少数敌視人民政权、带头哄抬投机的反动資本家，依法制裁；对守法的私营企业，国家則予以保护。事实証明，在当时私人資本主义經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在采用經济力量的同时，运用一定的行政力量来同資本主义作斗争，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行政管理，不但打击了投机活动，而且对于保护和发展国营經济、对于鼓励私营工商业进行正当的生产經营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經過采取这些措施，不仅給投机資本以严重的打击，而且逐步建立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管理制度，陸續制定了有关金融、稅收、市場、劳資关系等法令。国营商业，則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上海国营商业部門的批發額已經占到批發市場总成交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重要商品市場，如食米、面粉市場，已占到二分之一的比重。

統一財政經濟工作与金融物价的稳定 要根本稳定物价，使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納入正常軌道，还必须平衡国家財政收支，制止通貨膨脹。这首先就要統一管理国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以便集中經濟力量。过去在民主革命阶段，各个解放区的財政經濟工作是政策上統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这样的管理制度适合于当时各解放区对敌作战的环境。但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全国的經濟活动和市場已經統一，如果財政經濟的管理工作不統一起来，国家就不可能灵活的調动国家所掌握的現金和物資，以保証对市場以及整个国民經濟的领导地位，而且会由于各地区財政經濟工作的分散管理，給資產階級分子的投机活动以可乘之机。因此，国家在1950年3月3日頒布了《关于統一国家財政經濟工作的决定》。

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內容有三：第一是統一全国財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第二是統一全国物資調度，使国家所有的主要物資如粮食、紗布、工业器材，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第三是統一全国現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現金，由中国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貨过多的現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現金。这三种統一都是为了避免財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費，达到了集中使

用的目的。同时国家还采取了核实編制、清理仓库、整理稅收、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措施，并发行了一部分公債。

平衡收支、穩定物价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全国人民踊跃交納公粮、稅款和购买公債，热烈支持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和政府工作人員，繼續保持过去供給制和低薪制生活，以节约国家支出。这样，国家財政收支就接近了平衡。1950年3月以后，不但不再需要增发通貨来弥补財政赤字，相反地，中国人民銀行存款总額在9月份比1949年12月份增加了十六倍以上。

財政經济統一管理和財政收支平衡以后，因通貨贬值而来的物价高漲的因素，已經不存在了。但是要維持物价穩定，还需要保証物資的供給。国家掌握的物資，不仅要能供給正常的市場需要，而且要有战胜任何投机者的能力。为此，国家在1950年間組織了空前大規模的粮食調运，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充分的粮食、棉花、紗布、煤炭、食盐等民生必需品，并克服了貯存的严重困难，战胜了投机商人的扰乱，使全国大城市和灾区的供应問題得以順利解决。

結果，从1950年3月起，物价即呈回落，以后便持續穩定下来。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同年12月为85.4，1951年为92.4，1952年为92.6。

北京、上海等八大城市的零售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同年12月为83.9，1951年为94.6，1952年为93.7。隨着物价的穩定，市場的利息也降低了。例如上海市市場利率在国家銀行领导下，从4月初至20日止，連續降低了八次，逐漸接近于抗日战争前的利率水平。貨幣在市場上的流通速度，也大大降低了。据統計，上海市在1949年物价比較平穩时期，每元人民币每月周轉达三十至四十五次，到1950年3月降到十五次；天津市在1949年物价比較平穩时期，每月周轉次数在二十二至二十六次之間，1950年1月間曾高达五十二次，3月1日至20日則減至八次。

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金融物价的稳定，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继军事上的胜利以后所取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它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正如刘少奇同志在1950年《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沒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行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中国的金融物价也是十二年来沒有稳定过的，人民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损失中付出巨额的资金。但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实现了这些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能作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这是我们国家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之下，就为一切正当的工商业及其他生产事业创造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使资本不致用于投机事业或损失于通货膨胀，而用在正当的工商业及其他生产事业上去。”^①

反对市场投机斗争的意义 物价稳定使我国国内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物价稳定，实质上就是国营经济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里夺取了市场的领导权；市场价格开始不再决定于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相反，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服从国营经济所规定的价格。有了这个条件，国家才能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恢复城乡贸易联系，以及利用价格和市場政策，调节私有制经济的生产 and 国民收入的分配。这就是说，原来的投机资本操纵下的以谋取投机利润、败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場，已经基本上改变

^① 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0年第2卷第1期，第7页。

为国营經济领导的以发展生产、服务于人民生活为目的的市場了。

財政經济工作的統一，物价的穩定和市場性质的变化，使我国国民經济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組。我国經济已經从不能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軌道，轉移到独立自主的、以社会主义国营經济为领导的新軌道上来了。

解放初期爭夺市場领导权的斗争，是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第一次大規模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多种經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各种經济成分都要通过市場来实现彼此之間不可避免的交换。资本主义經济不仅要通过市場实现其剩余价值，而且要通过市場价格背离价值的波动，来剝削小生产者和消費者，获取附加利潤。价格波动成为資本家获取利潤的一种手段。1950年3月以前，投机資本从物价上漲中所获得的利潤，实际上絕大部分最后是落到农民肩上，由农民来负担的。农民（以及个体手工业者）作为小商品生产者，也必須通过市場出卖自己的产品，換得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生产資料与消費品。他們的生产是受价值規律的支配的。当市場价格掌握在資本家之手的时候，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就必然会陷入对城乡资本主义經济依賴的地位，就必然要受资本主义剝削。并且，广大的农村，就会成为培育资本主义最肥沃的土壤。因为，市場价格背离价值而波动，是促使小商品生产者分化，一部分人破产，少数人发财致富的重要原因。

对于国营經济來說，除了它本身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的計划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要求有穩定的市場价格以外，它首要的任务就是同农民（以及个体手工业者）建立經济联系。在农民还保持着个体所有制的条件下，这种联系主要的也只能通过市場来实现，即通过市場收购农民的产品，供应他們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并通过市場和价格政策，保証农民的合理收入和指导农民的生产。

只有不斷地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和農民個體經濟的聯盟，共同反對資本主義的商業剝削和高利貸剝削，才能保證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優勢，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接受國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否則，資本主義經濟就會去同個體經濟聯繫起來，共同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在我國這樣小農經濟占絕大比重的國家，誰占領農村陣地，就會最終成為決定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重要因素。而在這個時候，無論誰要同農民建立經濟聯繫，都必須通過市場，通過商品在一定價格的交換。因此，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上大規模鬥爭的第一個回合，必然發生在爭奪市場和價格領導權的鬥爭上。

1949年到1950年初的市場鬥爭中，國營經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市場鬥爭的終止。這時候，我國國內實際上存在着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一是由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商品運動所形成的有組織市場，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一是由資本主義經濟和小商品經濟的商品運動所形成的無組織的市場，即資本主義性質的自由市場。這兩個市場是相互對立的，又是互相聯繫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常要干擾着有組織的市場，兩者之間就必然產生矛盾和鬥爭。這種市場鬥爭的目的，不僅在於打擊資本主義投機、穩定物價和鞏固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而且在於逐步改造無組織的市場，把它最後變為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一部分。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對個體經濟的改造過程，也就是對國內市場的改造過程。

第二節 調整工商業

統一財經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困難 市場物價的穩定，為工

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当时由于旧的經济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經济秩序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在經济生活中出現了一个短期的困难。公私經济之間、各經济部門之間、产銷之間都存在着严重的脫节和无政府状态。在晚解放区的許多城市里，发生商品滞銷的現象，出現城市工业品价格高于乡村、工厂成本高于产品市价等畸形状态。尤其是私人資本主义工商业，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一部分私营銀行和私营商业停业倒閉，許多私营工业也陷于存貨过多，負債累累和停工减产的境地。

如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錫、張家口十个大、中城市为例，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五千九百零三家，歇业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家，歇业戶数超过开业戶数六千八百四十七家。全国私营工业五月份主要产品产量同一月份比較，棉布减少38%，綢緞减少47%，毛紗减少20%，香烟减少59%，燒碱减少41%，普通紙减少31%。其中尤以过去买办性、投机性和信用膨胀特別显著的城市較为严重。以上海为例，当时私营銀行、錢庄倒閉一半，商店倒閉了十分之一（主要是投机商号），工业生产，在四月份，火柴产量不及一月份的六分之一，面粉、香烟、化学胶、玻璃、毛紗的产量也仅及一月份的二、三成至六、七成左右，百貨业六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中国国貨、丽华）的營業額三月份較一月份减少了50%以上，若干中、小型百貨业甚至减少了90%。从行业来看，也是过去通貨膨胀中发展起来的投机性行业所受打击最重，而适合广大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企业困难就較少。仍以上海为例，在倒閉歇业的上万个商戶中，絕大部分是金融業、金銀首飾業、高等旅館、酒菜業、时装業和粮食批发、布匹批发等投机商号，其他正当的商店为数很少。

工商业发生困难的原因，第一是由于社会购买力低。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长期掠夺，社会购买力本来是很低的。在占三分之二人口的晚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完

成,生产不能迅速发展,农村购买力不可能很快地提高,城乡交流还处于阻滞状态。这是发生商品销路暂时停滞的主要原因。在物价稳定以前,许多商品看起来是供不应求的,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人们在过去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为了避免钞票跌价的损失,不愿存放钞票,宁愿竞相囤积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的货物,加上投机商人的大量囤积,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变态的虚假的购买力。物价稳定以后,过去的虚假繁荣突然消失了,人们不但不需要囤积货物,而且投机家们还将过去囤积的货物都吐到市场上来。此外,在通货膨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无不借债囤积商品或原料,借款利率既高、数量也大。物价一旦稳定,囤货不易脱售,债务越背越重,为了清还欠债,不得不大量吐出存货。这样就形成市场上若干物资一时供过于求的现象。第二是由于社会性质改变,一些过去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商业,骤然失去了市场和服务对象。这些行业和企业包括在通货膨胀中发展起来的银行、钱庄和投机商号,专门为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和投机商人的特殊消费服务的奢侈性商业,如金银首饰以及制造奢侈品的工业等。它们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管理以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整个国民经济改组的逐步深入,它们就不可避免的会遭到困难。第三是许多资本主义企业机构臃肿庞大,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开支大,成本高。它们过去靠物价投机的高额利润维持,现在转入正常经营,就引起不少企业亏本歇业。第四是经营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中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也引起了减产、停工、倒闭的现象。

由此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基本上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弱点造成

的，是历史遺留給我們的。刘少奇同志在1950年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的演說中指出：这种經济上的脱节与困难，是我国社会經济秩序改組过程所不可避免的。当时的困难乃是胜利中的困难，进步中的困难，而胜利与进步的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困难的一切因素。他指出：使中国經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經創造出来，或者正在創造中。这就是：帝国主义已被赶走，海关和对外贸易已經掌握在人民手中；解放战争已接近于胜利的結束，工农业生产已开始恢复；东北与华北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其他地区也将在两三年内完成；財政經济工作已經統一，国家收支接近平衡，物价已經穩定；此外，我国还有很好的进行建設的国际条件。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人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經济政策的。但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却被暂时困难吓倒了。他們消极經營，乃至解雇职工，关厂歇店。这就加重了困难。有些人把当时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归咎于人民政府的財政經济改革。他們把当时情况說成仿佛是“經济危机”到来了。他們主張用发展資本主义的方法来找出路。有的提出所謂“不要与民爭利”，要求国营經济不要发展，只許資本主义經济发展。有的要求扩大信貸、降低利息、开办証券交易所等等，实际上是要恢复通貨膨脹。有的甚至仍然認為必須依賴美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援助”，美其名曰“打开国际貿易局面”。

这时在党内又有少数人产生了一种“左”的思想傾向。他們認為既然工人阶级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內統一財政和穩定物价，就不防趁私营工商业困难的时机，一举消灭資本主义，在一个早晨就实现社会主义。

毛澤东同志在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济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争》的报告。他精辟地

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指出：“我們現在在經濟战綫上已經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和物价趋向穩定等等，表現了財政經濟情况的开始好轉，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轉。要获得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业的合理調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經費的大量节减。”在报告中毛澤东同志对統筹兼顧、調整工商业与公私关系，又作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在統筹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灭經濟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資关系，使各种社会經濟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經濟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灭資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适合我們国家的情况的。”^①

調整工商业 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开始了調整工商业的工作。調整工商业包括的問題很多，最突出的是三个基本环节，即調整公私关系，調整劳資关系，調整产銷关系。

調整公私关系又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調整公私工商业关系，一是調整稅負。

調整公私工商业关系是当时我国国民經济多种經濟成分并存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在当时条件下，私营經濟無論在生产上和流通上，都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經济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們只有在国家的管理限制和国营經濟領導下，才能發揮这种作用，否則他們的唯利是圖的本質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对整个国民經济发生破坏作用。調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

^① 毛澤东：《为爭取国家財政經濟状况的基本好轉而斗争》，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5頁、7頁。

主要方法是對於若干重要私營工業實行加工、訂貨和收購成品等，使它們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按照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不再為商業投機而生產。在這種合理的生產中，取得合法利潤。對於私營商業則是在不允許投機的前提下，國營商業在價格與營業範圍上給私人商業以出路，共同為城鄉互助、內外交流而服務。因此，調整工商業關係的實質是：一方面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一方面要使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營經濟領導下面各得其所。在財政平衡，金融物價趨於穩定，國營商業已經代替投機商業成為市場的領導因素之後，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了。這就是說，已經有了調整公私關係，使各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的條件。

在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方面，各地根據中央調整工商業的方針，推行了以下各種有效措施：

擴大加工訂貨和收購。當時主要是通過它來調整工業，維持和恢復私營工業的生產。各地國營專業公司曾大量收購私營工業的滯銷產品。根據天津市信託、百貨、蛋品、糧食、石油、油脂六個國營公司統計，1950年1月至8月份對橡膠、顏料、紙張、文具、煙草、針織、蛋品、紗布、油料、五金電料、化工等業的收購總值共達三千四百七十五萬元，其中收購私營產品占76%。1950年全國私營工業產值中，加工、訂貨、包銷、收購部分所占的比重已達27.3%（1949年為11.5%）。從占全國私營工業生產總值比重將近三分之一的棉紡業來看，1950年下半年，為國家加工的部分即占其生產能力70%以上。1951年1月政府頒布了“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此後私營棉紡廠的生產，就全部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

調整公私商業的經營範圍和調整價格。國家規定當時國營商業主要力量應集中在批發上，它的責任在於回籠貨幣、調節市場、穩定物價。在零售商業中，國營商業所經營的數量以能夠穩定零

售市場价格，制止投机商人扰乱市場为限度。各地国营商业部門根据国家这一規定，都适当地調整了一些国营零售商业机构，并且主要经营粮食、煤炭、紗布、食油、食盐、石油等六种人民日用必需品。在价格方面，国营商业根据生产、运銷和消費三方面兼顧的原則，对地区差价与批零差价都作了适当的調整。例如上海市龙头細布的批零差价从4%提高至9.3%，棉紗从沒有差价調整为2.9%。

发放貸款。随着加工訂貨等任务的扩大，国家銀行对私营工商业的貸款也增加了。根据不完整的統計，国家銀行对私营工商业的貸款，1950年5月份为二千一百八十六万元，九月份增至四千九百六十三万元，增加一倍以上。对工业的貸款，主要是結合加工、訂貨、收购等任务，对商业放款則主要放在城乡貿易上。

同时，在市場管理上也作了适当的調整，以鼓励私商下乡采购，活跃城乡物資交流。其中主要的是：（1）适当放寬經營范圍的限制，凡直入产地的，只需报請主管机关备案，采购品种可不受本业經營范圍限制。（2）改变交易所的管理制度，例如允許場外成交，取消交易登記手續，放寬价格掌握幅度。（3）取消初級市場上一切不利于物資交流的人为障碍，例如任意扣留商品不許出境，机械执行証照制度等。

在調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各項措施中，加工訂貨具有特別重要意义。通过加工訂貨，国家一方面可以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能力，生产商品，供应人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可以切断资本主义工业在原料收购和成品銷售方面同市場的联系，使资本主义工业处于国家限制之下，防止他們在市場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謀取暴利。因此，加工訂貨就成为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級形式，成为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扩大加工訂貨不仅可以約束资本主义的盲目性，有助于恢复和发

展生产，也使国家可以充实国营商业的物资力量，以調剂市場供求，穩定市場物价。

調整稅負，也是当时多种經濟成分并存的条件决定的。国家对于农业和其他个体經濟、合作社經濟、資本主义經濟不能直接規定利潤上繳任务，只能通过稅收(及其他形式)实现其生产价值中的社会扣除部分。合理地調整稅收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調整稅負的实质是在保証国家財政需要的前提下，适当地減輕人民負担。由于战争結束，財政統一，減稅已有可能。

經過調整，农业稅方面，晚解放区的夏秋征收率由1949年平均占农业总收入的17%減为13%。工商业稅方面，对部分工业产品实行減稅或免稅；棉紗和棉織品、毛紗和毛織品合并征稅，并減低了稅率；工商业稅稅种由十四种減为十一种，貨物稅目由一千一百三十六个減为三百五十八个。征收办法，依企业會計情况采取自报查賬依率計征、自报公議民主評定、定期定額三种方法。工商业所得稅提高了起征点和最高累进点，增加了累进級数，使累进放緩。

1951年1月政府公布私营企业重估財產調整資本办法，以改正它們在过去通貨膨脹时期的虛假賬面，以利財務核算和合理負担稅款。

調整勞資关系是当时恢复和发展私营工业生产的另一个基本环节。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在整个社会中工人階級已是国家的領導階級，但在私营企业中，工人还处在被剝削的地位。有些資本家还不承認工人的民主权利，还想像过去一样压迫工人。在当时还容許資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必須实行“勞資两利”的原則，一方面要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又要使資本家能获得合理利潤，才最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調整勞資关系的基本原則有三：第一、工人階級的民主权利，必須確認；第二、必須首先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第三、勞資的問題，用協商方式解决，協商不成

由政府仲裁。

为了调整劳资关系，中央劳动部于1950年4月底公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用协商的方法，解决企业中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一切问题。各地根据这个指示普遍地在私营企业中组织劳资协商会议。截至六月底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已建立了九百二十三个劳资协商会议，其中有二百七十个是产业或行业协商会议，这些协商会议大都是在调解劳资争议、协商克服企业困难、协商搞好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对发展生产、改善经营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在私营企业中订立劳资集体合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和订立劳资集体合同，是在调整劳资关系中普遍采用的两个有效的措施。

调整产销关系则主要是如何逐步地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这是在经济改组中最繁杂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困难，也在于有私人经济存在，并在生产中占有重要比重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生产和个体生产都不能由国家直接计划。而在当时，一方面有许多重要工业部门急待恢复、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购买力一时还不能大量增长，又有若干工业部门出现生产过剩、产销不平衡的现象。而这后一部分，基本上是以私营工业为主的一些轻工业，如卷烟、火柴、肥皂等。调整产销关系，首先是调整这些部门的生产，因为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是矛盾的。在当时，高度的计划生产还不可能。但是，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商业资本又已基本上受到了控制，因而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一步一步地避免过去的无政府状态，而带有更大的计划性。

为了调整公私关系、产销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在1950年先后召开了粮食加工、食盐运销、百货产销、煤炭产销、火柴

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紡織工业、复制印染工业、卷烟工业、进出口和金融等一系列的全国性的专业會議。在这些會議上，公私代表协商解决公私关系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并且具体拟定了各行各业产銷計劃。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以上一系列調整工商业措施的貫徹执行，1950年7月以后的市場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場交易由停滞轉为活跃，工业生产迅速增长，私营工商业由上半年歇业多开业少的情况一变为开业多歇业少。在調整过程中，它們經歷了一次改組。有利于国計民生的行业、企业，在国营經济的领导下得到了恢复，不利于国計民生的行业、企业被削弱和淘汰。这說明調整工商业的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鼓励了私营工商业生产經營的积极性，并把它們初步納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軌道。

仍以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錫、張家口十个城市为例，到了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共有三万二千六百七十四家，歇业的共有七千四百五十一家，开业超过歇业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家。市場成交量迅速增长，某些工业品甚至产生供不应求現象。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青島五市面粉、大米、棉紗、棉布四种主要物資市場成交量的統計，以1950年4月份为基数，9月份面粉增加了13%，大米增加了65%，棉紗增加了84%，棉布增加了278%，10月份市場情况更好，計面粉增加了54%，大米增加了289%，棉紗增加了128%，棉布增加了23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加，以1950年1月份的产量为基数，上海棉紗8月份的产量已增长了6%，以后逐月上升，到11月份增长了77%；水泥、玻璃、顏染料、面粉、毛紗、化学胶的产量，有的在6、7月份开始，有的在9月份开始先后超过了1月份的水平，到11月份，水泥增长了30%，玻璃增长了283%，顏染料增长了74%，面粉增长了7%，毛紗增长了13%，化学胶增长了58%。私营商业方面，如天津市花紗布綢业，自1950年6月份开始好轉，8月份平均每戶銷貨額較1月份

約增加二倍；百貨業 12 月份銷貨額較 1 月份增加一倍多；進出口業 11 月份進出口總值較 1949 年同期增加將近六倍。

為了鼓勵私人資本投資於生產事業和對私營企業進行管理，政府在 1950 年 12 月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條例規定企業的設立須經政府核准和進行登記，變更營業範圍和資本以及遷移、轉業、停業、歇業等均須經核准和辦理登記。私營企業應接受國營經濟的領導，執行政府制定的重要商品的產銷計劃，執行政府一切有關勞動法令。條例規定了企業盈餘的分配辦法：獨資、合夥企業一般按通例辦理。公司組織的企業在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繳納所得稅和彌補虧損外，在提存公積金（10% 以上）和分派股息（最高不得超過年息 8%）之後的餘額中，股東紅利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廠長等酬金一般應不少於 60%，改善安全衛生設備基金和職工福利基金及職工獎勵金合計應不少於 30%。這個規定保證了資本家一定的利潤收入，這在當時國民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的條件下，有利於刺激資本家的投資積極性，有利於把社會游資吸收到生產事業上來。

為著進一步活躍經濟和鞏固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人民政府於 1950 年冬及 1951 年上半年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城鄉物資交流的工作。這個工作改變了因戰爭和通貨膨脹而造成的多年來的城鄉物資交流停滯狀態，恢復和發展了城鄉貿易。在國營經濟領導下，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促進城鄉物資交流中，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城鄉物資交流也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進一步活躍。

黨和政府領導着晚解放區的廣大農民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區，農業生產都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村購買力迅速增長。節約國家機構的經費的工作也進行得很順利，使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濟建設。在進入 1951 年以

后,市場出現了“淡季不淡”的新情况。随着市場的繁荣,資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发展。以1951年与1950年比較,全国私营工业的戶数增加了11%,职工人数增加了11.4%,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戶数增加了11.9%,从业人数增加了11.8%,批发額增加了35.9%,零售額增加了36.6%。1951年私营工商业全年盈余估計达三十七亿一千七百万元,比1950年增加了90.8%。

調整工商业是我国国民經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軌道轉移到独立自主的人民經济的新軌道上来所必須有的一个过程。它是在多种經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使国家經济生活加以組織和計劃,克服无政府状态,使各种社会經济成分在国营經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經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一項必要的措施。它不但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而且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造成有利条件。整个調整工作是以調整公私工商业关系,以促使資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經济领导下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为中心的,因此,它也是改造資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个步驟。

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 市場斗争和調整工商业,对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來說,都是一种实际而生动的教育。投机資本家在市場上进攻的失敗,使得資產階級初步認識到工人階級在經济战綫上同样具有偉大的力量;財經統一和物价穩定的迅速实现,又使他們不能不欽佩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与效率。調整工商业的措施破除了資產階級的許多怀疑和顧慮,鼓励了他們生产經營的积极性,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在經济上的联系和联合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党和政府在研究調整的政策措施、制定稅法和調整价格、拟定許多行业的产銷計劃的时候,都吸收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参加,使他們在思想上受到启发。同时,在調整

工商业的过程中，組織資產階級分子学习共同綱領，学习政策法规，对他们进行教育。經過調整工商业的實踐，諸如“經濟危机到来”“不要与民爭利”以及要求恢复“物价自由”等叫囂和謬論受到了打击和批判，民族資產階級的多数人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認識。

这期間，党和政府引导民族資產階級参加了我国人民偉大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等全国規模的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他們受到了深刻的现实教育，特别是启发了他們的爱国主义，比較系統而深入地批判了他們中一些人的“第三条道路”的殘余思想。

在解放初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大多数人虽然一般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內政、外交政策，但是，他們原来在民主革命中就是一个动搖的階級，这时候，他們之中許多人对于党的一些彻底的革命措施，还是有怀疑或抵触的。例如，他們有些人不主張大力鎮压反革命，而要求对一切階級一切人实行“仁政”。不少人不贊成彻底的土地改革斗争，而主張“和平土改”，或者給地主以代价，有的甚至公开为地主階級辯护。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民族資產階級中更有許多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崇美、恐美乃至亲美思想，主張“关門建設”，“不要引火燒身”。

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資產階級这些思想受到严肃的批判，他們中不少人，也在斗争實踐中認識了自己的錯誤。鎮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揭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階級大量的罪恶事实教育了他們。中国工人階級領導的国家在剛解放不久，就能打敗美帝国主义，使他們不能不服膺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的英明，承認共产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路綫是唯一正确的路綫。美帝国主义这个紙老虎被戳穿，中朝人民的偉大胜利，也不能不影响他們

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在运动中，党和工人群众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提高他们爱国主义思想；批判他们崇美、恐美、亲美的意识，帮助他们划清敌我界限。经过运动，资产阶级的许多人就比较彻底地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在全国人民爱国运动高涨的鼓舞之下，工商界人士也采取了积极行动。上海市工商界曾组织了十五万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其他大中城市以至乡村集镇工商界也都纷纷参加同样性质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城市的工商界也一个接一个地订立爱国公约和爱国业务公约。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响应了增产捐献运动，作出了成绩。工商界对捐献运动的贡献，是和工人群众的爱国热忱分不开的，捐献运动与增产节约结合起来，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经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这种斗争，按其性质来讲，是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和巩固工人阶级对国家领导权的斗争，是争取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加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五反”运动

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2年上半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进行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五反”斗争是针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行为而开展的，它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又一次尖锐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根源于它的阶级本性的消极一面，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限制它

对国計民生的消极破坏作用。階級斗争的激烈程度，則决定于資產階級反对工人階級限制、向工人階級进攻所采取的手段及其严重性。調整工商业以来，特别是在1951年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帮助下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图、損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思想本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願望也进一步暴露和增长起来。資產階級中許多人不能满足于所已經得到的15%以至30%的高額利潤。为了追求非法暴利，达到扩大私有財產的目的，他們竟公然違背共同綱領，不擇手段地向社会主义經濟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在財經統一以后，資產階級已經不可能公开地在市場上和国营經濟爭夺領導地位了。不法資本家便利用社会主义国营經濟和资本主义經濟之間的联系，用“五毒”的办法，也就是用偷工减料、偷稅漏稅、盜窃国家資財、盜窃国家經濟情报、行賄等办法，企图削弱社会主义国营經濟，抗拒国营經濟对于资本主义經濟的領導。

早在1951年资本主义經濟剛剛摆脱困难境地，走向好轉的时候，許多資本家已开始用种种借口，抗拒国家的加工訂貨，追求自由市場。例如1951年第三季度在布置元釘任务时，前华东工业部拟对上海市三十家工厂进行加工，但只有九家厂勉强接受。内衣业更为囂張，起初只个别厂不接受任务，后来竟发展到全业联合抗拒百貨公司的加工任务。当不得不接受加工訂貨任务时，他們就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等办法大肆偷工减料，騙取国家財產。天津市三年来資本家偷工减料的总值达二千六百一十二万元，以营造、机器、五金、棉紡、搪瓷、医药、橡胶等业最为严重。有些不法資本家的罪恶活动真是令人发指。他們不仅在經濟上直接損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由于制造不合規格的工具、設備乃至含有毒

質的食品和卫生用品，曾經損害了国家的經济建設和国防建設，以至危害着抗美援朝战士們的生命。

不法資本家在承包治理淮河的工程、部件时大肆偷工减料，在售卖器材时以旧頂新、以次充好。济南利生行資本家把旧的流速仪、經緯仪等冒充新貨卖给治淮委员会，不仅使国家損失了三万八千元，而且因为这些仪器破旧失灵，致使淮河一百五十多个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记录失去了应有的准确性，影响了治淮工程的进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法商人不仅把一穿就断底的胶鞋，一创就断、一碰就卷口的洋鑊、鉄鍬卖给人民志願軍，还用坏牛肉、臭蛋粉供应前綫，使志願軍不能吃好、吃飽，甚至中毒致病。有的更用在垃圾堆里拾来的腐烂棉花作成含有大量病菌的“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願軍，致使有些伤病員，不該殘廢的殘廢了，不該牺牲的牺牲了。

偷稅漏稅是私营工商业普遍的違法行为。根据1950年繳納第一期营业稅后稅务局的典型調查，上海在三百五十一家納稅戶中有逃稅行为的占99%，天津在一千八百零七家中，有偷漏稅行为的占82%。他們偷稅漏稅的手法极多，其中普遍采用的是設假帳、伪造单据、少記营业收入、多記开支，以隱瞞其真实情况。

不法資本家为了达到偷盜的目的，除派出“亲信”打入国家机关作为他們的內探外，还用請客、看戏、送禮、吃回扣、送佣金、送干股等办法来賄賂和收买干部，甚至用“美人計”来引誘和腐蝕国家工作人員。他們使尽一切卑鄙手段，要把国家干部拉下水去，充当他們在国家机关中的代理人。

利用經济內奸盜窃国家經济情报，也是不法資本家慣用的进攻手法。例如1950年8月北京、天津的白糖漲风，主要就是由不法資本家盜窃了国家經济情报、兴风作浪所引起的。

他們进攻的第五个手法是直接盜窃国家資財。有的是騙取、盜卖国家資財，有的是隱匿应由国家沒收的敌伪財產。

此外，一部分资本家并以“聚餐会”“座谈会”“联营社”等名义，有计划、有步骤地密谋破坏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办法。

根据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时间的材料，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九大城市四十五万多私营工商户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的有三十四万多户，占总户数的76%。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引用的一段话一样：“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他活跃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人不顾一切的法律；300%就会使人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①

“五反”斗争 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但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害，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也有着严重的危害作用。有些资本家曾公开叫嚣“分工论”，要国家只搞重工业，私营搞轻工业，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只木桶一起滚”。他们许多人不愿意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认为既然是四个阶级联盟，就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思想 and 行为，正在到处侵蚀着工人阶级的队伍，侵蚀着国家机关干部及其它社会工作人员。资产阶级的进攻，是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滋长的一个原因。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1页，注250。

的称号；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击，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① 对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如果不坚决給以反击，听任资本主义在我国自由泛滥，国家的前途就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因此，1952年上半年党就领导全国人民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干部中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进行了“五反”斗争。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工人阶级争取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所必不可免的一个重大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必要的。“五毒”泛滥，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有使我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危险；只有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开展严肃的斗争，对他們的猖狂进攻給以彻底的打击，才能达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

“五反”运动是在党自上而下的领导和工人、店员以及全国人民自下而上的支持之下发动起来的。运动是以号召资本家自我检查开始的。在运动开始时，违法资本家曾经企图蒙混过去，不肯坦白交代“五毒”行为，有的还组织“攻守同盟”，负隅顽抗。但是，当工人和店员动员起来彻底揭露了违法资本家的卑鄙行为，全国劳动人民都愤怒指责的时候，他們的“攻守同盟”就瓦解了，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在这个运动中，党不但最广泛地发动了工人、店员群众和社会力量，还动员了资本家起来参加反对他們阶级内部非法分子的斗争；还有不少资本家的家属和子女，在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的教育下开始认识了“五反”运动的意义和自己的利害关系，积极帮助自己的亲人坦白。这就使得运动具有全民的性质和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9页。

雷霆万钧的浩大声势，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五反”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取缔他们违法越轨的行为，使他们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真正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队伍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①这一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总的说，它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只是对少数“五毒”俱全坚持不法行为的人，才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五毒”行为，是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消极反动的一面发展到高峰的表现。但是在这个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仍是具有两面性的。当时，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引起阶级关系紧张，学术界某些同志曾经为这种局势所迷惑，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分析上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如认为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两面性“是出于这个阶级思想的自私自利的本质”，因此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表现的积极性的一面如进行合法经营和拥护共同纲领，也以“为着个人私利的目的”的理由，而认为是反动性的表现。这样，就必然导致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一面性即政治反动性的结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当资本家经过严肃的斗争而又表现愿意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时，党和国家就根据“斗争从严，处理从宽”“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宽大与严肃相结合”以及“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寬，少数从严；坦白从寬，抗拒从严；工业从寬，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寬，投机商业从严”等原則进行处理。在处理时，將資本主义工商业划分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严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类，区别对待，分別处理。处理結果：守法戶約占总戶数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5—30%；严重違法戶占4%；完全違法戶約占1%。对基本守法戶只退違法所得的一部分，对半守法半違法戶只退違法所得而不罰款。这样就安定了占总戶数95%的大多数資本家，而使严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陷于孤立。

“五反”斗争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猖狂进攻挑起来的，斗争的結局，工人階級取得了完全胜利，而資產階級則遭到彻底失敗。

“五反”斗争的历史意义 “三反”“五反”运动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打击了資產階級分子的“五毒”恶习，改变了从旧社会来的某些人認为投机取巧、钻营牟利、盜窃公家資財是“聪明、能干、有本領”的錯誤看法，而开始認識这是可耻的勾当。經過运动，給国家带来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社会經济各方面产生了許多积极因素。

“三反”“五反”运动，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广大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帮助他們划清同資產階級的界限，增强对于資產階級侵蝕的抵抗力。腐蝕政府机关、危害国家建設的“三害”和“五毒”被大量扫除出去，为国家的經济建設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創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巩固了社会主义經济在国民經济中的領導权，深刻地改变了国内階級力量对比，为資本主义工商业和資產階級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主要是：

一、通过运动，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开始树立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取得了政治优势。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企业里本来具有监督资本家的权力的，但是，这种监督权，只有在“五反”运动以后，经过严肃的阶级斗争，才真正建立起来。这就改变了过去资本家独断专行、独揽大权的局面。

二、通过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集中地暴露了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本质一面，使人们认识到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必要性。这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给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社会条件。

三、通过运动，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民主改革，在经营管理上，有了某些进步。并由于运动中加工订货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着改造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四、通过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在实际上体验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使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多数人认识了反对工人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五反”运动以后，资本家再犯“五毒”的情况减少了，愿意接受国家管理、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群众监督的人逐渐增多。这就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采用温和的形式。同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开始起了比较明显的分化，逐步出现了一批进步分子，这就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资产阶级内部培养骨干力量，使他们在以后的改造中起到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总之，通过这一次斗争，工人阶级进一步团结了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充分体现了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调整生产经营、巩固“五反”成果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市场上一度出现物价下降、交易停滞的现象，资产阶级的许多人对党

的工商业政策又产生了新的怀疑和顾虑。为了不影响生产，各地从1950年3月起，即动员工人群众，提出“五反和生产两不误”的要求，并根据中央指示，恢复和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调整公私关系。6月间国家对加工订货的工缴货价问题，规定私营工厂“按正当合理的中等标准来计算，每年可以获得10%左右、20%左右到30%左右的利润”的原则，鼓励了私营工业的生产积极性。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又在银行利息、税收、物资交流、劳资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的措施。“五反”运动期间，许多私营商业陷于半停顿状态，群众也不愿意同私商打交道，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扩大了经营，以满足市场需要。运动结束后，私营商业仍陷于困难，1952年冬，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商业的工作，主要是调整差价，并让出一部分国营商业的业务，使私营商业迅速恢复，公私关系趋于正常。

1952年，国家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及收购的总产值达五十八亿九千八百万元，较1951年增加了13.6%。上海市1952年3—6月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及收购的总产值较1951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占到该市私营工业营业总额的60%，关系厂扩充到七千余家。

中国人民银行于1952年6月份起，决定降低存放利率，对私营工商业的放款利率由二分四厘至三分降低为二分零五至二分九厘五。同时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放款额，在放款条件、时间和方式上都作了适当的修改。

中央贸易部于1952年4月即召开了全国土产交流会议，制定了计划。接着，西北、中南、华北、华东各大区都召开了会议，各地区物资交流迅速展开。上海市到1952年11月底参加各地的物资交流会共有二百七十五个地区，购销额达二亿九千余万元，其中私商占46.5%。

1952年11月间中央发出了调整商业的指示。各地调整的主要内容是：(1)适当扩大批零差价，提高起批点；适当扩大地区差价，尤

其是交通便利地区和偏僻地区間差价。(2)适当調整和划分公私經營范围，国营及合作社商业适当地减少零售点和零售次要品种。(3)調整市場管理，活跃物资交流。如上海市扩大了五千六百一十五种商品的批零差价和一百七十四种商品的地区差价，提高了十类商品的起批点，停止了国营二十二种商品的零售业务和十一个零售点、二个門市部。

同时，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工商界組織学习共同綱領，对他们进行了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爱国守法的教育。1952年6月，工商界召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會議，筹备成立工商界全国性的組織；周恩来同志及陈云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話。他们重申了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执行“公私兼顧、劳資两利”的政策，对如何正确認識“五反”运动的意义及工商界的前途等問題也作了深刻的闡述，对工商界中某些錯誤思想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工商业联合会，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組織通則的規定，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組成的人民团体”，包括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它主要負担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綱領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另一方面是“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見，提出建議”。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受同級人民政府的监督和指導。各地方的工商业联合会，是解放前的旧商会、同业公会經過改革改組后建立的，也有的是新建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于1953年正式成立，所属有省級工商联組織二十八个，市、县工商联組織一千九百一十三个。

“三反”“五反”运动結束以后，从1952年下半年起，有許多城市在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依靠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领导私营工业进行了企业内部的各种調整和改革工作。例如：发动民主改革，改进經營管理制度；进行生产改革，

改进或統一操作方法,改进或統一規格和質量,推行技术交流和技术研究;举行有关行业之間的供、产、銷平衡會議,訂立協議和合同;以至开展比較全面的有系統的增产节约运动。根据武汉市八十七个私营工厂的統計,从1952年8月到年底止,工人提出六百九十六件合理化建議,使生产量比“五反”运动前提高30—50%。許多大型工业企业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参加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人員,一般有党委、工会、青年团、工程技术人員、技术工人、職員和資本家的代表。它是企业的民主管理机构,也是工人监督的有效形式,对于保证按时、按質、按量完成加工訂貨任务和推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作用。

經過一系列的工作,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經營迅速恢复,并且在1953年有了較大发展。資产阶级的怀疑和顧慮逐漸消除,情緒穩定下来。这就巩固了“五反”斗争的成果,工人阶级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民族資产阶级团结起来了。

第四节 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組 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国民經济恢复工作的完成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恢复国民經济的任务,到1952年已經完成,并在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不仅較1949年增长了近一倍半,而且超过了战前(1936年)生产水平的22.3%。生铁、鋼等产品超过战前一至二倍,电力、原煤也超过半倍以上。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48.6%,其中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42.8%,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36年)增加了11.3%。同时,国民經济結構也发生了变化,現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

占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7%，增长至26.7%。交通运输方面及国内市场也都恢复并有了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了财政平衡、国际贸易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新局面。

国民经济发展的上述成就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这种根本好转，正是党和政府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贯彻执行了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约国家机构经费三项措施的条件下列取得的。

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并不是在原有基础和原有规模上的恢复，而是在新的基础、新的轨道上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在广大的农村中，已经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城市中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树立了稳固的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也有了初步发展。官僚垄断资本被消灭，农村富农经济在土地改革中被削弱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并且经历了深刻的改组改造过程。恢复工作又不仅限于整顿和改组原有的生产力，而是边恢复边建设，把充分利用原有的生产能力和重点建设结合起来。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已经开始采用了某些最新型的机器设备，有了一些新的现代化水利工程。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与改造 恢复时期中，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优先发展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好转而得到恢复并且有了一些发展。1952年与1949年比较，资本主义工业的户数增加了21.4%，职工人数增加了25.1%，总产值增加了54.2%；1952年与1950年比较，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6.97%，从业人数增加了2.24%，零售额增加了18.6%。这对恢复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加强工农联盟等方面是有利的。

毛澤东同志早在1947年就指出,在我国革命胜利以后,对民族資本主义經济“还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經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①。但是,資本主义工商业不是照老样子恢复的,它們經歷了一个改組改造的过程,并且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資本主义工商业所經歷的改組与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們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改变了。1950年到1952年,資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比重由51.8%下降为39%;私营商业批发額占全国商业批发总額的比重由76.1%下降为36.3%,它們的零售額比重由85%下降为57.2%。在几种重要工业部門中,資本主义生产的比重下降尤大。进出口貿易和金融業中,資本主义已退居极微小的地位;运输業中,資本主义比重也显著地下降。1952年在我国国民收入中,国营和合作社經济占20%以上,个体經济占70%以上,資本主义經济占不到7%。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私营工商业和它們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如下: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私营工业: 戶数(万戶)	12.9	13.3	14.76	14.96
职工人数(万人)	164.38	181.59	202.28	205.66
总产值(亿元)	68.28	72.78	101.18	105.26
在公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	63.3	51.8	50.1	39
私营商业: 戶数(万戶)	—	402	450	430
从业人数(万人)	—	662	740	676
批发額(亿元)	—	89.4	109.4	69.8
在商业机构批发額中所占%	—	76.1	65.4	36.3
零售額(亿元)	—	101.0	132.8	121.9
在商业机构零售額中所占%	—	85.0	74.5	57.8

^① 毛澤东:《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254頁。

几种重要工业部門中，资本主义工业所占比重：1949年电力占36%，煤28%，鉄8%，面粉79%，棉紗47%；1952年电力占6%，煤12%，鉄3%，面粉46%，棉紗37%。

1952年私营进出口商的自营貿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7%。1950年6月到1952年12月，私营銀行和錢庄經營的儲蓄存款和私营工商业存款占全部这两类存款的比重，由41.4%下降为7.2%。

1950年到1952年，私营輪駁船货运量占全国輪駁船货运总量的比重，由51.98%下降为37.39%；客运量比重由85.31%下降为63.39%。同时期，私营汽車货运量占全国汽車货运总量的比重，由83.69%下降为66.69%；客运量比重由61.83%下降为35.03%。

第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利于国計民生的行业，特别是有利于国計民生的工业，在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尤以重工业和造纸、棉紡織、医药、文教用品等行业发展較多。而不利于国計民生的行业则受到限制，趋向衰退与淘汰。一个行业之中，也是不平衡的，一般是經營較好的有所发展，而有些投机和違法严重的戶受到淘汰。地区分布上也略有改变，一般是內地城市发展較多。这种恢复、发展与衰退、淘汰并存的状态，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它表示我国經濟从旧的經濟軌道向新的經濟軌道轉移，表示资本主义工商业經歷着深刻的改組过程。

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經營方向上也有显著变化，許多工商行业都面对大众，經營劳动人民所需要的商品。在国家帮助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下，企业内部的生产 and 經營管理，也有所改进。

获得恢复与发展的行业大体有：（1）重工业如机器制造、鋼鐵冶炼等工业。如以1949年为100，1952年全国私营机器制造业的戶数增为325.5，产值增为497.9；鋼鐵冶炼业戶数增为346.8，产值增为503.9。（2）供应当地居民需要的工业及服务于經濟文化事业的商业。如造纸、日用棉紡織、針織品等工业及五金、日用百货、医药、

文教用品等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全国私营造紙业1952年比1949年戶数增加了88.09%,产值增加了187.9%,同期日用棉紡織业戶数增加了25.84%,产值增加了59.35%。(3)有利于城乡物资交流的行业。如經營次要农产品、畜产品、副产品及土、特产品等行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4)对国計民生关系較少、国营經济及合作社經济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中尙未經營或經營不多的行业。如縫紉业和一些零星日用品及食品等的生产和販运行业。全国縫紉工业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73.9%;上海市在国营及合作社不經營的七十六个行业中,1952年私商的營業額比1950年增加43.72%。

趋向衰退与淘汰的行业大体有:(1)从事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及金融投机的行业。如銀号、錢庄、股票、房地产、保險及其他投机商号等都迅速地被淘汰了。(2)居間性的和某些服务性行业。如牙行、报关、轉运中間商等。在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后,許多土、特产品直接与銷地建立了关系,新的商品流轉渠道逐渐形成,同时海关、航运、铁路等对货运的服务方式也有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业就失去了它們存在的条件,在改組过程中逐步被削弱与淘汰。(3)供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奢侈享受的消费性行业,如高級百貨、洋酒、金銀首飾、舞場、珠宝、玉石、专门經營进口消费品的行业以及迷信品等行业,由于銷售对象消失,迅速陷于衰落和被淘汰。(4)一些与国計民生和国家經济建設有重大关系的商业行业,如花紗布、木材、水泥、粮、盐、煤及进出口貿易等,因国营及合作社商业直接經營这些商品而受到削弱或被代替,特别是从事批发业务的,不可避免地逐步受到削弱与淘汰。

第三,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向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軌道发展。相当部分私营工业納入了加工訂貨,有些大工业企业已实行了公私合营;私营金融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一个輔助部分;交通运输业(主要是輪船运输业)也有重要一部分实行了公私合营。(詳細情况将于第四章中論述)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 从以上各种情况中可以看出，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实际上，它们已改变了过去多少年来的旧面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又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一步割断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的联系；经过市场斗争、调整工商业、民主改革、“三反”“五反”斗争，他们已由原来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工商业，基本上改变成为国家管理、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群众监督下的，主要是为人民需要服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

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资本家们安于合法经营，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并从企业利润中只分取合理的部分，那末，他们的企业就不仅能够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而且，就这个意义上说，即已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开始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了。也就是说，它们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有了某些变化。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即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还都是资本主义的。但是，无论资本家或工人，他们都是作为社会的阶级的人存在的，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改变，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直接生产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中，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和适应于这种经济成分的上层建筑。其余的经济成分，都不能不受这种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政权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的影响。并且，对于某些过渡性的经济成分来说，其性质是直接受国家政权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所左右的。列宁曾经指出，合作社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

資本主义国家中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而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它是有利于工人阶级、抵抗资产阶级的。在我国国民經济恢复时期，民族資本主义工商业，如果它們守法經營，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管理，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济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監督，它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不受这些条件的作用和影响。

下面我們从两方面来考察在这些条件下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即（1）資本家所有制和資本家的資本权利方面，（2）工人的地位和工人劳动方面。

資本家所有制和資本家的資本权利受到了限制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資本主义工商业仍然是資本家所有，但是，資本家所有制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資本家所有制，已有所不同。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本家所有制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国家全力保护这种所有制，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求把这种所有制普遍到一切經济领域中。在我国，則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国营經济掌握着經济命脉。无产阶级的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資本家的生产資料所有权和其它資本所有权”，但同时要求“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宪法第十条）私有财产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并且，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对城乡土地和其它生产資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宪法第十三、十四条）

資本家所有制不可能普遍到其它經济领域中去了，特别是不能像資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依靠剥夺小生产者、摧殘个体所有制經济来扩展自己。相反，資本主义工商业在經營范围上，是受国家的限制和管理的，在一些有关国家經济命脉的部門，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就已被国营經济所掌握。并且，由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开

业、增资、添设分支机构、迁移、转业、合并等均须经政府核准，由于机器设备、基本建设材料、钢铁、动力、主要原料和市场都是掌握在国营经济手里，资本的“自由移动”已经受到了限制，事实上只能在一些次要的轻工业部门和小商业间移动。由于这种情况，资本主义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事实上，在我国制度下，资本家所有制是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被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所谓公私兼顾，即“在符合大多数人民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①。其所以被照顾，是因为资本主义这时还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必须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扶植与鼓励私营工商业，但只是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共同纲领第三十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商各部门中公私比重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改组，就是“公私兼顾”原则的具体表现。在这里，资本家所有制，并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独立地存在的，而是在“兼顾”的原则下允许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在企业中，资本家是绝对的支配者。在我国制度下，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一样，享有公民权，但是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是被领导的阶级；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仍然具有经营管理权，但是，他们的经营管理权已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国家和工人的管理、监督的。

资本家在企业中的权利，受到国家法令的限制，受到国家所规定的某些生产和销售计划的限制，受到工人群众的监督，受到社会的监督。资本家的许多活动，例如市场投机，操纵价格，以及各种欺詐、盗窃行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

^①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的报告》，《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3页。

且簡直是資本家“天賦”的自由权利。在我国制度下，則不仅要受法律的制裁，并且也为社会所不容。事实上，經過市場斗争，經過“五反”运动，在国营經济掌握市場和价格领导权的条件下，資本家的这种“自由”已經不很多了。

資本家在企业内部的經營管理上，必須遵从“劳資两利”的原則。劳資两利的前提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我国社会制度决定了的，也是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資本家权利根本不同之点。周恩来同志指出：“不能抽象地讲劳資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資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經济之目的。”^①这就是說，資本家必須承认工人的民主权利，接受工人监督；在这个条件下，行使資本家的权利。这样，在企业的經營管理上，就不是資本家专断独行，而是要劳資协商。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劳資协商的范围还主要是有关劳資关系的問題，特别是有关受雇、解雇、工資、福利、劳动条件等問題。但是，“五反”运动以后，劳資协商的内容已逐渐扩大，已涉及到生产經營的問題了。

資本家在分配上的权利，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盈余的分配上，要受《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的約束。依照这个条例规定，資本主义企业盈余的分配要兼顧到国家、企业、工人、資本家各方面的利益，并且首先保证国家的稅款和企业的积累。但是，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对資本家剝削的限制还不大，这是反映了当时国民經济发展的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鼓励私人資本投向对国計民生有利的事业。

工人的地位和工人劳动的变化 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資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具有两重地位。一方面，他們是整个工人阶

^①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的报告》，《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5頁。

級的一部分，而这个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掌握了政权，在整个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威信。从这方面说，他们和国营企业的工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企业中对于资产阶级处于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具有监督资本家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工人在企业中仍处在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他们还是被剥削者，还是劳动力的出卖者。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无非就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在使用中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如果资本不能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来获得它的使用权，资本主义剥削就没有可能了。在我国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的这种关系也是存在的。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劳资关系才能根本改变。但是，由于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资本家所有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我国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关系以及工人的劳动，具有了某些新的特点。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购买劳动力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这种分离，只能由劳动力出卖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这个事实来克服，……”^①；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实现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东西，对于这些东西，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②。但在我国过渡时期，工人已不是这样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和国营企业的工人一样，是社会的主人，是公有的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保护工人劳动的权利，他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出卖劳动力，不是因为非此即不能克服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是说非此就不能实现劳动力，而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需要他们去利用这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第二，资本购买劳动力又“是以工资劳动者阶级依照社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9页。

的規模存在這件事作為前提”的。^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時勞動者的存在也還不具备社會規模，但是，資本主義“會在愈益擴大的規模上，再生產工資勞動者階級，并使異常多數的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②，因而不斷地擴大着工資勞動者的人數，擴大着產業後備軍的數量。在我國，出賣勞動力的工資勞動者只是在資本主義企業的狹隘範圍內存在。並且，由於對農民和手工業的個別經濟實現國營經濟的領導和逐步實行合作化，直接生產者轉化為資本主義工資勞動者的趨勢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事實上，在我國，首先，資本已不能任意僱傭、解僱工人，即不能任意購買勞動力。“勞方有受僱解約之自由，資方不得強迫勞方受僱”。“工會認為資方對工人職員之處分與解僱不合理時，有向資方提出抗議之權”。（關於勞資關係暫行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七條）。

其次，資本也不能任意支配勞動力的使用。它不能任意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任意改變工資，任意使用童工。相反，要受到限制，要遵守國家的勞動保護法令。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勞動制度與社會主義經濟不同，但是，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勞動法是統一的，工人的基本權利是一致的，它要受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社會根本制度的限制，受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勞動制度的限制。

再次，資本已不占有全部勞動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剩餘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無論經過怎樣複雜的分割過程，都是歸這個或者那個資本家（或資本家集體）所有。“工人不是屬於資本家的，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的。”^③在我國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勞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頁。

② 同上。

③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61頁。

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已经通过税收、利息、商业利润等归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不再全部归资产阶级占有了。在我国,某个私营企业的工人,受到某些资本家的剥削,但是,他们不是属于某个资本家,而是属于自己;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

最后,劳动的性质还受生产性质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只是替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被看为是生产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价值是决定的方面,而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从属的意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不是允许任何一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存在,而只是在一定时期允许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虽然还要为资本家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但是他们同时是为着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生产国计民生所必需的东西。因此,这种劳动就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由资本家所支配的那种雇佣劳动在性质上有了区别。

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资基本上仍然是劳动力的价格,但是,它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资水平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而这个水平主要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按劳付酬的工资水平决定的;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实行管理;工人对工资有权发表意见。这些条件都使资本家不能任意规定和改变工资。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甚至会降低到劳动者的最低生活需要水平之下,这是由下述条件造成的:不断增加的失业后备军;农业中有大量较低工资的雇农;无限制的雇佣童工、女工;通货膨胀;对工人的高利贷剥削等等。这些条件,在我国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同时,国家对工人生活、福利、退职、退休等都实行保护。由于这些原因,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这一资本主义规

律,在我国已基本上停止发生作用。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資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如前所述,主要不是由于企业内部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起的。因此,这种变化有一定的限度。它不能改变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質,只能在某些方面給以量的限制,或引起某些局部的質变。

第四章

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

第一节 有計劃扩展国家資本主义的历史背景

大規模有計劃建設的开始 我国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結束的时候,社会主义国营經济已經有了迅速的发展,确立了在国民經济中的领导地位,树立了社会主义經济优势。到1952年,国营工业的产值已占全部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的52.8%,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国内批发总額中占63%,在社会零售总額中占34%。同时,經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这一切,为我国大規模、有計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对私有制經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鋪平了道路。1953年国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我国开始进入了有計劃的国民經济建設时期。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設,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資本主义工商业分

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当时预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将达到如下的成就：私营工商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私营的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私营商业中有一半以上将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执行的结果，这个计划被大大地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也都大大地超过了原计划，提前完成。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的激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当时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有社会主义经济，也有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两种对立的生产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这种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起来。事实正是这样，从1953年起，无论在农村或是城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都尖锐化了。

在农村里，土地制度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已有相当的发展。但这时农村中存在的还是大量的个体农民所有制经济和一部分富农的资本主义经济。农民个体经济是不稳定的，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事实上，在各地陆续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在各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雇工、高利贷、投机买卖行为也有所滋长。有些人提出了“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口号，要求“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四大自

由”。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

在1953年，农村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粮食问题上。这一年的年景是好的，粮食产量较上年增长了1.6%。但由于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改善，粮食的商品率下降了，这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社会就业人员迅速增加、对商品粮需求猛增的情况不相适应。从城乡购买力增长来看，如以1950年为100，1952年为120.73，1953年为143.89。再从需要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来看，1950年只有六千多万，1953年增加到七千八百多万。加上农村中技术作物地区的扩大，部分农户由粮食自给转变成需要商品粮食供应，粮食市场乃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农村中的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便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粮食投机活动，他们拒售和囤积粮食，哄抬粮价。而城市和村镇的私商也趁机蠢动，高价抢购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料。有的深入农村住户，甚至四处拦截农民，强购粮食。这样，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价格混乱的情况，有些地方粮价超过国家牌价20—30%，甚至更多。

在城市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趋于尖锐。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大量增加，社会就业面扩大，以及1952年的农业丰收，都大大提高了社会需要和购买力。因而这一年旺季早临、市场空前繁荣，出现了购买力增长速度超过日用品生产增长速度的新情况。同时，粮食、建筑器材、工业原料也供不应求。面对这一情况，许多资本家就趁机活动，他们用提高价格、预付定金、赊购赊销等办法，抢购套购粮食、日用品、工业原材料。许多资本主义工业拒绝国家的加工订货，盲目发展自产自销，扩大自由市场。有的不生产国家需要的产品而追求高利产品；有的在承担国家的加工订货任务之后“先私后公”，将合同内的产品

投向自由市場，謀取高利；有的甘願違約罰款，因为自产自銷可以获取比罰款額更高的利潤。粗制濫造的現象尤为普遍。資本主义工商业在解放前慣用的賒銷、期票交易、貼現、高利拆借等一系列投机經營手法，也重新流行起来，一时蔚然成为风气。

上海市百貨站向私营工厂的加工訂貨，1953年5月份延期交貨的达四千六百余次；其中承制胶鞋的二十五个私营工厂，在第二季度中經常脫期交貨的有十八家。花紗布站六、七两个月中簽訂了加工訂貨合同八百一十九份，其中脫期交貨的有三百一十三份。主要原因是私商搶購訂貨。一些旺銷貨因各方面搶購，預付定金的現象大量出現，如格子府綢、花麻紗、汗衫、罗紗等，一般要預付定金三成到七成。

由于私营工厂粗制濫造，加工訂貨不合格的产品增加。上海金笔业一月份退貨四十四箱，三月份增为二百三十九箱，四月份再增为二百七十九箱。

上海市第一季度采用期票交易的私营商业行业有二十多个，为期五天到两个月不等，一般为半个月至二十天。各业期票交易占銷貨总額比重：鋼鐵业 90%，棉布业 80%，食油业 50%，五金业 25%，粮食业 20%。

1953年上半年，政府的有些經濟部門，由于沒有經驗，在某些工作上对資本主义的斗争注意不够，也給私营工商业以可乘之机。如稅务部門为了减少納稅环节，在推行商品流通稅时，免除了批发商的一道營業稅，私营批发商就趁机活跃起来。国营商业推行經濟核算时，过多地压缩了庫存和加工訂貨，資本主义工业遂借此盲目发展自产自銷。在調整商业时停止了統一採購办法，各地公私企业单位涌向大城市竞購物資，也助长了私私挂鈎和自由市場的扩大。

由于自由市場的盲目发展，資本主义工商业在这一年，主要是上半年，攫取了大量暴利。据估計全国私营工业 1953 年盈余达九亿一千三百万元，比 1952 年增加 147%；全国私营商业 1953 年盈

余达六亿八千九百万元，比1952年增加97%。在暴利刺激下，许多私营行业盲目发展。工业中以制药、染织、造纸、卷烟、印刷、文教用品等业为突出。以金笔工业为例，1950年全国只有十二个厂，1953年底厂数增加了三倍，职工增加了四倍，产值则增加十倍以上。这一年，私营工业总产值较1952年增加了24.5%，大大超过了恢复时期私营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1953年私营商业销售额较上年增加了15.1%，为恢复时期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的六倍。并且私营批发商业在上半年也一度发展，市场上出现“公退私进”的局面。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也有抬头。他们要求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他们提出了“确保私有财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口号，希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如果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对国营经济起了助手作用，那么，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这种发展，就不完全是如此了。在我国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工业，就其自产自销部分来说（这时尚占资本主义总产值的40%左右），很多是在同国营争夺原材料的情况下发展的，它们把国家需要的物资去制造次要的但利润较高的产品。就其接受加工订货部分来说，一方面有助于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落后，经营管理腐败，成本高，次品多，也造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浪费。如上海纺织采购供应站对二十七家私营纱厂进行检查，统扯单位用棉量在规定的标准三百九十五斤以内的只有四家，三百九十五至四百斤之间的十三家，四百斤至四百零五斤的六家，四百零五

斤以上的四家。再如天津市私营橡胶业，据职工在1954年反浪费中揭发的材料，在六百五十件浪费原材料的问题中，仅就已解决的二十件计算，一年就可节约生胶五十二吨。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劳动力浪费，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低下。1953年国营工业平均每人每年产值为九千零一十六元，而私营只有七千八百四十八元。并且，这时因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国家所需要的许多产品，在品种、规格、质量上都和恢复时期不同了，许多已非资本主义工业落后的生产设备和条件所能承担。如上海私营机器工业中能够设计制造精密的、大型机器设备的企业不满一百户，极大部分工厂仅能装配修理和制造零件；私营电机工业中能够制造一百匹马力以上电动机、一千伏安以上变压器的只有十几户，其余均为半手工生产，仅能制造小电动机和电器配件。而国家对机电产品的需要则是：一般的、低级的产品需要减少，新型的、高级的产品需要增多，非定型的、需要自行设计的、精密的和大型的设设备则需要更多。这就形成了矛盾。至于资本主义商业，它们的资本主义经营也与日益计划化的商品流通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由于流转环节多，费用开支大，许多行业、企业不能在国家的合理差价下维持经营。还有许多行业、企业经营作风恶劣，欺瞒成性，丧失了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日益不能适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必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本身造成愈来愈多的困难。这在1953年下半年就开始露头，到1954年许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也随着紧张起来。工人群众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大规模建设开始后，他们欢欣鼓舞。但是，资本家趁机追求暴利，盲目扩大自由市场，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慨。当企业陷于

困难而资本家又用“停工、停薪、停伙”的三停办法，把困难推向职工，这更引起职工的不满。

以上情况说明，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矛盾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和盲目经营，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相矛盾。它们经常冲击市场，破坏国家的计划，夺取国家需要的物资，去制造次要的，只要是利润较高的产品。（二）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存在，与国家对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相矛盾，为了引导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排除资本主义对小商品生产的作用和影响。（三）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浪费性和经营管理的腐朽，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日益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全面贯彻国家先进定额和成本、价格政策的障碍，成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障碍。（四）资本主义剥削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五）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劳资矛盾也深刻化了。这些矛盾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只有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彻底解放生产力。而当前任务，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它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

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 1953年的市场形势表明，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控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削弱它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影响，逐步割断资本主义在城乡之间、生产与流通之间的联系。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又必须首先消灭粮食的自由市场，由国家来掌握粮食供销。为此，1953—1954年间，党和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

措施，即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

统购就是按国家规定的合理价格，由有关部门统一收购这种商品，不准私商自行向生产者收购。统销就是对于某种商品，国家按照一定的价格，按计划供应人民生活 and 工业生产的需要，禁止私商自行贩运。因此，统购统销政策既保证生产者可以得到合理的补偿和扩大再生产基金，又保证消费者可以用正常的价格得到一定数量的必需品。1953年11月间首先对粮食和食用油脂实行了统购统销。在1954年9月，又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由于粮食、油料、棉花等交易在农村市场上占着极大的比重，对这些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中农副产品的商品量就有70%左右为国家所掌握，这就改变了农产品市场的面貌，基本消灭了市场上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随后生猪、蛋品、皮革、烤烟等也都列入计划收购的范围，后来演变成为派购制度。

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有着多方面的作用，它保证了城镇工矿区 and 部队对粮食的需要，支援了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它也保证了农村缺粮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对粮食的需要，使他们能够按合理价格得到粮食，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的发展；它还保证了灾区粮食供应。同时，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商品一经实行统购统销，就排除了私营批发商的经营，并使私营零售商必须依赖于国营商业供给货源。这不仅避免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受投机商人贱买贵卖的剥削，而且削弱了资本主义在农民中的影响，从而有利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批发商业是商品流转的中枢环节，直接影响生产和市场与物价。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流通中

首先把有关国計民生的主要商品的批发业务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国营商业的发展就是以批发商业为主的。随着国营工业的发展和对私营工业逐步实行加工訂貨，对农副业产品逐步实行国家收购和委托供銷合作社收购，国营批发商业扩展很快。但仍有一小部分主要商品的批发业务是在私人手中。1953—1954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国营商业代替它們，这就实现了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被代替的主要是直接和生产者相联系的私营大批发商号，方式是停止他們的业务并把他們的从业人員（包括职工和資本家）吸收到国营商业中来。此外，也有一些是直接从事国外进口商品的私商（停止其自营进口业务而为国家代理經營），和私营大工厂的自营批发业务。

主要批发商业实现国有化，給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带来很大的便利。首先，这意味着自由市場的縮小和社会主义有組織市場的扩大，社会主义商业充当了城乡、地区間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私营批发商退居次要地位，只担負零星、次要商品的流通責任，这就限制了資本主义市場投机势力的活动，保证了市場物价的穩定，为社会主义建設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就使国家更有可能調节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費各个环节，从而有可能加强整个国民經济的計划性。其三，私营大批发商被代替之后，进一步割断了私营工业、商业、手工业和农业之間的資本主义联系，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迅速推进。例如，私营大批发商被代替之后，私营工业不接受国家的加工訂貨就不易找到銷路；私营零售商业要依靠国营商业供給貨源，这就会促进它們为国家执行經銷、代銷业务。农业、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当批发环节掌握在資本家手里的时候，它們就摆脱不了資本主义的盘剝，不能不接受資本主义的影响。主要批发商业国有化

以后，割断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而代之以与社会主义的联系，这就为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1953年7月起，国营商业就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了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的范围，掌握了更多的工业品。8月间政府恢复了私营批发商的一道营业税，以削弱他们的居间利润。9月间恢复了各地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统一采购办法。11月粮食和食用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后，又使所有经营这些商品的批发商退出市场。同时，国家扩大了对其它农产品的收购。在进出口方面，重要出口物资在1953年就实行了统购或是由国家掌握，私商不能自行出口。1954年初又停止私商的一般进口业务。这样国家就进一步掌握了货源，控制了市场，逐步代替了私营大批发商。在代替大批发商时，对于尚有货源可以经营，在城乡交流和商品分配中尚有一定作用的小批发商、二批发商，则是仍然保留下来，允许它们继续经营，或作国营的二批发。

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和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大大加强了国营商业的力量和它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1953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全国纯商业机构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2.6%增长为49.7%，批发额比重由63.2%增为69.2%。1954年零售额比重更增为69%，批发额比重增为89.3%。国营商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具有重大作用。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诸如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归根到底是国营商业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这种或那种联系关系，是国家从流通过程中、从供销环节上管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形式，国营商业（在农村是由国营商业委托给供销合作社商业）则是这一管理形式的执行者。所以，统购统销和主要批发商业国有化这两个政策的贯彻，不只直接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而且直接促使国营商业的壮大，又回过头来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

有计划扩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一些条件 1952年12月間，全国私营銀行和錢庄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变革，使得社会信貸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只是切断了私营工商业資本和私营金融資本的資本主义联系，而且使私营工商业的資本运动的一部分（流动資金）不得不置于国家銀行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这也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

此外，1953年下半年起，为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还采取了其它一系列的措施。如针对上半年出現的自由市場畸形活跃的情况，加强了市場管理，取締搶购套购，限制賒銷和期票交易；针对私营工业企图摆脱加工訂貨的情况，各地政府先后頒布了加工訂貨管理办法，統一管理、統一分配加工訂貨任务；针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違法、違約行为，許多地方采取說服教育与惩处相結合的办法，同他們的投机和暴利行为作斗争。而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則是政府在1953年10月間規定的利潤管理原則。即：企业的正当盈利，按国家所得稅、企业公積金、职工福利獎金、資方股息紅利（代理人酬勞金在內）等四个方面分配，資方的股息紅利等可占到企业利潤的25%左右。这个分配原則，在限制資本家的剝削方面，比《私营企业暫行条例》的規定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为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宣傳教育 1953年11月，党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間展开了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宣傳、教育。总路綫明确地指出我国从当时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又有个体經濟的复杂的經濟結構，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經濟結構的具体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改造的步驟，指出了我国社会主

义光明灿烂的未来。总路线的传播，鼓舞起工人群众和全国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必须改变私有制已成为家喻户晓。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总路线同时也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以前，民族资产阶级一般也知道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最终要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但总希望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总路线的公布，等于宣布了行动纲领，不能不引起他们很大的震惊。但是，在总路线的深入传播下，他们中某些人所持有的“新民主主义万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等谬论受到了驳斥；许多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受到了批判；更多人的糊涂思想得到澄清，认识有所提高。同时总路线所揭示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祖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瑰丽远景，也鼓舞了他们。在几年来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分化，出现了一批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1953年11月间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报告，阐明党和政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号召他们爱国守法，接受改造。与会的代表在热烈地讨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通过了“一致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决议，并号召“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必须积极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并积极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

综上所述，正如1953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进一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一篇社论所指出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工人阶级和国

营经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广大人民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和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望，私营工商业者在过去各项社会改革中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并且出现了一批先进分子，公私各方面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都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有利的条件都会促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广大的发展。”

第二节 工业和运输业国家资本主义 初级形式的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我国条件下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经济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又各有一些适应各行各业或各个时期不同具体条件的具体形式。

工业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 工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根据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的方式和程度不同，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等五种具体形式。通常所谓“加工订货”实际上是泛指这五种形式（本书中除单独指明者外，所用“加工订货”一词，也是指这五种而言）。这些形式的具体内容是：

加工：是由国营企业（或其他国家单位）供给原料或半成品，委托私营工厂按照规定的价格、质量、数量和期限，进行加工生产。加工的产品交给国营企业后，按照规定付给私营工厂以加工费（又叫工缴费）。加工费一般包括工资及其他合理费用、加工产品应缴纳的营业税和合理利润。

订货：是国营企业（或其他国家单位）规定所需产品的规格、质量、数量，并确定合理货价和交货期限，向私营工厂订购产品，私营工厂根据合同规定的标准进行生产。订货货价包括该项产品的合

理成本、产品应繳納的營業稅及合理利潤。国营企业必要时可以預付一部分貨价作为定金，或配售一部分原料。

統购：是国家对某些与国計民生关系重大的产品，以法令規定由国家或指定国营商业部門統一收购。統购的产品(例如棉紗)，通常亦是通过加工的方式向私营工厂收进。其不同于加工的是不准許私营工厂再将該类产品在市場上自行銷售。

包銷：是国营企业对某些私营工厂規定其产品規格、質量 and 合理价格，在一定时期內由国营企业包下它的生产品的全部或一部分。包銷通常也是采取加工、訂貨或近似于加工訂貨的方式进行，其不同之处是，产品既給国营企业包銷，一般即不准許私营工厂自行銷售。

收购：是国营商业根据产品的規格、質量，以合理价格，临时或定期地向私营工厂收购一定数量的产品。

加工訂貨的发展 早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加工訂貨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到 1952 年，加工訂貨的产值已占資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 56%。但是这时期的加工訂貨，主要是作为恢复生产和国家掌握日用工业品的手段，作为調整工商业、加强国营經济的領導、促使資本主义經济改組的手段，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生产，已經不是完整的私人資本主义生产了。它的生产和产品流通已开始納入国家計劃軌道，脱离自由市場，而增强了国营經济的力量，它的利潤也有一部分轉化为国营經济的赢利。但是，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加工訂貨，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 and 經营管理还很少干預，它改造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还没有充分發揮出来。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經驗証明，加工訂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遭受来自資本家方面各式各样的抵抗。資本家接受加工訂貨的規律是：困难时要求加工訂貨，自由市場活跃时就拒絕加

工訂貨。例如 1950 年統一財經后，資本主义工业一度陷入暂时性困难，1952 年“三反”“五反”期間市場一度停滯，这些时候資本家对国家的加工訂貨就表示欢迎并极力爭取。而当 1951 年市場繁荣，部分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时候，他们就拒絕加工訂貨了。資本家的这种欢迎或是拒絕，又以国家对原料、市場控制的程度为轉移。凡是原料与市場已經为国家所控制的行业，即使在自由市場活跃的时候，他們也不得不接受加工訂貨；反之，他們就会在自由市場活跃时，拒絕加工訂貨。因此，加工訂貨虽然因为它不改变私有制，是資本家比較容易接受的一种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但由于它限制了資本主义的盲目性，限制了資本家的剝削，这和資本家的本性是相背的，不可能不遭到他們的抵抗。这种拒絕加工訂貨的行为，反映了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1953 年国家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建設时期。为了加强对資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并扭轉本年上半年由于資本家追逐自由市場的暴利以及国营商业片面压缩庫存等所造成的加工訂貨减少的情况，国家开展了有計劃地扩展加工訂貨的工作。七月份起，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原料掌握。諸如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統购統銷政策；对煤、鉄、鋼材、銅、硫酸、燒碱、橡胶、羊毛、麻、油料、烟叶等重要原料实行由国家按計劃控制、計劃供应；对进口原料加强管理；对国家未統一控制的原料，由各地政府根据加工訂貨計劃掌握平衡等等。同时，根据統筹兼顧的原則，对各种經濟成分进行全面的生產安排。于是，加工訂貨这一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就从主要行业到一般行业，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大型企业到中小型企业蓬勃發展起来。到 1955 年，加工訂貨产值已占到私营工业总产值的 82%。

加工订货历年发展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亿元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	68.28	72.78	101.18	105.26	131.09	108.41	72.66
其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价值	8.11	20.98	43.21	58.98	81.07	81.21	59.35
占总产值%	11.88	28.83	42.71	56.04	61.84	78.53	81.69
自产自销价值	60.17	51.80	57.97	46.28	50.02	22.22	13.31
占总产值%	88.12	71.17	57.29	43.96	38.16	21.47	18.31

说明:1954年以后,由于许多私营工业企业已逐步转为公私合营,故加工订货产值增长不多或有所减少,但如扣除由私营转公私合营这一因素,1954年加工订货价值较1953年实际上升19.3%,1955年又较1954年上升1%。

加工订货最初是在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进行的。1953年,内地城市也普遍发展起来。到1954和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加工订货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9.78%上升到62.30%,青海由68.13%上升为74.03%;甘肃由30.84%上升为71.90%。

过去加工订货以大型企业为主,1953年以后,小型企业的加工订货迅速增加。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哈尔滨、济南、青岛、无锡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统计,对私营大型工业的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大型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4年为86.04%,1955年为92.11%,而小型工业1954年为51.45%,1955年上升为64.83%。

解放初期,加工订货主要是棉纺织品和机器、粮食加工等主要产品,1952年,全国十八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00%纳入国家加工订货的有水泥,棉纺二种,80—85%的有轧钢材、面粉二种,70—79%的有电动机、棉布、纸张三种,60—69%的有烧碱、胶鞋、火柴三种,50—59%的有金属切削机床、食用油二种。到1955年,据全国私营工业七十三工业部门和行业的统计,加工订货在99—100%的有铁矿等二十五个部门和行业,80—89.99%的有燃料加工等十七个部门和行业,70—79.99%的有电力等十三个部门和行业,60—69.99%的有其他非金属开采冶炼等十个部门和行业,40%以下的仅消费资料修理一个部门。

加工訂貨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加工訂貨的发展，不只表现在数量的增加、包罗范围的扩大上，在质量上也有提高。就加工、訂貨、統购、包銷、收购这几种具体形式来看，收购是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中比較低一級的形式，因为收购多是一次性的，它是社会主义經濟和资本主义經濟之間的一种不經常、不固定的联系；并且，它是在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进行的，未能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納入国家計劃軌道。而加工、訂貨、統购、包銷則都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前，就由国营經濟同它們訂立合同，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将这部分生产納入国家計劃軌道。其中統购形式，使资本主义生产这种产品的生产力全部地并且长期地为国家計劃任务而生产，断絕了它和自由市場的联系，社会主义經濟和资本主义經濟之間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所以，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中比較高一級的形式。包銷也是把资本主义生产这种产品的生产力由国营經濟包下来，因而也是比較高一級的形式。加工訂貨的发展，呈現了由低一級向高一級发展的趋势。在解放初期，收购形式曾被大量采用，1953年以后逐年减少，而为其它較高形式所代替。据十二个大中城市的統計，在整个加工訂貨的总产值中，收购部分1949年占24.33%，1953年降为8.97%，1955年再降为5.42%。統购由于只适用于单一性的产品，所以只有机制棉紗这一种产品使用了統购形式。而包銷形式則在1953年后发展很快，有些产品如面粉、卷烟、火柴等，并实行了全面包銷，即对所有制造这些产品的私营工厂都实行包銷。

再就对加工訂貨的管理来看，在1953年后有計劃扩展时期，是逐步加强的，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計劃管理。有計劃經濟建設开始后，加工訂貨，总的說来，已成为国家生产計劃和貨幣投放計劃的一部分，在具体工作

上，就要求加强計划管理。1953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政府相繼頒布了加工訂貨管理办法，統一管理加工訂貨。1954年起，又相繼召开了各种全国性主要商品产銷平衡會議。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摸清私营工业产銷情况、企业設備能力和技术水平，作为安排任务的根据。另一方面有关部門大力加强了加工訂貨計划工作。如压縮“金額控制”的部分，扩大品种計划的部分；压縮临时性的和短期的加工訂貨，扩大全季、全年的加工訂貨，并尽可能使每季、每年的加工訂貨計划前后銜接，等等。例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加工訂貨合同期限一般都在一季度以上，有的是常年合同。西安市把經營多种商品的工厂分別划归有关国营公司固定关系，进行长期加工訂貨。这样，不仅均衡了私营工业企业的生产，也比較地固定了它們同社会主义經濟的联系。对生产力的發揮和生产关系的改造，都有显著作用。

(二)加强合同管理。管理加工訂貨合同的主要目的，是督促私营工业企业按照合同規定的質量、数量、時間完成国家給予它們的任务，防止它們重施“五毒”，保証国家計划的严肃性。1953年后，各地都开展了合同的鉴証、审批和監督、檢查工作。有些地区还实行了法院公証制度，以加强合同在法律上的效力。同时加强了对合同糾紛、違法、違約事件的处理。上海、重庆、杭州、石家庄等城市还实行了隨加工訂貨合同的簽訂对私营工业企业派入駐厂員的制度，与企业內的工人監督相結合，監督資本家投机違法，保証加工訂貨合同的不被破坏。以后这一制度有了发展，駐厂員不仅担負着監督企业履行合同的責任，还有推动企业改善經營管理，对資本家进行教育，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准备条件的任务。

加工訂貨合同如同加工訂貨一样，是一种泛称，包括加工合同、訂貨合同、包銷合同、收购合同。各种合同的要求不一样，但其基本

内容大体一致，一般包括四个方面：（1）加工订货的产品、规格、质量、数量和交货的时间、地点、验收办法，有的还规定商品使用的保证期限、次货扣价幅度和废品处理办法。（2）工缴货价的计算，费用负担办法。（3）合同执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违反合同的处理办法。（4）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其他有关规定，如铺保的责任、专款的用途、工会的监督等等。

一定金额以上的公私合同，在执行前均须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审查合格，在合同上鉴证、批准。批准执行后，批准机关有责任单独或会同有关业务部门下厂监督检查。合同执行中发生纠纷，先由订约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工商行政部门调解仲裁，仍有异议，则由人民法院处理。

公证是由国家的公证机关通过法律程序，证明所订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加强合同的法律性，以预防违约，减少纠纷。这一工作从1949年下半年就在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市开始试办，1955年6月，有一百二十一个市和三百二十八个县举办了公证工作。

驻厂员在解放初期就有了，但一般限于大厂，并且驻厂员基本是随合同起讫而驻厂或撤回，或定期派员入厂检查。1954年中央召开公私合营会议以后，为了有计划扩展公私合营，驻厂员制度有了较广泛的发展。根据上海、重庆、杭州、石家庄四个城市统计，截至1955年8月底止，共有驻厂员厂五百八十一家，驻厂员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不包括公私合营工厂）。

（三）加强工缴货价的核算工作。1952年“五反”运动以前，对工缴货价主要是采取行业比价、按市价打折扣、协商订价等办法。其间也进行核算，但基本上是按照私营工厂原有的成本项目、开支数字得出来的，很少触动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五反”运动中揭露了资本家的各种违法行为，暴露了企业成本的虚假性和许多开支项目的不合理，改变工缴货价的核算工作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1952年6月间，政府确定了“按正常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来计算，每年可以获得10%左右，20%左右到30%左右的

利潤”的原則。1953年下半年，随着加工訂貨的迅速扩大，中等标准的計算也逐步精确。1954年更逐步貫徹了“分等論价，优质优价，劣质劣价”和“奖励先进，照顧多数，推动落后，淘汰有害”的原則。中等标准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标准，但比之资本主义企业原来的浪费性生产成本来，已經是合理得多了，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进行某些改革，就不可能在这种工繳貨价下繼續經營。这样，工繳貨价实质上起了促进企业内部改革的作用。同时，由于利潤是根据成本計算包括在工繳貨价之內的，工繳貨价核算工作的改进，又起了限制資本家对工人过多剝削的作用。

(四)加强工人監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監督是在1952年“五反”运动后普遍建立起来的，1953年以后，工人監督在扩展国家资本主义、保証加工訂貨任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人群众对企业生产的監督工作，有两种組織形式。一种是劳資协商會議，它是在解放初期为了調整劳資关系、解决劳資爭議而建立起来的，五反运动后，它不仅是調整劳資关系的机构，而且实际上形成督促私营企业改进生产的机构。再一种是增产节约委员会，它是在党的統一领导下，由劳資双方組成的常設机构。有关生产的重要事項，都須經增产节约委员会討論，但它不代替企业的行政，增产节约委员会的決議，仍交由資方經理、厂长等負責执行。企业里的工人組織和工人監督的組織，有責任向国家有关单位反映本企业生产能力情况，以供分配加工訂貨任务的依据，并防止資本家濫接或拒絕任务。簽訂加工訂貨合同时，必須有工人監督組織的簽証。合同簽訂以后，企业生产計劃須經過工人群众討論和工人監督組織通过。工人群众并有权監督产品的配料和主副料的耗用标准，有权監督企业的財務收支，特别是国家撥給的原材料、专用款和定金的使用与开支。

由于加工訂貨具体形式由低到高的发展，和管理措施的日益加强，促使納入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的企业不能繼續按照原来資本主义的一套經營管理制度維持下去，而必須作相应的改革，这就使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运输业中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 我国私营运输业包括輪船、木帆船、汽車、兽力車、人力車、馱兽等若干自然行业，大部分是个体經濟，只有輪船和部分汽車运输业是資本主义經濟。其中輪船运输业又有很大一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之手，民族資本經營的大公司不过民生、中兴、南洋等少数几家。

1950年私营輪駁船的貨物周轉量是一百七十万千吨公里，而基本上是个体經濟的木帆船的貨物周轉量是二百二十万千吨公里。私营汽車业大多数是一人一車的小业主經營，1950年全国两万三千多个小业主中，平均每人有車不到一輛。兽力車、人力車、馱兽基本上都是个体經營。

1950年私营輪船业占我国輪駁船貨运总量的51.98%，客运总量的85.31%，私营汽車业占汽車貨运总量的76.45%，客貨总量的51.87%。

私营輪船和汽車运输业在經營管理上十分腐朽、落后，行业内部存在着濃厚的封建性，解放前有些資本家利用帮会势力，勾結官僚恶霸，各霸一方。有的開設空头船务行、空头車行，操縱貨源，从事投机活动，乃至走私販毒，非法牟利。

輪船、汽車运输的特点是有固定的航綫和路綫。因此，爭夺貨源，把持綫路成为資本主义运输业經營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計划經濟之下，要求运输业有更大的統一性和集中性，如果容許資本主义自由发展，就等于容許它們分割完整的交通运输綫，破坏国家的运输計划。为此，除了对一部分大輪船公司很早就实行了公私合营之外，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开始的时候，就針對这个行业

的特点,实行了“三統管理”。

“三統管理”就是統一貨源、統一調度、統一运价。这个办法是政务院在1953年11月間发布的《关于加强地方交通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全国各地隨即实行起来。

統一貨源,實質上是由国家掌握各运输綫上的貨物,在国营、合作社营、私营等各运输机构之間作有計劃的分配。这就为国营經濟领导与管理私营輪船、汽車运输业創造了前提条件,避免了私营之間互相爭夺貨源以及它們与国营对抗的現象,把它們的运输納入了国家計劃的軌道。統一調度是对私营的船只、車輛,按其性能由国家运输机关統一調度,使之發揮对国营运输力的輔助作用。这就有利于解决各运输綫上运输力的配置問題,克服資本主义的盲目性,發揮运输潜力。統一运价,一般是貫徹低价多运政策,使私营运输与国营运价趋向一致。这不仅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加速物资运转,防止或消灭私营运输业淡季跌价爭运、旺季抬价暴利的現象,而且实际上起到了限制資本主义剝削的作用。因此,“三統管理”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措施,但也是国营經濟成分与資本主义經濟成分在一个运输綫路上的联系,因而也是国家資本主义的一种初級形式。通过这种形式,确立了国营經濟对于私营运输业的领导,私营运输业在生产上和經營管理上,都不能不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

在实行“三統管理”的同时,为对私营运输业各个企业进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还采取了一些組織形式。在輪船业主要是把一个运输綫上的私营戶組織起来,成立联合管理处,由政府派干部领导,实行财务統收統支与业务統一领导、統一管理。在汽車运输业則有私私联营和編組編队等形式。私私联营一般叫作联营社。編組編队則是1954年在整頓、改組联营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即是将一条线路上几个联营社的车辆，按经济性质、车辆性能、厂牌等不同情况进行编组编队，成立车队管理委员会作为车队的生产管理机构，并由国家派干部驻队，对车队实行监督指导。车队实行统一管理、分户记账、各计盈亏的财务制度。

第三节 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发展

我国私营商业按其经营方式不同，分为国内批发商、进出口商和零售商，零售商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小商小贩。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商业，采取了不同的改造形式。其中小商小贩属于个体经济范畴，是用合作化的方式改造的，将在第六章专述。

私营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章第一节曾经提到，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就实行了主要批发商业的国有化。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经营主要商品的一些私营大批发商就逐步被国营商业代替了。这些大批发商户数不多，但资金较大，雇用职工也较多。对他们虽然是采取代替的办法，但并不是把他们排除不管，而是结束他们的业务，引导他们把资金投向有益事业，吸收他们的人员（包括资方人员）为国营商业服务，在服务中进行改造。因此，代替实质上是利用、限制、改造的一种方法。

私营批发商本身是十分复杂的，有经营工业品的，有经营农产品的；有从事城乡、地区间贩运的，有坐地转手经营的；有直接与生产者联系的，也有不直接与生产者联系的二批发商乃至三批发商；有掌握主要产品的，也有只经营次要、零星小产品的。由于它们的经营方式不同，它们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和对市场的危害性也不一样。因此，国家在控制主要商品货源后，对于私营批发商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步骤和方式。这些改造步骤和方式，当时曾被概

括为“留、轉、包”原則。这就是：“对于私营批发商，他們能够繼續經營的讓他們繼續經營，国营商业需要他們代理批发业务的，委托他們代理批发；能够轉业的讓他們轉业；除此以外，无法經營的批发商从业人員，連同資方实职人員在內，如果他們沒有別的謀生之路，他們自己又願意，經過訓練，服从国家調配，可以由有关的国营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薪待遇，吸收录用。”^①

所謂“留”，并不是讓資本主义批发商原封不动，而是在国营商业领导下，繼續發揮它們有益的作用，并根据需要由国营商业委托它們代理批发。代理批发的形式有經批、代批，这是批发商业中的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其性質类似后面要講的經銷、代銷。这种形式，主要用于消費者的购买分散、零售网点众多的一些商品，特別像烟、酒、副食品等。“轉”則是把批发商的資金和人員轉到其他經濟部門，主要是轉到生产部門中去發揮作用，并在这些部門中进行改造。而“包”則是指包人員，对資本家來說，就是把他們吸收到国营企业中，在工人階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自我改造。許多私营批发商过去操縱市場，囤积居奇，投机性一般較大，資本家的封建性、买办性思想也較多，必須對他們进行徹底的改造。但他們許多人是长期从事商品經營的，批发业又是分工較細、联系方面較多的行业，从而积累了比較丰富的业务經驗和商品知識。这些經驗和知識其有益部分是可以为国营商业所利用的。

1954年經營主要商品的私营批发商已經大部分被代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各城市共处理了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三戶，从业人員七万二千二百九十五人，資金一亿四千三百零二万元。到1955年

^① 陈云副总理在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上的发言，見《新华月报》1954年第10号，第92頁。

上半年，私营批发商的主要部分即已处理完毕。1953年市場批发交易額中私商占30.3%，1954年占10.2%，1955年只占4.4%了。

在改造私营批发商中，除了“留”下来的以外，“包”的形式是主要的，“轉”的戶数不多。但“轉”的大都是主要行业中的大戶。輔導批发商轉业早在經濟恢复时期即已开始，到1953年又在較大規模上进行。根据不完全統計，到1954年6月底止，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七大城市私营批发商业共轉了一千四百四十四戶，从业人員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二，資金四千二百八十二万元。它們主要轉向私营工业，也有一小部分轉入公私合营企业，或公私合营投資公司。但随着国民經济逐步計划化，它們的轉业出路愈来愈狭，私营批发商自身的轉业条件也愈来愈差，一般資金大的都轉了，剩下的多是中小戶，无力从事生产。因此，到1954年下半年，轉业的批发商就不多了。

經過这样的改造，留下来的大都是一些經營零星商品的小戶了。但是就戶数說，数量还是不小的。根据1955年8月底全国私营商业普查統計，包括城市和乡村，这时还有私营批发商十二万五千二百三十戶，从业人員二十三万五千四百六十人，資本金一亿七千六百七十八万元。不过其中有六万六千五百一十四戶是行商，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八戶是批发摊販，批发座商只有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戶，从业人員十三万九千三百五十四人，資本金一亿四千九百八十八万元。在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这些批发商都随同零售商实行了公私合营。

改造批发商是私营商业所有制改造的第一个战役，也是作为割断資本主义的經濟联系、为对整个資本主义經濟和个体經濟的所有制改造創造条件的一个战役。因此，改造过程就不能不是一场复杂的階級斗争。并且，無論是“包”或“轉”，都意味着要資本家結束現有企业，尤其是“包”，要求立即放弃資本主义經營。因此，

許多資本家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宁願坐耗資金，不肯行动，他們总想保留老根子，幻想旧景重来。不少人在申請歇业前預作打算，抽逃資金，轉移财产。在这个时候，自由市場还相当活跃，有些資本家宁願挤到其他私营企业中去，乃至当小商小販，而不願到国营企业中来。但是，在国营經濟逐步掌握了貨源的情况下，他們已无法繼續維持下去。同时，国家加强了对資本家的教育，反复向他們交待政策，大部分人終于接受了改造。

我国在改造私营批发商中，对其主要部分采取了由国营商业代替和包人員的方式，但这并不排除通过国家資本主义形式逐步过渡的道路。早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在采购环节上就有过国营商业委托私商代购和国营商业与私商組織联购等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以后又有躉售环节上的經批和代批形式。而轉业和保留下来的批发商，最后也是經過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所有制的轉变的。在1953年和1954年，对經營主要商品的大批发商采取代替的办法，主要是因为根据当时市場情况，国营商业必須迅速控制批发陣地，而这时我們对商业的公私合营还缺乏經驗。

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私营工业、商业、小商品生产之間的資本主义联系，代之以社会主义联系，这就为私营工业、零售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有人認為，在我国的条件下，国家資本主义是联系小生产的手段。实践証明，这一立論是錯誤的。在我国，国家資本主义的发展首先需要切断和削弱資本主义同小生产者的联系；当資本主义納入国家資本主义形式后，就进一步切断和削弱了这种联系，而不是加强它。

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私营进出口商也是經營批发业务的，但又另有其本身的特点。他們拥有較多的資金，除了同国

内市場和生产者有广泛联系外，又和国外厂商往来頻繁，不少在国外設有联号。他們多数具有对外貿易的专门业务經驗，一般比較熟习国外市場行情。但它們过去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发展起来的，“唯外人之命是听”，帶有濃厚的买办性。它們的投机性和盲目性也很突出。

我国私营进出口商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島等較大口岸，1950年全国約有私营进出口商四千五百戶，从业人員三万五千人，資本額一亿三千万元，它們的經營总額（指私商自营，不包括代购、代銷部分）占全国进出口总額的33.5%，占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总額的50.4%（主要经营出口）。

社会主义經濟必須由国家掌握对外貿易，使国民經濟和国内市場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受资本主义經濟危机和资本主义国际市場自发势力的破坏和影响，并使对外貿易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濟合作服务。毛澤东同志曾經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經濟的恢复和发展，沒有对外貿易的統制政策是不可能的。”^①解放初期，我国就实行了国家管制对外貿易和保护貿易的政策，并积极建立和加强国营对外貿易企业，到1952年底，私营进出口业即已退居极不重要的地位。

1953年国家进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时期后，对外貿易的任务加重，計劃性加强。这时重要出口物資或已实行統购，或由国家統一掌握。同时为了組織建設器材和工业原料的有計劃进口，国家对私商进口也加强了管理，紧縮对私营批汇，統一收购私商的进口物資，1954年初更規定私商不自营一般进口业务。这样，私营进出口商的业务活动就主要是代国营从事一部分进出口，自营部分只

^① 毛澤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4頁。

限于零星的次要商品和新品种的出口。据统计，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私商自营部分由1953年的7.3%降为1955年的0.8%；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总额中，由1953年的32.05%，降为1955年的4.25%（其中进口占1.59%，出口占6.91%）。同时，私营进出口商的户数也逐年减少，到1955年底，和1950年相比，户数约减少77%，从业人员减少72.7%，资本额减少了58.5%。这主要是因为有一部分转向生产，而大部分国内商业和工厂兼营外贸户停止外贸业务或划归国内贸易管理，也有一部分歇业。

随着国营对外贸易的增长，私营进出口商的积极作用逐步消失，他们中间有一部分需要淘汰，或者必须转业，这是必然的。但也还有一部分，他们的对外关系在国家对外贸易中还可以发挥补充作用，还有一些经营零星分散的小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的私商，短期内国营还不能代替。因此，对私营进出口商的改造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对不能维持的由国营公司吸收它们的从业人员或辅导转业；对一些瘫痪户进行清理；对凡是有利用条件的，则充分予以利用，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将其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逐步过渡。

对私营进出口商的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主要是采取委托经营和公私联营两种形式。

委托经营又叫代购代销，是由国营公司供给进口外汇或出口货源，委托私商按照合同规定的品种、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日期等条件，代办进口或出口，另给私商以适当的佣金或利润。这一形式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出现，但到1953年后才大量发展。以上海为例，委托经营部分占私营进出口商全部营业额的比重，1951年为15%，1952年为0.9%，1953年为36%，1954年为69%，1955年为71.1%。到1955年底，全国私营进出口商的经营额中，已有

70%左右是委托經營的了，有的口岸高达90%。

公私联营是私营进出口商在国营經濟直接领导下，按自願原則，在保持原有企业組織的情况下，以公私投資方式，联合經營业务的一种組織形式。公私联营后，主要仍是为国营代购、代銷，但其业务由国营公司統一安排，統一組織出口貨源和供給进口外汇。因为組織联营主要是利用私商的国外关系推銷出口物资，所以在盈余分配上，一般是以盈余的較多部分按推銷关系分配，較少部分按投資額分配。这一形式也是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就出現了的，但当时参加戶数不多，并且多半是一种商品或几种商品临时結合的性质。1954年实行按行业归口各国营公司管理以后，公私联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多是按“归口”的行业或品种組織的，每种組成一个，所以又称专組联营。到1955年6月，上海共組織了九个出口公私联营，另有四个进口私私联营，参加联营的占当时私营专业进出口商戶的90%。天津在1954年組織了十四个公私联营，参加的私商达半数以上。广州私商参加公私联营的占总戶数43%。

私营零售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和对批发商不同。首先，零售商业是商品流轉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同生产者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而同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我国的私营零售商，尽管它們的商业网分布不尽合理，但它是历史形成的，有其适应消費者习惯的一面。只要国营商业掌握貨源，就可以把它們逐步納入国家資本主义的軌道，如果急于采取由社会主义商业代替的办法，反而容易造成分配中的脫节和混乱。其次，私营零售商业从业人員数量既多，成分又复杂，从大資本家、小业主到个体劳动者都有，要把这些人一下子都吸收到社会主义商业中来，事实上有困难。其三，由于私营零售商本身的分散細小，和历史条

件所形成的盲目发展，以及经营作风腐败，必须经过一定的清理、整顿、改组、改革，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于这些特点，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工作就比改造私营批发商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既要逐步把它们的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而逐步改造其所有制，又要充分利用它们在商品流转中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投机和盲目活动，并对它们的经营管理和旧的商业网进行改组、改革；既要保证社会主义商业不断前进、市场上社会主义优势不断增长，又要安排私营商业使之能维持经营。为此，党和政府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在步骤上，则采取逐行逐业进行的办法，先主要行业、后次要行业，安排一行、改造一行。

根据1955年8月普查材料，全国私营零售商有二百八十二万七千户，从业人员三百六十五万五千人，资本额七亿八千万元；在全国私营商业中，户数占95.8%，人数占93.9%，资本额占81.6%。同时，我国私营零售商业又是以分散零星的小商业为多数，根据同一材料，在全部零售商中，不雇用职工的小商小贩有二百七十二点五万户，占总户数的96.4%。

零售商业方面，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已出现了批购、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但都属临时性的，限于少数商品，户数也不多。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还是不固定的，管理制度也不完备，所以只是萌芽状态。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尤其是私营大批发商基本被代替之后，私营零售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才大量发展起来。总起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批购：也叫批购零销或批销，是私商向国营商业以现款批购商品，按照规定的牌价或核定的价格出售，私商在零销中取得批零差

价的收入。建立批购关系后，私商向国营商业提出要货计划，但计划管理和价格管理还都不严格，私商在纳入这一形式后，一般仍有相当部分同类商品在自由市场进货，所以它是比较低级的形式。

经销：是国营商业指定商品，私商按照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以现款向国营商业进货，再按规定的牌价和规定的供应办法出售。私商从经销中取得批零差价的收入。经销店对经销商品不得再向自由市场进货。

代销：是国营商业把商品委托私商代销，私商按照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和规定的牌价出售，从代销中取得规定的代销手续费。执行代销业务的私商应向国营商业缴存一定的保证金，并不得再向自由市场购进属于代销品种的商品。

专业代销：属于代销形式，不同的是它取消了私商自营业务，全部货源都由国营商业供给，代销商品既全部属于国家所有，企业销售计划也完全受国营商业的计划支配，因此它是代销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还有专柜代销，它是一个店的一部分货柜实行的专业代销。

1953年开始的私营零售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数量上是逐步扩大的，在改造形式上也是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1953年下半年发展最多的还是批购形式，发展范围也只限于棉布、百货、新药、化工等几个货源已为国家基本掌握的行业。1953年11月起，国家对粮食、食用油料、棉花、棉布等陆续实行了统购统销，由于国家掌握了全部货源，就把经营这些商品的私营零售商全部纳入了经销和代销形式。这样，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才大量发展起来。

粮、油、布三个行业的全业改造不只是先行一步，而且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经验。首先是按行业归口管理的原则从此普遍推行开

来。这就是把私营各行各业分别置于有关的国营专业公司直接领导之下,国营专业公司不只要做经济工作而且要做政治工作,不但负责对口私商的业务安排而且要负责对它们的改造。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其次,三业改造所采取的“一条鞭”改造方式,为对私营商业进行全行业改造提供了前例。所谓“一条鞭”就是对同一行业或经营同一商品的全部私商,从大户到小户,从座商到摊贩,进行全面安排改造。三业改造的经验证明,在国家已经掌握全部或绝大部分货源的条件下,采用这个办法可以大大地加强市场的计划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私商大小户之间的矛盾,从而便于统筹改组。再次,三业改造后,为了便于对全业经销、代销店进行管理,摸索、创造了不少具体管理形式和办法,如派遣联络员、设立中心店等等,为全业改造后的管理工作,提供了楷模。

自粮、油、布三业私商全部纳入经销、代销以后,猪肉、煤、茶叶、煤油、盐、烟、酒等行业也陆续在全国或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全行业改造。到1954年底,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六大城市的统计,已改造的有四万七千二百五十六户,占六市私商总户数的25.1%。这时批购形式仍然广泛使用,但在某些地区已退居次要地位;实行全业改造的,则大都纳入了经销、代销。品种复杂的行业如百货业,也在若干品种上实行了经销、代销。1955年,在全面安排市场过程中,改造进度加快,根据1955年8月普查材料,全国私营零售商连同公私合营商业总共二百九十五万四千一百四十四户,其中经销、代销及批购户计有七十万零一千三百二十二户,占总户数的23.7%;合作商店(小组)有八千六百二十九户,占总户数的0.3%。经销、代销及批购户数虽然只占23.7%,但多系主要行业的较大店铺,其从业人员占总数的27.2%,职工占总数的44.9%,资本额占总数的35.9%,上半年销售额占总数的47.5%。

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同样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商业资本家中有不少人对国家资本主义采取不同程度的抗拒态度。一部分人犹豫观望。一部分人或是挑选国营、合作社商业不经营或少经营的品种去大力发展；或是竭力设法直接向外地向生产者进货，以获取批发、零售、地区等几道差价利润；或是在价格上玩花招，故意降低国营、合作社大量经营品种的售价，尽量提高国营、合作社不经营或少经营品种的售价，以破坏国营、合作社的信誉，争夺市场。也有少数人抽逃资金，腐蚀职工，破坏工人阶级内部团结，挑拨职工和政府间的关系。即使在纳入经销、代销等形式后，斗争也是很复杂的。商业资本家往往借经销、代销的招牌，从事投机违法活动；或在品种上挑肥拣瘦，乃至侵吞代销款。同时，私营商业一般人员较多，开支浪费，和国营商业根据既保证价格合理，又限制私商剥削，又要给予一定合理利润的原则所制定的差价、手续费率有矛盾。因此，必须不断地和私商腐朽恶劣的经营作风作斗争，并促使他们改进经营管理，降低费用，并适当调整商业网点。

市场的变化 随着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和私营商业的逐步改造，我国市场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有组织的市场迅速扩大，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不断缩小。1953年全国纯商业机构的批发总额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占69.2%，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占0.5%，私营占30.3%；零售总额中国营、合作社商业占49.7%，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占0.4%，私营占49.9%。到了1955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占批发总额的比重已上升到94.8%，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占0.8%，私营只占4.4%；零售总额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上升到67.6%，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上

升到 14.6%，私营只占 17.8%。这說明，私营商业已經基本上退出了批發市場，他們在零售市場中也已居于不重要的地位。在我国自由市場中，除商业机构的活動外，还有工业、手工业和农民生产者对居民的直接銷售和这些生产者之間的彼此交換。这部分交易額变化不大，据估計 1955 年比 1953 年减少了 13.2%。但是，由于社会商品流轉总額扩大，它所占的比重大大縮小了。

其次，随着改造的深入，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壮大，統购統銷政策的貫徹，很多重要商品都由社会主义經濟掌握起来，在全国範圍內或者地区範圍內进行有計劃的調撥，这就使原来的商品流通渠道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有計劃的流通基本上代替了資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流通。一些中間交易和周轉、集散市場的作用消失或削弱。某些城市商业人員过剩，另一些地区商业网点不足的现象，已經初步扭轉。在收购上，主要农产品都实行了統购、派购、合同議购。在分配上，粮、油、布等重要民生必需品实行了按人定量供应的制度。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商品流轉的計劃性。这时候，私营商业的小量販运和农民貿易在国营經濟领导下，作为商品流轉的輔助渠道，仍發揮一定的作用。

第三，市場价格，始終平穩，全国批發物价，以 1952 年为 100，1953 年为 98.7，1954 年为 99.1，1955 年为 99.7。但是，价格結構有了調整。大規模建設开始后，国家为了縮小解放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計劃地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而农村市場的工业品零售价格則基本上沒有变动。这样，就使得我国国内市場的价格結構更趨合理。同时，为了限制資本主义的投机販运和私人商业的盲目发展，国家还有計劃地縮小了一般工农业产品的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对有些产品則保持一定的差价，以利物資交流。

市場这种变化的直接效果是：市場容量扩大，商品流轉效率增高，商业流通費用降低。这对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带来很大的利益。国内商品零售总额，以1952年为100，1953年为126.7，1954年为140.8，1955年为144.6。过去商品經濟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市場的发展尤为迅速。但是，由于城乡还普遍地存在着私有制經濟，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小販、农民及其它个体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仍然冲击着市場。因此，在国内市場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很尖銳的。

第四节 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的性質和作用

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的实质 从以上两节可以看出，在把资本主义經濟納入国家资本主义軌道的过程中，在工业、运输业、商业方面都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改造形式。形式的多样性，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級阶段的一个特点。这是由各部門生产經營的特殊性决定的。根据各部門生产經營不同的特点，采取最适当的改造形式——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本身，就提供了这种灵活性。

但是，所有这些形式，又有它們共同的特性。这就是：它們都是社会主义經濟成分同资本主义經濟成分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形式；或者说，这两种經濟成分在流通过程中的联系形式。这就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的实质。

資本的运动包括三个相連的阶段，即：貨幣資本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資料的阶段，生产商品的阶段，商品再轉化为貨幣資本的阶段；第一和第三个阶段都是在流通領域。加工訂貨，是在私人資本

運動的第一和第三個階段中，社會主義經濟與之建立聯繫；經銷代銷等是在第三個階段中，社會主義經濟與之建立聯繫；運輸業的三統管理，是在流通領域中價值生產的環節上，社會主義經濟與之建立聯繫。

加工是由國家加工單位供給原料。訂貨雖然是私營工廠自備原料，但它們一般只能向指定的國營商店購買，國營商店根據訂貨合同核售。包銷也是同樣情況，有的還由國家包銷單位供給部分原料。統購的原料全部由國家核配。訂貨、包銷的定金和國家銀行給私營工廠的貸款，都是專款專用，都起着在企業購買生產資料這個階段上控制它們生產的作用。

流通的形式不能改變生產的基本性質。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必須在流通領域中取得再生產的條件，又只能在流通領域中實現剩餘價值和把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在流通領域以外，不與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觸，商品所有者還是不可能使價值增殖，並從而使貨幣或商品轉化為資本。……所以，資本不能由流通發生，又不能不由流通發生。它必須在流通中同時又不在流通中發生。”^① 社會主義經濟從流通領域中與資本主義經濟建立聯繫，控制資本運動的第一和第三個階段，就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資本的增殖和資本的發生。

社會主義經濟在流通領域中控制資本運動的物質前提是：社會主義國家掌握了充分的生產資料——原材料，機器設備，煤和電力等；掌握了充分的商品貨源——商品糧食和主要農產品，主要輕工業品和手工業品；以及掌握了信貸、國際貿易等。在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從物質上控制私人資本的運動，而且從政治上加以控制。例如，勞動力是生產的重要因素，對於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4—175頁。

本家来说，它也是一种商品，是在资本运动的第一个阶段购进的。但是，如在第三章中所指出，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资本已经不能随意购买也不能任意支配劳动力了，相反，资本家要服从工人监督。劳动力资源，实际也是掌握在国家手中。

本来，像加工订货、经销代销这些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也是存在的。但在那里，是两个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联系，并不产生新的性质。当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联系，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就不仅有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作用，而且有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其中发生作用了。

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一般都订有合同。这种合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外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之间分割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掠夺物——剩余价值的契约，资本主义国家用法律来保护资本家这种分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是一种公私合同，体现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两重性的经济关系：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共同完成国家计划中的某些生产和流通任务。另一方面它体现着国家和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承认资本家的剥削和限制他们的剥削的作用，国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监督，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用法律来保护这种关系。

正是由于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建立联系和接受其领导，才使得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新的性质，使原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后生产关系的变化 我们从生产

資料所有制、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来考察私营工商业納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后生产关系的变化。

第一，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是社会主义經濟成分同资本主义經濟成分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它基本上不改变原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資料占有形式，企业还是私营的。但是，比起第三章中所說的在国家管理、国营經濟领导和工人监督下的私营企业来，资本主义所有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了。

资本主义企业一經納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級形式，它的生产資料和貨幣資本就不能完全由資本家任意使用，去生产和經營他們认为最有利的商品，而在不同程度上要由国家来支配，去生产和經營国家和人民所最需要的，同时也給資本家带来一定利潤的商品。資本家获得的利潤，即剩余价值，仍然可以轉化为資本。但是，資本家已經不能任意把它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按照国家的要求用于扩大再生产；因为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两个主要条件，即第一部类的产品和市場，是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手中，資本家要取得这些条件，主要依靠承接国家的生产任务。并且，在加工的形式中，生产資料的一部分（非主要部分），即原料和半成品，無論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已非資本家所有，而是国家所有。在訂貨、包銷的形式中，原材料大部分系向国营商店价购的，所有权轉移給資本家，但是，它只能被用于合同規定的任务，实际上也是經過加工后由国家收回。在代銷的形式中，資本家的流动資本，大部分作为代銷保証金交存給国家，退出了商品流通过程；資本家在代銷中，获取手續費。在經銷的形式中，經銷商品由資本家向国营商店价购，形式上所有权轉移給資本家。但是它的进貨、銷貨、品种、价格乃至有些商品的銷售对象和数量，都是由国家計劃規定

了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现款代销，即在商品售给消费者以前先同国营商业结清了货价。在进出口业中的代进、代出，即委托经营形式中，商品也都是国家所有，不是资本家所有。

第二，在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中，企业仍然是由资本家管理，工人群众仍然是被剥削者，仍然是资本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资本家在企业中的权利与地位和工人的劳动与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特点。

资本家的权利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在法律形式上，它仿佛表现为人对物的关系，但是，“这种权利的使用，完全依靠各种经济条件，那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①马克思曾经论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会失掉它原来统治的强制力量，而只能分得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的地租。同样，资本家的权利，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失掉它原来的统治力量。前者我们已分析过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资本家的资本权利受到限制，变为相对的。现在再考察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后，由于经济条件的变化，资本家的资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

资本的权利，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为财产权，即对企业财产的占有、支配和处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当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以后，企业的财产还是、或主要是资本家所有，但这一部分生产力则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组织到国家计划中来，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执行着国家的生产或流通任务。资本家，如果他是守法经营的，就不能凭借他的财产权任意支配和随意处理这部分财产，以至妨碍国家生产流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4页。

任务。他更无权随意处理加工訂貨的产品、經銷代銷的商品、国家供給或核配的原料以及其它专用款項和专用物資。資本家的財產，在不同程度上是为这些属于国家的产品、商品、原料等服务的，他也應該只在这个範圍內，行使其財產权。在經營管理上，加工訂貨的生产制度、經銷代銷的銷售方式等，一般都在公私合同中有所規定，原材料和貨源已由国家保証；生产經營的具体計劃要經過工人群众討論，取得工人群众的支持；管理費用和流通費用也經過不同程度的核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給資本家以諸种条件，可以更好地發揮他的积极性，改善經營管理；另一方面，也使他的經營管理权受到限制，不能不顧国家和工人的利益，专断独行。資本家的人事調配权也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在納入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以后，劳动力的調配实际是受国家計劃控制的，而工資、工人福利等开支已在工繳、貨价、差价、手續費中加以核算，有的并将劳动力和劳动定額在合同中加以規定。

企业納入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以后，工人的劳动，仍然为資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仍然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是为別人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又是为完成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国家的計劃任务而劳动，在某些情况下，他們已經主要是为国家的計劃任务而劳动了。这就使得工人劳动的性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它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为自己、为社会的劳动的性质，在一定範圍內，直接体现为社会化的劳动。实际上，他們劳动的相当的一部分，也不再体现为剩余价值，而体现为社会主义的积累了。

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有了变化。企业納入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以后，工人群众的任务，就是团结和教育資本家，搞好生产經營，为完成国家計劃任务而斗争。这时候，企业中的工人监督，即不仅是监督資本家的違法，并发展为监督生产經營，推动

資本家执行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合同，監督資本家按質、按時、按量完成國家規定的任務。並且，工人通過增產節約委員會、勞資協商委員會等生產經營民主管理組織，實際上已成為團結、教育資本家的力量，成為推動資本家搞好生產經營的力量了。

總之，企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以後，無論工人群眾方面，或者資本家方面，他們的活動都直接同國家的生產或流通任務聯繫起來，同國家計劃聯繫起來。企業內部的階級關係，即勞資關係，同企業外部的階級關係，即公私關係，密切聯繫，更加一致。勞資關係更多地體現着公私關係的內容了。

第三，在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中，分配關係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即剩餘價值仍歸資本家所有，工人仍受剝削。但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分配，則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以工業方面的加工訂貨來說：首先，加工訂貨的利潤是包括在工繳、貨價中。工繳、貨價是按中等標準成本和一定利潤幅度核算的，如果資本家按照這個標準守法經營，它就會起到限制剩餘價值生產的作用。其次，加工訂貨切斷了私營工業與市場的聯繫，資本家必須把產品交給國營商業，才能實現價值，這樣，商品生產的一部分價值就以商業利潤的形式轉移給國家。商業利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非是剩餘價值的分割。但當它轉移給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時，這部分價值就不再呈現為剩餘價值，而變成社會主義積累。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來資本主義的價值分配形式。再次，企業的利潤，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四個方面分配的办法分配。其中一部分通過所得稅的形式轉變為社會主義積累，一部分是企業公積金，一部分是工人的福利獎金，而資本家占有的部分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公積金仍然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態，但是，資本家並不能任意支配，更不能用於私人消費。從社會主義改造過

程来看,它实际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劳动创造的一种社会积累,注定最后要轉为国家所有。这种分配办法是1953年规定的,它虽然适用于一般私营企业,但这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大部分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所以它实际是适应于国家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利润管理办法。这种办法,从收入的再分配上,进一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

商业方面的经销利润是包括在批零差价中,代销利润是包括在手续费中,进出口业的代进代出利润是包括在手续费或者佣金中,运输业的利润是包括在运价中。其作用,大体上同工缴、货价相仿。利润分配也都受“四个方面分配”办法的约束。

工商业所得税采累进税率,一般占30%左右。由于私营企业常存在着不合理开支,计税时要剔除,因此所得税占帐面盈余有时超过30%。企业公积金一般占10--20%,截至1955年底,私营工业中的公积金累计有二亿三千六百万。在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把这部分公积金计入了私股;但在这以前,企业合并改组时,一般不计入私股。工业资本家所得占企业盈余的份额,1952年平均约为25%,1953年以后降低,1955年约为18%;商业资本家所得占企业盈余的份额,1952年平均约为31%,1953年以后降低,1955年约为20%。其份额所以表现较低,是因为有一部分企业没有分配盈余,或只分配了部分盈余。此外,许多资本家还常以隐蔽手段抽取企业资金。资本家并从较高的薪金中,取得一部分剥削收入。

工缴(加工费)、货价、差价、手续费、运价等,都是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而产生的价格形式。这些价格形式,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限制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把资本主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轉化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杠杆。这些价格形式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整个社会价格结构的组成部分。批零差价、运价和有些工缴、货价,同样适用于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决定这些价

格的因素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和流通过费用，而且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成本和流通过费用。因此，它还具有另一种作用，即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改进生产和经营管理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资本主义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以后，在生产经营的目的性上，在生产经营的方式上，在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上，在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分配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企业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还起着作用。但在某些方面，例如在它们纳入加工订货、经销代销部分的生产经营的任务、规模和再生产的扩大，主要已不决定于剩余价值规律，而决定于人民的需要和国家的计划。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转化，都受到限制。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间接地在这些企业内部发生作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这里所发生的作用虽然是间接的，但按其性质来看，是相当深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地扩展其作用，但是，它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发生作用，意味着它作用的范围扩大了，开始占领了一个新的阵地。不过，由于企业还是资本家私有的，这种作用，从而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优越性，必须经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资本家安于守法经营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作用 由于生产关系的这些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无论在发展生产上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生产的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在这些形式

中,由于生产的目的性和劳动的性质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相应地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在国营经济直接领导和帮助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进,尤其在节约原材料上较有成绩。对资本家来说,一方面,他们不满于国家资本主义对他们的限制,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抵抗;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也使得他们免除在原料、市场、资金等方面的考虑,而专心致力于生产。事实上,在几次资本主义生产遭遇到困难,陷于停滞、瘫痪的时候,都是国家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把它们挽救出来。改造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工订货,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也是在这一时期(1949—1955年),把资本主义这部分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加以组织和利用的形式。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由于执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保证了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合理分配,因此,保证了大小工厂一般都能正常开工,避免了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制止了投机活动,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① 经销代销等形式,虽然不是直接生产的,它的作用也与此相同或相似。

加工订货把资本主义的产品置于国营经济手中,因此,在这种形式下,私营工业的发展直接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经销代销等形式,则是通过私营商业,扩大了国营的销货,扩大了有组织的市场,压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发展,实际是国营经济在另一条战线上的前进。

第二,限制资本主义的盲目性。生产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就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盲目

^① 陈云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141—142页。

性。由于企业还是私有的，国家还不能直接为资本主义企业规定具体生产经营任务，而是利用价值规律，以工缴、货价等价格形式为杠杆，通过公私合同，促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是一种间接计划，而不是直接计划。例如，国家计划规定十万双胶鞋的加工订货任务，而哪些工厂各生产多少，则不是计划所规定的。但是，既然整个加工订货任务是国家计划规定的，在主要原料和市场由国家控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投资的方向，就不能不受国家计划的影响，乃至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就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特别是长年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这部分生产力来说，它的生产规模，乃至生产的规格、品种，和企业的改建、扩建，就基本上是国家计划指导了。原来资本主义生产是受市场自发势力的指导的，形成它的无政府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则是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当国家计划在不同程度上代替市场自发势力来指导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时候，就在这个范围内，限制了资本主义无政府规律的作用，扩展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作用。

第三，限制资本主义剥削。上面所说，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从几个方面影响着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其直接的效果，也就是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据统计，私营工业的利润率，1951年平均是29%，1954年下降为21%，1955年再降为19%。私营商业的利润率1951年为12%，1954年降为10.5%，1955年再降为7.5%。这种下降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中，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了。事实是，国营商业对某种商品的工缴、货价、差价、手续费订得偏高，资本家的剥削就会扩大，并造成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盲

目发展;訂得偏低,資本家就采取抗拒和迴避的态度,不接受任务,或虽接受,但毫无积极性。因此,工繳、貨价、差价、手續費就成为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中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焦点。此外,資本家还采取偷工减料、以坏充好等办法攫取非法利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方面通过工繳、貨价等价格形式,給資本家以合法的利潤;一方面依靠工人监督和對資本家进行教育,制止他們謀取非法利潤。这一切說明,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提供了这样一些条件,使得国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价值規律和剩余价值規律的自发作用;同时,又自觉地利用价值規律来組織資本主义的生产力,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剩余价值規律来調动資本家的积极性。

第四,推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的发展,割裂了資本主义体系,而在資本主义各部門乃至各企业之間、資本主义与小商品生产者之間,建立了同社会主义經濟的联系。这不但削弱了資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而且使它們日益失掉了自由市場,使它們必須依附于社会主义經濟,依靠工人階級,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样,当国家提出由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过渡的时候,許多企业就不能不跟着走了。同时,經過加工訂貨、經銷代銷,資本家也受到了教育,有了同社会主义經濟合作的經驗,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在資產階級中也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在后来所有制的改造中發揮了积极作用。工人階級方面,也通过加工訂貨、經銷代銷,摸了資本主义企业的底,取得了不少經驗。这一切,都表明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为資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改造創造了重要的条件,它是資本主义所有制根本变革的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是和平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驟。另一方面,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割断了資本主义同小商品生产者的联系,也就为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創立了有利的条件。

第五章

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

第一节 个别公私合营的发展

公私合营是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这个形式早在解放初期即已出現，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53年到1955年有計劃扩展时期；这两个阶段都是个别合营，即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实行公私合营。第三个阶段是1955年底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資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将在下一章专题叙述。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公私合营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公私合营发展的特点是戶数不多，都是大戶，公股比重大，主要是工业和金融业。这一阶段实行公私合营的，多数是有官僚資本投資或有敌伪财产的企业，經過清理、整頓、改組而成的。有一部分是在1952年“五反”运动以后，将資本家違法所得轉为公股而合营的。也有一部分财务发生困难的大工厂，要求国家投資而实行合营。

政府于1951年1月間曾經頒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清理原则是：比較重要的企业，应予沒收接管的股权又占相当比重的，与資本家协商派干部参加企业管理，轉为公私合营企业；不重要

的企业,将没收接管的股权撤出,转为私营;重要企业而应没收接管的股权比重不大,则保留投资,加强领导,为将来转为合营准备条件。

这一阶段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有九百九十七户,不过占全国公私合营工业和私营工业总户数的0.7%,但其总产值则达十三亿七千万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总产值的11.5%。许多企业中原来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比重较大,所以一經将这部分股权转为人民所有,公股比重就较后来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为大,1949年計占67.1%,1950年为52.4%,1951年为50.7%,1952年为52.5%。

这一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均由国家派干部领导管理。企业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生产納入了国家計划,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大大提高,显示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少数公股比重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主要是公用事业和矿业,經公私协商同意,交由国家統一管理,而給私股以固定的股息。

1949年至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情况如下表:

	1949	1950	1951	1952
户 数	193	294	706	997
职工人数(万人)	10.54	13.09	16.63	24.78
总 产 值(亿元)	2.20	4.14	8.06	13.67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2.0	2.9	4.0	5.0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全部 产值的%	3.1	5.4	7.4	11.5
资 本 額(亿元)	1.3	2.4	3.28	5.37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全部 資本額的%	9.0	15.0	16.1	24.5

私营輪船运输业,也有一些大户在这一时期实行了公私合营。合营的户数虽然不多,但却发挥了私营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們一般都提高了运输量,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积累。例如民生輪船

公司过去运价高、任务不足，长期亏损，合营前平均每月亏损四十余万元。合营后实行改革，降低成本，大量接受国家的运粮任务，发挥了运输潜力，三个月间即盈余一百六十八万元。

私营金融业则是在这个时期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解放前私营银行、钱庄盲目发展，1949年连同分支机构共有一千零三十二家（不包括东北地区）。解放后政府对私营银行、钱庄，一方面实行了严格的行政管理，限制其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疏导其资金，使之用于对正当工商业的放款，并且逐步组织它们联合放款，联合经营业务。“五反”运动中私营行庄被揭发出大量违法投机活动，受到人民的严正指责。同时，它们在社会上吸收游资，调剂资金的作用日益缩小。以吸收储蓄和私营工商业存款为例，1950年6月到1952年12月两年半中间，国家银行所占比重由58.6%上升为92.8%，私营银行和钱庄所占比重由41.4%下降为7.2%。私营银行和钱庄在这时期内普遍亏损，经营困难，已难继续存在。适应这一情况，国家于1952年12月对私营银行、钱庄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业务。这就基本上完成了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结束了资本主义的金融事业，建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所不能克服的矛盾 公私合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虽然有所发展，但还不普遍。这时候大量出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特别是工业中的加工订货。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有了巨大的发展，它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改变，企业仍是资本家私有，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企业在纳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之后，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由国家组织了起来，

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这样,这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突出起来。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经销代销以后,它们这部分生产经营已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轨道,但是,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只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外部的联系,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仍是资本主义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矛盾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经营下的生产成本、原料定额、规格质量等不能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要求,有的甚至不能按质、按时、按量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是以攫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在相当的利润下,资本家才进行生产经营。并且,在利润的冲动下,有些资本家还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等非法活动;也有的故意扩大开支、盲目增加工资,以期用提高成本的办法比例地获取较大的利润。资本主义经营中改善生产、改进质量的要求也是基于利润的冲动的,即在竞争中获取剩余利润。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后,自由竞争消失,资本家不能获取剩余利润,不少人就对改善生产经营无兴趣。还有的不关心生产,不积极经营,遇有困难,只是要求政府照顾,甚至故意制造困难,以期取得照顾。

第二,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国家对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企业还只能实行间接的计划,即只能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合同来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还不能直接规定各个厂的生产任务。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资本家的经营下,还继续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他们不只对国家的加工订货等任务挑肥拣瘦,不愿接受某些利润较小的任务,而且一旦市场活跃,利润较高,他们还往往千方百计地

扩大自营,从而破坏国家的计划。

第三,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后,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私有制还没有根本改变,工人还是被剥削者,劳资双方仍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这种改进终究是有限的。这些企业的工资、工时制度还没有脱离资本主义范畴,同工不同酬、工资级别繁杂、工时不合理等情况都还没有得到改革。这样,不仅影响工人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且影响国家工资制度的全面贯彻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在部分企业中,资本家借故不改善劳动条件,不改善工人生活,甚至停薪、停伙、停工,这就使劳资矛盾更趋尖锐。

总而言之,在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中,无论在公私关系或劳资关系上,都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为进一步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即私有制的束缚,必须把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推向高级形式,实行公私合营。

有计划扩展公私合营工业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特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的条件已次第具备。这就是:

第一,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已经普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日益依靠于社会主义经济,很难再独立进行生产经营。并且,由于这种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已逐步掌握了私营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有关情况,也比较了解了资本家的情况,可以对它们的进一步改造作出全面规划。

第二,几年来公私合营的发展,积累了工作经验,培养了干部,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提供了范例。

第三,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公私合营优越性的启示下,在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具体教育下,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广泛

宣傳和深入教育下，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認識到大勢所趨，表示願意接受对資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动申請公私合營。

为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1954年1月，政府召开了扩展公私合營工业計劃會議，确定了“巩固陣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針，准备先对在雇工十人以上的私营工业进行公私合營，并制定了当年的合營工作計劃。同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公私合營工业企业暫行条例》。条例明确“由国家或者公私合營企业投資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資本家实行合營的工业企业，是公私合營工业企业”；并指出：“对資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營，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資本家的自願。”各地都根据这些原則拟定了扩展公私合營工业的具体方案。于是，有計劃扩展公私合營的工作隨即迅速开展起来。

《公私合營工业企业暫行条例》还对合營企业的股份、經營管理、盈余分配、领导关系等都作了具体規定，总的來說，有如下几点：（一）企业实行公私合營时，清产核資应当包括企业原来的全部实有财产，以防止资产分散，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則进行。（二）公私合營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負責管理，对于企业原有实职人員，一般參酌他們原来的情况量才使用，使他們各得其所。（三）合營企业在生产、經營、财务、劳动、基本建設、安全卫生等方面，应遵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机关的規定执行，工資制度、福利設施等应參酌企业原来情况、生产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規定，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四）合營企业每年的利潤，在依法繳納所得稅后，应当就企业公積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紅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紅利加上董事、經理和厂长等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額的25%左右。

1954年，有七百九十三家資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了公私合

营，它們当年的产值达二十五亿六千万元，超过过去几年来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的1954年产值。

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进一步的改造中，碰到了一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吃不了”和“吃不饱”。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的绝大部分是生产分散、设备简陋、工序不全、技术落后，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展，国家需要的产品规格越来越高，很多东西它們不能生产。另一方面，它們能生产的又往往不是当时急需的，而且有一部分私营工业根据一时市场的需要，盲目扩充设备，大规模建设中某些原料供应不足，加上还有一些地区的地方国营企业也有发展，这样，它們的任务不能不有所减少，生产难以维持。这个矛盾使扩展公私合营的计划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从1954年下半年起，国家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对工业生产进行了全面安排。以后对商业也进行了全面安排。

全面安排就是要对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作通盘打算，安排生产、安排市场、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增长的条件，兼顾私营。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不是孤立隔离，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如果孤立地安排社会主义经济，把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放在视线之外，那么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盲目发展，就是遭遇困难，而这两者的结果都一样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经营上的适当安排，乃是对它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同时安排的本身也就是改造。因为安排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些形式下面，它們不仅可以进行合理的生产经营，也受到了改造。而且，安排工作还和公私合营工作密切结合。在生产安排中，可以进行公私合营的就进行合营；需要准备条件的，就采取以大厂带小厂，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先进行生产改组，

然后再公私合营；需要而且可能迁厂的，先进行迁移，在适当时期再行合营；至于少数过于落后的企业，没有改造条件的，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人员，淘汰企业。

统筹兼顾的方针并不是抹杀公私差异，而是贯彻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的原则。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优先发展，必须有所不同。但在过渡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又要在有所不同的前提下，需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全面安排，使它们获得了正常生产经营的条件，同时也使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在安排生产和扩展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又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除了少数具有一定规模外，多数是中小企业；扩展公私合营工作着重大厂，所谓“吃苹果”，这样，大的挑完了，剩下中小厂就很难安排。如果对这些中小厂都采取个别公私合营的办法，一则它们的条件还不具备，再则这么做也会造成国家资金和干部配备的分散和浪费。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改变“吃苹果”的方式，采用“吃葡萄”的方式，也就是由个别公私合营改为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年下半年起，在扩展个别公私合营的同时，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山东、浙江、四川、云南、河南、辽宁、陕西、黑龙江等省市就先后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

当时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在安排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行业的全部企业都具备了合营条件，就全部合营；如果一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具备了合营条件，就先对大部分企业进行合营；如果还有个别企业的资本家对合营没有考虑成熟，就允许他们再看一看，等一等；有些行业户数很少，企业规模较大，

或者具有其他特殊情况，也可以实行个别合营。例如上海市在1955年第三季度中，有棉紡、毛紡、麻紡、面粉、碾米、卷烟、造纸、搪瓷八个輕紡工业以及三个冷藏制冰厂共一百六十八个工厂按行业进行公私合营。其中有些厂是按系統合营，即原在生产上、經營上有联系的、或属于母子厂的，均采取这种方式合营。有些厂則按生产性質合并合营，即产品相同、生产上具有协作关系或生产程序彼此銜接的，一般就采取以大帶小、以先进带落后的方式进行合并合营。就全国來說，当时采用这个方式改造的还不多，到1955年底不过六百五十六戶，职工九万八千六百人，总产值十亿二千七百万元，但它却显示了比个别公私合营方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实行全行业合营，不仅可以大大节约国家資金和人力，加快改造速度，而且由于是同安排生产結合起来的，在合营中进行了經濟改組，使生产力的組織趋于合理化。不过这一时期的全行业合营，还没有同定息制度結合起来，在生产关系上还同个别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相同。

由于統筹兼顧方針的进一步貫徹执行，以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出現，1955年的公私合营工业有比往年更高速度的发展。这一年私营工业轉变为公私合营的有三千零九十一戶，經過改組合并为

1953—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扩展情况如下表：

	1953	1954	1955
戶 数	1,036	1,746	3,193
职工人数(万人)	27.01	53.33	78.49
总 产 值(亿元)	20.13	50.86	71.88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7	12.3	16.1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全部 产值的%	13.3	33.0	49.7
资 本 額(亿元)	6.93	14.00	18.75
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全部 資本額的%	29.2	54.2	69.8

一千四百九十六个单位，与前合计，合营总户数达三千一百九十三户，职工人数七十八万五千人，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16.1%，占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全部产值的 49.7%。

运输业和商业的公私合营 在私营轮船、汽车运输业方面，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边管边改，一面巩固，一面扩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加强“三统管理”的同时，着重扩展公私合营。这时发展公私合营的方式已不是像过去那样的重点合营或少数户合并合营，而多半是把一个运输线上的私营户组织起来，通过联合管理再实行合营。例如在轮船运输业，是先组织联合管理处，由国家派干部参加领导，然后在生产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合营。到 1955 年底，私营轮船运输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已占公私合营和私营轮船货运总量的 78.21%，并且在海运航线和内河的主要航路长江航线都已基本上实现了公私合营，未合营的私营船舶主要是在珠江和其它较小的内河。1955 年，在全国轮驳船运输中，海运船舶的载重量，国营占 59.71%，公私合营占 40.29%；内河船舶载重量，国营占 64.82%，公私合营占 30.02%，私营占 5.16%。在私营汽车运输业方面，由于个体小户较多，除了部分重点企业实行个别公私合营之外，一般是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统一组织管理，实行私私联营、编组编队等形式，然后再实行公私合营。此外，有一部分私营汽车业实行了合作化，组成汽车运输业合作社。至 1955 年，全国已改造的私营汽车业户占私营汽车业户总数的 24.2%，其中纳入公私合营的占 18.4%。

私营商业中，只有少数大户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因为私营商业户多、分散的情况比私营工业更为严重，国家不可能抽出那么多资金和干部来从事合营工作。同时私营商业经营管理落后，商业网分布不合理，必须经过更多的改革，才有条件实行公私合营。

所以，到 1955 年 8 月，实行公私合营的商业企业只有四百四十户。

私营进出口商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前没有出现过个别公私合营的形式。1954 年到 1955 年间，私营进出口商业中曾经大量出现了公私联营的形式，这种形式一般都由国家派员领导，并派干部加强联营内部的管理工作，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联系，已由企业外部进入联营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私合营的性质了。

私营饮食业、服务业，在这期间也有个别大户实行了公私合营，只是试点性质，没有全面展开。

公私合营发展的特点 综上所述，公私合营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合营企业的规模来看，是先合营大户，逐步推广到中小户，结合生产改组，使企业由分散到集中。以工业为例，在 1954 年以前，实行合营的企业主要是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大厂，资金一般都在一百万到五百万元，人数则在一百人到五百人之间。1954 年以后，扩展合营的工作不仅着重于具有规模的大厂，同时也向十人以上的中小型厂发展。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合营工作的深入，也反映了生产组织上的变革。中小型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多半是先经过改组合并，然后合营。但是，从总的来看，在第二个阶段，即个别合营时期，实行公私合营的还是以大户为多。到 1955 年底，公私合营的总户数不过三千多户，占公私合营工业和私营工业总户数的 3.4%，但其资本额却已占 69.8%，产值已占 49.7%。这一情况，为公私合营工作的第三阶段，即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扩展合营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由主要行业到一般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从行业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公私合营的多半是和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主要工业行

业,如煤矿、钢铁冶炼、机器制造、纺织、面粉、卷烟等。到1955年以后,许多次要行业中也发展了公私合营。商业中的公私合营,也主要是在1954年以后才有所发展的。再从地区来看,由于1954年以前合营的都是大厂,而大厂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因此,合营工作也偏重于大城市。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内蒙古、辽宁、吉林、青海、新疆、贵州等省、自治区没有公私合营企业,到1954年全国各省市都相继扩展了公私合营。

第三,公私合营的方式,由个别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从个别合营到全行业合营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前进、不断提高的过程。个别合营在开始扩展公私合营的时候是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全行业合营的条件还不具备,只有选择重点,在合营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革,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吸取经验,树立榜样,才能为全行业合营提供有利条件。同时,个别合营都是大户,把那些大户合营了,就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力量,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才有可能使中小户认识到合营的优越性,使未合营的企业认识到变革所有制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合营工作又不能停留在个别公私合营的方式上。在合营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一定的经验之后,就需要结合对生产和市场的全面安排,分地区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否则,不仅社会主义经济和未合营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矛盾会日益突出,已合营企业和未合营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将日益突出,以致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破坏作用。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改造速度问题也日益成为重要问题,只有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公私合营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扩展公私合营中,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多数资本家已认识到公私合营是私

营企业必然的前途。但他们对资本主义还是十分留恋的。有不少人对合营采取观望的态度，或者尽可能拖延一下。少数人甚至消极抗拒，他们抽逃资金，变生产资料为消费资料，或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改造。申请公私合营的，又有种种不同动机，并有不少思想顾虑。如有的是为了“丢包袱”，企图将经营上的困难转给国家；有的是为了摆脱劳资关系；有的是为了争取地位，乃至企图借公私合营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在合营企业中发展资本主义。大体在酝酿公私合营时，资本家主要担心合营后的职权和财产处理问题，大小股东之间意见也常不一致。在合营过程中，则注意力集中到清产核资上，斤斤计较，希望尽量提高私股的估价，有些人甚至认为股额比重大就可取得若干权利。1955年下半年，公私合营工作发展到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合并合营的时候，资本家又产生了另一些想法。如有的想借此机会并进好厂，以扩张自己的势力；有的想打击同业，抬高身价。比较普遍的是大厂不愿带小厂，先进厂不愿带落后厂，他们怕吃亏，要求“门当户对”。小厂资本家也有顾虑，如怕失去地位，有所谓“宁作小国之君，不为大国之臣”的说法。

这一切说明，扩展公私合营既然是一场变革私有制的革命，就不能不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它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根本存亡问题，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震动要比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远为深刻而广泛。通过这个斗争，克服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就可以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现实教育，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大大前进一步。为此，党和政府首先是做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教育工作。各地都组成许多工作小组，充分和他们进行协商；并通过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组织向他们传达政策，解除顾虑；通过劳资协商会议等形式，由工会和工人群众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和帮助。同时，培养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提高他们的认识，使

他們在改造中發揮帶頭作用、骨幹作用和橋樑作用。其次，在合營工作進行中，堅決貫徹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協商安排資本家的職位，並給以必要的照顧，使他們消除顧慮。在清產核資中堅持“公平合理、實事求是”的原則，保障資本家的合法利益。同時，對某些資本家的不合理要求，不良企圖，以及造謠破壞、抽逃資金等活動，進行各種形式的教育和鬥爭；對他們不正確的思想，進行批評。尤其是在清估財產中，資本家弄虛作假等情況較為普遍，也必須採取教育、批評的辦法，進行糾正。再次，在合營過程中，從始至終要發動工人羣眾，搞好生產，依靠職工，摸清企業和資本家情況，確定各項工作和鬥爭的方針步驟。通過合營，使企業在生產經營上提高一步，職工的思想意識提高一步，就能給合營企業奠定鞏固的基礎，使各項改革可以順利進行。

第二節 公私合營企業的性質和作用

公私合營後企業生產關係的變化 國家資本主義的每一個具體形式，反映着一定的生產關係。公私合營，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其和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最大的區別，在於通過這一形式，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联系，由企業外部進入到企業內部，從而使企業的生產關係，發生了較初級形式遠為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從下述三個方面來考察：

第一，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來看，企業合營以後，資本家原先占有的財產經過清產核資成為私股，國家的投資作為公股，這樣，企業的生產資料就由原來的資本家私人占有轉變為國家和資本家共同占有，即公私共有。這種公私共有，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合股公

司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合股公司是资本和资本的結合。在公私合营企业里，资本家的私股还是资本的性质，它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而公股则不是资本，它是全民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经营资金，其目的是为了滿足社会需要。因此，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要求。但是，私人资本现在是和国家资金紧密地結合在一起，投入生产和流通了。由于企业的领导权基本上属于国家，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经营，因此，尽管资本家的财产还没有失去资本的性质，却已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不得不服从社会主义资金的运动。这样，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就由追求剩余价值改变为主要是为了滿足社会的需要，同时也給私人资本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

由此可見，在公私合营企业中，领导权掌握在誰手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和起着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不断增强，不是取决于国家投资的数量、公股所占比重大小，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企业中公方代表同职工群众的結合和他們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决于这种领导能够确实地推动企业向前进步。正因如此，所以在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于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是不断加强的，而公股在全部公私合营工业资金中所占比重，则是逐年下降的，如1953年为58%，1954年为45%，1955年为40.6%。这一点，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股公司也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随着所有制的改变也起了重大变化。合营企业中存在着三种不同身分的人，即公方代表、私方人员和工人群众。其中公方代表是合营以后进入企业的，是企业

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因素。

由于公方代表的出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建立了公方代表制度。这是公私合营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它保证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而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以发展生产、保证需要和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公方代表是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他们受国家委托，领导企业，并同私方代表一起负责经营管理。公方代表和私方之间的关系，从他们所代表的身分和阶级地位上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由于私方还作为私股即私人资本的代表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公方和私方之间又存在着公私协商的关系。“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有关公私关系的事项，公私双方代表应当协商处理，……”。（公私合营工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十条）

公方代表和企业中工人群众的关系，完全和国营企业中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关系一样，是基于社会主义分工而来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他们同属一个阶级，根本利益一致。

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的劳动，由于还有资本的运动存在，还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但是，由于企业里有国家资金，更由于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是为完成国家计划，为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工人劳动的性质发生进一步变化，主要不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同时也为资本家生产利润。

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发生变化。他们实际上成为企业的主人，参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公方代表结合在一起，成为企业的领导力量。因此，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这样，公私合营企业在发展生产上就可以和国营企业一样，完全摒弃资本主义

的加重剥削的方法，而是依靠各种先进制度的建立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善，依靠工人群众劳动积极性的高涨。

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他们是以资本家的身分和国家合营的，仍然是一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但是他们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却有了变化。在私营时期，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在企业中居于支配地位。公私合营以后，他们是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之下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改变了他们原先支配企业的地位。

在合营企业里还有资本家存在，劳资关系还没有根本改变，因而劳资矛盾也还存在。在私营企业里，这种矛盾表现为劳资双方直接对立，其处理方式是劳资协商。而在合营企业里，因为公方代表掌握着企业的领导，劳资关系问题，则主要通过行政和工会进行处理。

第三，从分配关系上看，随着所有制的变化，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首先，工人的工资开始具有了新的内容，即按劳分配的内容。在企业私营时期，由于生产资料为资本家私有，他们借此对工人群众进行着剩余价值的榨取，不可能有按劳分配。公私合营以后，所有制起了变化，企业经过一系列改革，逐步向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看齐，工资制度也将逐步进行调整，这才有了按劳分配的条件。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公私合营企业中，由于还有资本存在，按劳分配原则受到很大限制，突出地表现在随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剥削量也加重。

其次，公私合营企业的盈余也是按照四个方面分配的原则分配的，从形式上看，和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分配办法相同。但是实质上有所不同。其一，作为被分配的盈余的本身，已有了性质上的变化。这时的盈余，不仅是资本运动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资

金运动的结果。这就是说，这个盈余是由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与资本相联系，是剩余价值；另一部分与社会主义资金相联系，是社会必要劳动，是社会主义积累。前面曾经提到，企业一经合营，资本的运动就开始从属于社会主义资金的运动，丧失了其独立增殖自身价值的可能性，这就大大限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二，在盈余分配中，资本家所能占有的比例已经相对地缩小，如果过去他们是分取盈余的25%，现在必定小于25%（因有公股存在），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一定降低，甚至增加。其三，在分配中，除所得税、企业奖励金是国家和工人所有外，在初级形式，公积金部分是归资本家掌握的，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资本的作用。但在公私合营以后，公积金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按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公积金，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的用途，由合营企业依照国家的计划投入本企业，或者投入其他合营企业，或者依照本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投入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这就是说，公积金的所有权属于合营企业，它的使用权则归国家，这种公积金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个部分了。

如上所述，企业合营以后所引起的一系列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企业的性质已经变为半社会主义的了。而随着企业性质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就在企业中逐步扩大作用范围。

首先，公私合营企业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的目的是由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而转变为主要是满足社会需要。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就不再采取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方针，而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以发展生产、保证人民需要和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这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明显地在合营企业内部直接地发生了主导作用。但是，由于合营企业内部还有资本主义成分，剩余价值规律还起一定的作用。例如有些资本家在企业合营以后，

还是想多生产利潤高的产品；有的資本家甚至于做出“合公营私”的勾当，企图把公私合营企业变质成为資本主义企业，等等。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已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剩余价值規律自发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受到了严格的約束的。

其次，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它的生产經營已經有可能直接納入国家計劃，諸如国家可以規定其生产任务，以至其产品的品种、規格；国家可以按照計劃促使其扩大或縮小生产規模，决定企业的扩建、改建，等等。这說明社会主义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也已經在合营企业中直接发生作用，并居于主导地位。当然，国家在規定其产品、价格、利潤时，还需要运用价值規律，只是这个規律已不再自发地起調节生产的作用了。

公私合营的优越性 公私合营企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基本上在企业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事实，就为合营企业带来了为国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合营企业的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質和它的优越性的根源，在于我国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質，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及其在企业中的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公私合营企业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保护之下，充分發揮社会主义經濟成分的領導作用和优越性，就能团結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效地教育資本家和資方代理人接受經營管理的改革，就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并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从而使企业获得較多的利潤，积累資金，扩大再生产，使职工生活获得必要的改善，而且也使資本家有一定的利潤可得。具体說来，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表現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由于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的生产經營，由于合营企业在公股代表的领导下，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建立了各

种先进制度,并不断改善生产技术;因此,企业的设备有可能充分利用,企业的潜力得以发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据统计,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值,1950年为四千二百五十七元,1951年为六千五百五十三元,1952年为九千二百九十七元,1953年为一万零八百八十元,1954年为一万三千四百零一元,1955年为一万三千三百五十八元。1955年比1950年增加214%。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较同一时期的私营工业约高一倍。

(二)合营企业改进了生产经营管理,在增加生产、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上呈现了显著的成就。在增加生产方面,就全国历年来公私合营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来看,1950年共有公私合营工业二百九十四户,产值四点一四亿元,减除当年新合营的一百一十一户的产值,与1949年比较,增加了三千八百万元。以同样方法计算,1951年比1950年增长二亿八千六百万,1952年比1951年增长五亿二千二百万元,1953年比1952年增长六亿八千八百万元,1954年比1953年增长七亿七千二百万元,1955年比1954年增长二十七亿零八百万元。在节约原材料和降低成本方面,如上海市1954年合营的十九家棉纺厂,10月份还有十家的用棉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到12月份已全部低于标准,第四季度节约的棉花可以增产六百九十件棉纱,织成二万七千匹布。天津市1954年合营厂的生产成本,较1953年降低7.4%到10.26%不等。

(三)公私合营厂扩大了积累,扩大了再生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这六年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利润额总计达十二亿七千三百万元。合营企业的积累远较私营企业为大。在积累扩大的基础上,不少合营厂根据国家需要,扩大了再生产。如唐山市华新纱厂在公私合营五年间,新扩充的生产设备等于合营前三十年间投资建设的一倍。

(四)公私合營企業中的資本家和資方代理人在公方代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這就使他們有了直接受到社會主義實踐教育的機會。公方代表和工人結合在一起，形成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領導力量和監督力量。公方代表在領導生產經營上對問題的處理是從社會主義整體利益出發，與資本主義經營中從資本家個人獲得利潤出發成為一個強烈的對比，這就使資本家受到現實的教育，有可能逐步克服他們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學習新的社會主義經營管理方法。由於企業內有了社會主義成分直接領導，資本家的政治學習也有了便利條件。

個別公私合營形式的局限性 公私合營企業雖然有着上述一系列的優越性，解決了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在公私關係上和勞資關係上所不能解決的某些矛盾，但這個形式的本身仍然具有局限性。

首先，在這種形式中，兩種所有制即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這個根本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私股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具有資本的性質，占有剩餘價值。四個方面分配利潤的辦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剝削，企業利潤的主要部分不歸資本家所有，大部分成為國家的積累，但這種限制僅是相對的。資本家仍然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盈餘，所以利潤增長，資本剝削也就“水漲船高”。如前所述，公私合營企業一般生產發展很快，利潤增長很多，資本剝削因而增加很多。例如天津市永明油漆公司合營後，產量、利潤都增加了兩倍，私股分紅比合營前增加了一倍多。在一些合營較久，規模較大，生產管理基礎較好的老合營廠，資方利潤所得較大的情況，就更為突出。如上海市公私合營工業分配1953年盈餘的結果，據四十戶統計，私股所得占其資本額10%以上的有二十戶，占其資本額25%以上的有十戶，並有三戶高達

50—60%。这种情况必然招致工人不满，影响社会主义积累，形成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同时，资本家分配的利润过多，对他们的改造来说也是不利的。

其次，公私合营企业中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公私矛盾、劳资矛盾都没有完全解决。在合营企业内部形成了两种经营思想、两种经营方法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许多资本家仍然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继续执行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有利的干，无利的不干，利高的干，利小的不干。个别甚至使合营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如上海民用药厂1950年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不但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反而篡夺了合营企业的领导权，假借合营招牌攫取暴利。因而在合营五年间资本家竟拿走了等于原来投资额两倍的利润。

再次，公私合营企业与未合营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个别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阶段，主要是对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厂实行合营。这些厂合营后很快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加以随着企业性质的改变，国家在分配生产任务、分配原料等方面也给予较多的照顾，它们一般发展较快。这就往往影响到同行业的私营小厂，使它们困难更大，许多实行加工订货的小厂因而任务不足，停工减产。这不仅使私营小厂与公私合营工厂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影响到这些厂与国家的关系。根据统筹兼顾方针进行的全面安排工作，对小厂的困难固然可以解决一些，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大规模的经济改组是受到限制的，因而矛盾就不可能彻底解决。

上述一系列的矛盾表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仍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还必须向最高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实行定息制度推进。

第六章

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公私合营高潮的历史背景 我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许多行业在各地方分别地进行全部公私合营的阶段，并迅即形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这个高潮是由三年恢复、三年建设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所准备好了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以及城乡绝大部分商品流转纳入了有组织市场，使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日益突出起来，如果不进一步改造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提高生产力以适应人民需要，这就促成了改造高潮的必然到来。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1949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①

经过三年恢复，又经过三年建设，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极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為顯著的變化。一方面，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迅速增長，解放初期為 17%，恢復時期終結時為 26.7%，到 1955 年已增長為 33.6%。另一方面，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已經佔據了統治地位。到 1955 年，在工業中，國營、合作社營和公私合營經濟的產值已佔工業生產總值的 83.8%；在商業中，國營和合作社商業已佔商業批發總額的 94.8%，佔零售總額的 67.6%。此外，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濟部門，也都掌握在國家手里。而統購統銷政策的施行，加工訂貨的擴大，更使國家掌握了全國糧食、重要工業原料和主要工農業產品，控制了全國的重要商品市場。這就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和鞏固的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經濟則大大削弱了。銀行、對外貿易、批發商業等部門已經基本上排除了資本主義經營。私營大工廠、礦場和大部分輪船運輸業已經實行了公私合營。到 1955 年，私營工業只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 16.2%，而在這個總產值中，又有 82% 已經納入加工訂貨等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私營零售商業只佔全國商業零售總額的 32.4%，而在這個零售額中，又有 45% 已經納入經銷代銷等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和合作化形式。這就是說，六年來在黨和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貫徹執行下，它們已經完全依附於社會主義經濟，離開國家的加工訂貨、經銷代銷任務，離開國家的安排，它們就不能生存。它們已經有一隻腳被帶進了社會主義的門檻，而另一隻腳也已經非跟進來不可了。

正如前章所提到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後，資本主義所有制並沒有改變，從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勞資之間的矛盾並未徹底解決。而且，隨着整個國

家政治上和经济上社会主义形势的发展，就是在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矛盾也日益暴露和加深，要求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改变。同时，在已合营和未合营的企业之间，私营企业的大中小户之间，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矛盾也突出了，如果不突破企业乃至行业界限，统一调动生产力、统一安排，一系列的矛盾就不能克服。这样，在整个行业乃至各个行业里同时突破私有制障碍，就成了迫不及待的事。1955年下半年，上海首先就有八个工业行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接着北京对棉布商业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其它一些地方也进行了试点。这一系列的实践，证明全行业合营的确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一个全面改造的重大步骤，已是不可免了。

这种社会主义优势蓬勃发展，资本主义日益走上穷途末路和必须进行重大变革的形势，不能不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群众中引起反应。在党的领导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下，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迫切要求资本家接受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进入高潮。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中，他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尖锐地批评了农村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对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和步骤作了纲领性的指示。随之，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到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合作化，加入互助合作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64.9%，到了1956年6月，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99%。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意味着有五亿人口的农村最终地抛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人同农民的联盟从此建立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最广泛的經濟領域內代替了小私有制，这就堵塞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的道路，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兴起，党的限制富农的政策就轉而为消灭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政策。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唯一代表——富农經濟，基本上消灭了。人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大大上升，资本主义大大下降。整个国家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资本主义完全孤立了。

关于农村中的富农，是我国具体的历史經濟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問題。中国的富农，一般具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剝削的性质，而这种富农經濟在全国农业經濟中又不占重要地位，这两点都不同于許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农。在土地改革中，广大的貧雇农要求同时廢除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剝削。在解放战争时期，党采取了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給农民的政策，从而满足了广大貧雇农的要求。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在1948年2月，党中央規定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新政策，即将新区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首先是打击大地主；第二阶段，在平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也分配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但是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仍然有所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6月发布《土地改革法》，規定在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的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則予以保护。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党就采取了消灭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政策，随着农村合作化的实现，富农經濟就不再存在了。

这一切表明：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一个更高阶段的客观条件已經成熟了。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国内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外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二）具有高度觉悟和高度組織力量的工人阶级，要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三）五亿农民站在工人一边，同工人結成了巩固联盟；（四）日益强大的社

会主义经济，在各个经济部门都占了绝对优势；（五）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支离破碎，而且矛盾重重。这表明：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注定很快就要到来了。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自发地完成的，在这个重要关头，最重要的就是党的英明领导，抓住主要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革命高潮的出现。

高潮的准备工作 在各种客观条件成熟了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状况如何，能否跟得上形势，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建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下，经过历次群众运动，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过学习，他们受到了教育，思想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由于本阶级狭隘观点的限制，他们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是参差不齐的。一小部分是进步分子，他们比较了解政策，看清国家和世界的前途，愿意跟着党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少数人还能在改造中起核心作用。一小部分人是落后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心存不满，采取各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有极少数人还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反动分子。大部分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他们明知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得不走，但仍对资本主义恋恋不舍，因而对待改造时而积极，时而消极。他们常常患得患失，顾虑重重，对自己前途如何，命运如何，惴惴不安，对待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则表现为怕变革、怕斗争、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惶惶无主。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举行了座谈会，对他们作了亲切的教导。毛主席指示他们：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工商业者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

前途和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凡是現在對於工商業的改造有貢獻的，社會和國家都不會忘記他們的貢獻。接着，政府領導同志又在工商聯的會議上，對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實行定息，繼續貫徹贖買等政策，作了說明。

毛主席的講話和黨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資產階級的懷疑和顧慮，給他們以極大的鼓舞。他們說：毛主席的指示像太陽一樣，照亮了全國工商業者前進的道路。在1955年11月間召開的全國工商聯一屆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他們通過了《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全國工商業者積極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同年11月間，黨中央召集各省市黨委代表開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對當時的形勢作了充分的估計，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規劃。隨之，在同月召開的中央七屆七次全體會議上，制定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社論。在這些會議和文件中，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民族資產階級狀況，總結了黨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問題和幾年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驗。指出：現在已經有了充分有利的條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主動地、積極地、認真地領導這一工作，使之能夠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發展相適應。應該切實地統一黨內和工人階級內部的認識，克服某些同志不願意和資本家打交道，實際是不相信黨、群眾和國家有力量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資產階級的右傾情緒。應該加強黨對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工作的領導，作出全面規劃。應該切實地加強對於資產階級的教育，加強培養工商界進步核心分子的工作。黨還着重指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地用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即使是經過和平的道路，仍然是一場深刻

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不遇到许多人的抵抗，不可想像不需要用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来克服这些人的抵抗。

由于客观条件的具备，又加上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工作，不仅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也调动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1956年1月，继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一个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就在全国大小城市开展起来。

高潮的经过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从首都北京开始的。1956年1月1日，首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首先踊跃地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这时申请合营改变了原来一户一户的情况，而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因而很快就形成了热火朝天的运动，到1月10日，就实现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与此同时，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全部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绝大部分手工业者也组织了生产合作社，走上合作化道路。这就是说，北京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已全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大大推动了其他城市的改造高潮，全国各地都浸润在高潮的欢腾气氛之中。到1月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集中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相继实现了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至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那些少数抗拒改造的资本家不敢公开反对。大部分资本家跟着工人阶级，敲锣打鼓地参加了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行列。高潮中涌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积极分子，他们带头申请合营，并推动别人申请合营。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虽然不太勉强地交出了企业，但他们的内

心深处是心有余痛的。甚至有的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在全国范围内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决定性的一战，它不能不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但是，在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反抗，这是因为：“（1）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出路；（2）经过‘三反’‘五反’，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工人阶级是没有出路的；（3）政府对他们合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置。”^①

1956年初，全国原有资本主义工业八万八千余户，到年底，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其中有极少数转入地方国营工业，大部分组成了三万三千多个公私合营企业；同时有四万八千二百多户个体手工业由于它们与私营工厂原有协作关系，或者是行业户数不多，根据他们的申请，也参加了公私合营。全国二百四十余万私营商业户，到1956年底，已有82%实现了改造；其中除少数转入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商业外，分别组成了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私营轮船、汽车运输业在高潮中也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私营饮食业有86%实现了改造。到1957年底私营服务业有77%实现了改造。

1956年私营工业改造情况

	户 数 (千户)	职工人数 (千人)	总 产 值 (百万元)
1955年底原有私营工业	88.80	1,310	7,266
1956年内已经改造的私营工业	87.93	1,296	7,257
1. 实行公私合营的	64.23	1,075	6,545
2. 转入地方国营工业的	1.00	23	98
3. 划归手工业改造的	15.60	117	299
4. 其他(主要为公私合营商业)	7.10	81	295
改造面额	99.00	98.9	99.6
1956年底尚未改造的私营工业	0.87	14	29

①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私营輪船运输业在高潮前实行公私合营的船舶数已占私营和合营总船舶数的 44.07%，載重量已占总載重量的 88.13%。1956 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船舶数已占公私合营和私营总船舶数的 98.62%。到 1957 年則已全部实行了合营。

私营汽車运输业截至 1955 年底，已改造戶数占 21.9% 未改造的私营戶占 78.1%。截至 1956 年 6 月底，已改造戶数占 99.7%，未改造的私营戶占 0.3%，到 1956 年底，私营戶只有汽車六輛，1957 年底更減至三輛。

截至 1956 年底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绝对数			比重%		
	戶数 (千戶)	从业人員 (千人)	資本額 (百萬元)	戶数	从业人員	資本額
总 計	2,423	3,138	841	100	100	100
1. 已改造部分	1,991	2,824	785	82.2	85.1	93.3
轉入国营、供銷社者	147	224	—	6.1	6.8	—
公私合营	401	877	601	16.5	26.4	71.5
其中实行定息的	281	706	554	11.6	21.8	65.9
合作化商业	1,443	1,723	184	59.6	51.9	21.8
其中合作商店	581	722	104	24.0	21.8	12.4
2. 未改造的私营	432	494	56	17.8	14.9	6.7

截至 1956 年底私营飲食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绝对数			比重%		
	戶数 (千戶)	从业人員 (千人)	資本額 (百萬元)	戶数	从业人員	資本額
总 計	757	1,142	87	100	100	100
1. 已改造部分	651	1,015	79	86.0	88.9	90.8
轉入国营、供銷社者	60	84	—	7.9	7.4	—
公私合营	84	210	37	11.1	18.4	42.5
其中实行定息者	55	154	32	7.2	13.5	36.7
合作化飲食业	507	721	42	67.0	63.1	48.3
其中合作飯店	214	317	22	28.4	27.8	25.3
2. 未改造的私营	106	127	8	14.0	11.1	9.2

截至1957年底全國私營服務業社會主義改造情況

	絕對數		比重%	
	戶數 (千戶)	從業人員 (千人)	戶數	從業人員
總計	327.7	573.5	100	100
1. 已改造部分	254.4	475.6	77.6	82.9
轉入國營、供銷社者	6.4	14.6	2.0	2.5
公私合營	48.5	163.3	14.8	28.5
其中實行定息者	36.1	140.4	11.0	24.5
合作化服務業	199.5	297.7	60.8	51.9
其中合作商店	83.6	133.5	25.5	23.3
2. 未改造的私營	73.3	97.9	22.4	17.1

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 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黨和政府對資產階級繼續貫徹贖買政策，在一定時期內給他們以定息和適當安排他們的工作。為此，在合營高潮中，全國各地都進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工作。

定股，就是對資本家實行合營的生產資料，進行清理估價，核定私股股額。在個別公私合營階段，定股工作是按戶由國家派工作組到企業，會同資本家共同進行的。這樣作法比較細緻，但工作量大，時間也拖得長。在高潮中，一個地區一次批准公私合營的戶數很多，定股工作採取了在企業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業評議、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核定的方式。在當時形勢下，採用這種方式是必要的。而且，通過這一工作，對資本家來說，也是一個深刻的教育過程。

清產定股的原則，仍然和個別合營時一樣，即“公平合理，實事求是”，但為了適應改造高潮中資產階級已經交出了經濟陣地的情況，使他們擺脫財務處理上的牽累，有利於改造，政府對清產定股還提出了“寬”和“了”的方針。所謂“寬”，就是對財產清理估價有關公私關係方面的問題，一般都從寬處理。所謂“了”，就是對企業

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能够在公私合营时候了结的，都尽量了结。这样清理的结果；连同1956年以前合营的企业在内，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为二十四亿一千八百六十四万元。

“宽”“了”方针中所谓从宽处理的，如企业的公积金，原是社会积累，但一般作为私股投资处理；逾期机器设备，仍按其实际尚可使用年限计算其现值；土地按纳税价计算，等等。所谓尽量了结的，如企业在困难时拖欠工人的工资，国家帮助劳资双方协商了结；企业对公欠款（如税款、国家银行贷款、“五反”退补等），如果资本家确实无力全部偿还，可适当减免。对于资不抵债户，为了便于对他们改造，尽量不宣布破产，一般都保留少数私股，使企业维持公私合营。

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按期由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发给私股股东以固定息率的股息。国务院于1956年7月间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户，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不分老合营新合营，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5%。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五厘。过去早已采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如果他们的息率超过五厘，不降低；如果息率不到五厘，提高到五厘。”这个规定是宽大的，高潮前私营企业资本家的股息红利有的固然很多，但有些则因企业常有亏损而所得无几，平均起来是达不到五厘的。各地定息的结果，超过五厘的计有四千三百六十八户，占全部定息户的2%稍多一些，其余全部定息五厘。定息期限原定为七年，从1956年起到1962年止，“如果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一个尾巴。”^①1962年又宣布，从1963年起，延长三年，到时再议。

^① 陈云副总理：《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工商界代表讲解五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6日。

定息不是合營高潮中才出現的，早在個別公私合營階段，某些由國家管理的大合營企業就實行了定息制度。但是，作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中普遍推行的贖買形式，則只有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才有可能。因為普遍的定息，是以資本家繳出企業，全部企業由國家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統一管理為前提的。也可以反過來說，全行業合營後必須實行定息，定息作為一種制度，是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客觀要求。這是因為：（一）全行業公私合營必然要涉及生產改組，以便統籌運用企業的人力、物力、財力，如果不實行各業各戶息率一致的定息制度，各業各戶盈虧不同，就會形成改組的障礙。（二）全行業公私合營要求突破企業、行業的界限，統籌運用各個企業的積累，只有實行定息，才能作到這一點。

全國公私合營企業定息戶發息情況：

1956年上半

金額單位：千元

	實行定息 的戶數	各業比重	私股金額	各業比重	1956年上半 年應發股息
總計	190,902	100.00	2,307,203	100.00	57,576.1
工業	43,687	22.88	1,782,649	77.27	44,534.9
商業	97,235	50.94	352,638	15.29	8,810.0
飲食業	14,408	7.55	18,555	0.80	449.0
服務業	12,741	6.67	36,316	1.57	910.0
交通運輸業	22,828	11.96	74,795	3.24	1,743.2
金融業	3	—	42,250	1.83	1,129.0

注：服務業指理髮、照相、澡塘、旅館、洗染五業。

改造高潮中繼定股、定息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人事安排。劉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資方人員凡能工作的都由國家有關部門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給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濟，保障他們的生活。這也是一種必要的贖買的办法”。^①同時，安排資本家的工作職務也還有其必要性。一方面，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靠

“剪息票”生活的为数不多，大多数人过去都直接参加企业工作，其中又多半是直接参加生产经营的，当他们表示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家有必要给以生活保障。并且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有不少人是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的，安排他们的工作，可以使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技术与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另一方面，以企业为基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也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有效方式。他们在企业中工作，可以得到党的经常的具体的教育，在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和影响下，通过劳动实践，逐步地改造思想，转变立场，培养劳动观点，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知识。这样，可以把教育和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改造高潮中在提拔一批优秀工人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对资本家的工作也进行了安排。

对私营企业原有在职资本家及资本家代理人进行工作职位的安排时贯彻了“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所谓“量才使用”就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经验、政治态度，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贡献等情况，安排他们的工作职位，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所谓“适当照顾”，就是对于一部分年老体弱或其他原在企业里著有劳绩、目前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安排以比较适宜的职位，或者本人退休、吸收他家庭中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参加工作。安排过程中充分贯彻了民主协商精神，安排的名单，由工商界酝酿讨论，并邀工商界代表人物协商，最后由政府批准。根据1957年的统计，全国拿定息的七十一万在职私方人员和十万左右资本家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据几个大城市的情况，大体是：安排直接参加生产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

經營的占 60—65%；安排为管理人員的占 35—40%。对部分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还安排了国家机关、国营經濟业务部門的行政职务，并注意給一些担任社会职务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資本家以便利条件。

根据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西安、青島、重庆等七个城市的統計，到 1956 年底为止，已被安排的私方实职人員共計四万五千九百零五人，其中担任市一級专业公司經理、付經理的計有一百六十八人，担任工厂正、付經理、厂长职务的有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二人，占安排总数的 36—37% 左右。另据上海市五个工业局統計，在所屬地方合营工业中，1956 年一年中对二万五千八百余私方人員安排了工作，81% 的私方安排为科室人員，其中担任經理、厂长的占安排人数的 55%；另有六千余人安排为組长、股长及一般科室工作人員；安排在車間工作的占 10%。有的还担任了企业的顧問、專員、董事等工作。此外，安排在上海市的中央系統棉紡、卷烟、造紙、毛紡等八个专业公司担任正、付經理的私方人員有十五人。安排在五十七个市級工业专业公司的正、付經理的有九十九人。广州市公私合营工业已安排的私方人員七千零三十五人，担任专业公司正、付經理的二十八人，董事及顧問三十人，公司正、付科长五十一人，企业厂长七百零六人，車間主任及科、股长一千一百零八人，技術人員一百四十八人。

对私方实职人員除了安排各厂及专业公司的行政人員之外，部分資產階級的上层分子，由于他們一般在工商界具有較大的代表性，国家安排了他們的政治职务。根据 1957 年底統計，民主建國會（主要由資產階級分子組成的政党）會員除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的七十人，第二届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員會委員的六十五人外，担任部长付部长的七人，大学院校长二人，副省长七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的副市长四人及正副局长二十四人，省正付厅长三十五人。

私营企业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薪金一般較高，有的很高。

如上海对外贸易系统资方六百八十二人，平均工资二百二十三元，其中超过现任职务应得工资一倍以上的有四百六十五人，占总人数的68%。1955年统计，上海私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投资在十万元以上的资本家五百零九人中，工资在一千元以上的有十二人，其中最高的一千六百七十五元。资本家的高薪也是一种剥削，但是为了减少阻力，利于改造，所以把这种高薪作为赎买政策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1956年到1957年各地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工资改革时，也都不予更动。如天津市1957年进行工资改革时，三万一千四百零七个私方人员中，有45%的人有保留工资，保留工资在二十元以上的占有保留工资人数的66%。

第二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经过这个阶段和这个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将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全行业公私合营还没有消灭剥削，没有最后消灭私有制。但是，它和个别公私合营阶段不同，由于实行了定息，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个别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仅是数量的发展，而且是质的飞跃。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后，企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化和私股的性质 在个别公私合营阶段，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公私共有的，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金，也有私人资本。全行业合营并实行定息制度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就不是公私共有了。这时企业的全部生产资料由原来的资本家私人

占有轉變為歸國家統一管理、統一使用，實際上是和社會主義生產資金一樣地投入生產和流通過程為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了。

當然，經過定股，資本家在形式上仍然保留着財產所有權，還有私股。但是這種私股，已不起職能資本的作用。因為它實際上已和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分離，不能再支配、使用 and 處理生產資料，也不能再支配生產品和價值的分配。它的作用只不過是一種領息憑證，在一定時期內帶給資本家一定數量的股息。至於股息數量的大小，則同企業盈餘的多少已斷絕了依存關係。

對資本家來說，私股看起來還具有生息資本的某些特徵，因為它還表現為一定數量的價值上的占有，從而使資本家取得一定數量的股息。但是，它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息資本有本質的不同。一則，生息資本是把資本的使用權託渡給另一個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用以剝削工人，創造剩餘價值。而私股所體現的，則是資本家把生產資料交給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這些生產資料一旦掌握在國家手中，就不再起資本的作用，而是為社會主義生產服務了。再則，生息資本把資本的使用權託渡給別人，目的在取得利息收入。託渡的可能性是由於資本主義平均利潤規律的作用，它可以獲得相當或稍低於一般利潤的收入。私股雖然也有定息的收入，但這種定息，並不是使用權託渡的條件，定息的大小，也同企業的利潤無關。最後，更重要的是，生息資本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它的運動過程是“貨幣——貨幣”。而私股則是在一定時期後國家停止定息，就歸於消滅，它本身沒有資本運動的過程。因此，私股不是生息資本，它只是私有制的一種殘存形式，是我國資本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中所產生的，由私人資本向全民財產轉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形式。它已失掉資本的實質，僅余軀殼，其仅有的作用不過

是領取定息的凭証而已。

企业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 就資本家說，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制度以后，又經過人事安排，他們在企业中具有了两重身分。一方面，他們还拿定息，他們的資本主义立場和思想意識基本上沒有改变，他們仍然是資本家身份。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已經把生产資料交給国家，由于私股已不再起职能資本的作用，他們也不能再以資本主的身分控制企业的經營管理，而是以国家任命的企业工作人員的身分，在公方的領導下来参与企业的經營管理。这就是說，他們又具有了公務人員的身分。因此，他們在企业中的地位与权利，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在私营企业中，乃至在个别公私合营企业中，資本家的权利实际是代表資本的权利，即財產权、經營管理权、人事調配权；只是这些权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公私合营企业中資方人員的有职有权，它的内容，已經不是公私合营以前的三权，而是国家給予他們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职权，这不是資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務人員的职权。”^①

就企业中的工人來說，首先是劳动的性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公私合营企业中不再存在資本的运动过程，因此工人也就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他們基本上是自己，为社会从事劳动。只是在定息存在的条件下，他們还要为資本家生产一部分定息。他們的劳动直接体现为社会劳动，成为国民經济中有計劃地組織起来的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国家就可以最充分地利用劳动資源，各合营企业和国营企业間的劳动力可以統一調配，技术力量可以統一分配。其次是，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公私合营企业

^① 陈云副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1956年9月20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号，第64頁。

既由國家管理，企業的工人也就和國營工人一樣，成為企業的主人。他們和公方代表結合在一起，參加了企業的經營管理，很多工人並且被提拔成為領導幹部、管理幹部。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勞資雙方地位的变化，使企業中產生了一種新的關係，就是公私共事關係，也就是公方、職工作為一方，和私方人員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共同工作的關係，性質上是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關係。因為私方人員具有公務人員的身分，他們的工作客觀上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階級對立的關係，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係。因為私方人員還有剝削收入，他們在政治立場上還是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的關係的建立，反映著原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根本改變，反映著資產階級分子開始向勞動者的逐步過渡。

分配關係的变化和定息的性質 公私合營企業的生產資料是由國家統一管理和使用，從而企業的產品也由國家統一掌握，同國營企業的產品一樣，按計劃調撥、分配。在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的一定時間內，國營商業同公私合營工業之間一般仍保持着加工訂貨的關係，但其性質已經和私營時期的加工訂貨不同了，企業的生產品已經是由國營工業專業公司或專業局來管理，國營商業只負產品調撥和商品流通的任務。

但是從價值的分配來看，公私合營企業中還存在着兩種分配關係。一方面：由於企業性質的改變，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即按勞分配，已經成為主要的分配方式。這時，勞動力已不再是商品，工資也不再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態，而是國家給予的勞動報酬，是總產品中扣除物化勞動的補償、擴大再生產和社會基金以後分給個人的部分。全行業公私合營後曾經逐步進行了全國性

的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使工资差别基本上决定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这就保证了按劳分配原则的进一步贯彻。与此同时，还普遍实行了劳动保险。另一方面，合营企业中还保留着按资本分配的部分，即定息和属于赎买性质的高薪，但是这一部分在分配中不居主要地位。

定息是按照资本家原来的资本量，即合营后的私股股额来分配的，一般说，它是从资本家交出来的生产资料在进行生产时转移到产品上去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过去的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当然，有些企业，其赎买代价已经超过了原来生产资料的价值。但无论如何，定息仍然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否定定息的剥削性质，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定息这种剥削已经同企业的盈余多少无关，这就解决了个别公私合营时四个方面分配利润的制度下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再造成剥削收入的增长，而只有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和工人的收入。这种剥削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也不同了，它已经不是从资本雇佣劳动实现的，而是工人在国家所组织的劳动中创造和实现出来，经过国家的分配转到资本家手中的。因此，定息这种剩余价值式的剥削，基本上已经不成为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障碍。

定息(还有高薪等)是作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赎买形式而出现的，它体现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的阶级关系，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根子还没有割断。它的作用在于使资产阶级在所有制的巨大变革之后，在生活上不致发生急剧的变动，在生活 and 思想上有充裕的安排时间，以利于工人阶级对它们逐步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也有利于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

服务。所以，这一政策的采取，是和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相一致的，它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在定息制度刚一出现时，国内学术界有些人对定息的性质曾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定息是资本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所获得的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因此它是在分配领域发生的。也有人认为，定息是国家规定给与资本家的，是国家预算的支出，因而它不体现价值关系。这些看法，都不够全面。不能把定息理解为完全是分配领域中发生的，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一部分或是国家预算支出中的一部分。因为这样，就会得出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已不存在剥削关系的结论，资本家就不再在企业内存在，而只在社会上存在了。并且，事实上，定息是从公私合营企业的积累中支付的，不是从国家预算中支付的，只是由于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已经进行了经济改组，以及有少数企业生产任务改变或停止，各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支出由政府主管部门统筹调配而已。定息的时间，因而它的总量，基本上也不是决定于资本家交出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是决定于改造的需要。必须从定息制度所包含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内容全面观察，才能了解它的真正意义。

所有制革命的基本完成 综上所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以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这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基本解决了，这部分生产力被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企业由国家统一管理，按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生产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这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代替了剩余价值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代替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规律，直接在企业内发挥作用；同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成为企业中

居統治地位的分配方式。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决定意义的步骤。由于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资本主义就已经不再作为一种经济成分而存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革命基本完成了。同时，全行业公私合营也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飞跃，在高潮中，不仅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企业迅速转入最高形式，连原来没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企业，也一下子全部过渡到最高形式，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问题。随着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又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以社会主义基本战胜资本主义而告解决了。

第三节 公私合营企业的改革、改组和調整公私共事关系

改革、改组的必要性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改变了私营企业的性质。但是，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尽管在高潮前有过某些改革，但基本上还是改变不多。这种经营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目的，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这一要求建立起来的，因而所有的制度和组织都是为了有利于剥削和压迫工人，以至剥削其它劳动者，攫取利润。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和组织，又是根据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和流通这一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制度和组织中，因而又有适合于当时社会条件，适合于组织生产和适应消费者需要的一面。所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要当作民族遗产继承下来，予以利用和发

揚。而有許多是不合理的，它們與新的生產關係不相適應，而且日益成為發揮生產經營潛力的障礙。這就是：一方面，合營企業內部還遺留着原有的機構臃腫、人員過多、勞動組織不健全、開支浪費、規章制度不合理等一系列資本主義企業腐朽落后的東西，阻礙着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高潮中新合營的企業，就工業說，多數是分散落后的小型廠，生產協作關係複雜混亂，設備和技術水平很低，生產力配置不盡合理，這與發揮企業生產潛力，組織有計劃生產的要求有很大矛盾。就商業說，商業網分布不平衡，行業之間，地區之間，有的過剩，有的不足，不能充分發揮為生產、為消費服務的作用。

因此，在所有制變革基本完成以後，還必須對公私合營企業進行經營管理制度的改革，進行經濟組織的改組，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全部企業由國家統一管理，這就為全面進行改革、改組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對合營企業的改革、改組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根據它的兩重性分別對待，該繼承的繼承，該廢除的廢除。因此，對待這一工作不能倉卒從事，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觀察研究，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為此，國務院於1956年2月8日，即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初期階段，就發布了《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規定私營工商業在批准公私合營以後，一般應在半年左右時間內，照舊生產經營，以便在有充分準備，經過仔細考察研究、統籌規劃的條件下，妥善地逐行逐業進行必要的經濟改組和企業改造工作。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樣規定在實行合作化以後，也要有一定的時間，暫時照舊生產和經營，以便經過仔細研究和規劃以後，再妥善地進行改組和改造工作。

企业改革 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公私合营企业的企业改革工作，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加强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組織领导。这就是，在組織系統上設立专业公司或指定专业机构，統一負責所属合营企业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指定中心厂或中心店，按业务、地区或协作关系把分散的合营企业組織起来。在企业内部則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公方代表制度，健全工会組織。这种組織领导的加强，是和生产关系基本变革完成相适应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證合营企业生产經營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證合营企业有可能按社会主义的准則来改革企业的經營管理制度。

第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經理）負責制；建立有职工和公私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机构。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私营时期資本家独裁专断的局面，代之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內容的民主管理，这既可以加强企业中党的领导，又有利于發揮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三，实行計划管理，加强生产經營的計划性。計划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主要特征，在合营企业里貫徹計划管理，就有可能使这一部分企业的生产經營成为国家統一經濟的組成部分，在国家統一計划之下进行有节奏的活动。在推行計划管理的同时，必須逐步实行經濟核算，从而彻底改变資本主义生产經營浪費的面貌。

第四，改革工資制度。国务院規定：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資标准和工資制度，應該逐步向同一地区的性質相同、規模相近的国营企业看齐。合营企业的工人、職員和私方人員的現行工資标准，同当地同类性質的国营企业的工資标准相比較，高了的不减少，低了的根据企业生产、营业情况和实际可能，分期地逐步增加。現行工

資標準高于新定工資標準的部分，給予保留。保留的工資，今後隨着提高工資標準和升級逐步抵銷。這個規定既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也照顧到從實際可能出發。而且做到了企業內部工資制度逐步統一合理；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及各類人員之間的工資懸殊狀況逐步有所改善。

對於合營企業原有的經營管理方法和經驗中合理的、有用的部分，在企業改革中都保留了下來。許多行業還吸收有經驗的私方人員組成業務委員會，研究和總結他們的經驗，有的還寫成專書。

在企業改革過程中，也有一些地方一些行業操之過急，出現了一些缺點，主要是企業管理機構過大，層次過多，統一核算的範圍過廣，表報過於複雜，等等。經過研究，都作了改正。

企業改革是改造生產關係的繼續，它的中心內容是以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代替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在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充滿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思想的鬥爭。這種鬥爭，一方面鍛煉了工人羣眾；一方面也給企業的私方人員以非常現實的教育，使他們從對舊制度的批判中認識資本主義的落後，從新舊制度的對比中認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經濟改組 合營企業的經濟改組，包括工業的生產改組和商業的調整商業網。經濟改組的目的是為了搞好生產經營，充分發揮企業的生產經營潛力。因此，企業生產經營的好壞，就成為合營企業經濟改組工作做得好壞的標志。而要使經濟改組工作真正發揮促進生產經營的作用，在步驟上就要先抓生產經營，通過生產經營摸清情況；做好改組規劃和一切必要的準備工作，然後才有領導、有步驟地分批分期進行。

生產改組並不是要把所有的小廠都併成大廠。這是因為許多工廠雖然規模小，但它們的服務面廣，適合於需要適當分散的生

产。而且有些小厂所生产的小产品，虽然产值不大，但品种繁多，各有各的特点和销售对象，是大企业一时不能代替的。有些小厂在技术上还有优良的工艺传统，人民群众欢迎它们的产品。所以，为要搞好生产，有些固然要合并改组，但是许多小厂并不是都需要合并，有些是目前不需要合并，有些是长期不需要合并。可以并厂的只是那些厂房设备有条件，先进设备可以代替落后设备和手工生产，工序可以平衡衔接，变厂外协作为厂内协作，以及集中生产而不致影响品种和供销协作关系的少数行业和企业。为此，国家规定了当时改组的方针是：“大部不动，小部调整”；改组中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一）必须服从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改组工作一定要能够达到提高和改进生产的目的，必须做到不降低产品质量，不减少品种，不提高成本，并保留优良的工艺传统、技术特点和好的经营管理方法。（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厂房和技术力量，发挥潜力，节约国家的投资，反对不顾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脱离实际的贪大、贪新的做法。（三）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尽量使工厂少变动，不轻易打乱各企业之间的依存协作关系。（四）注意对工人群众生活的安排和劳动条件的改善，照顾到消费者的需要和便利。

生产改组的形式是根据行业、地区的特点和国家计划生产的需要确定的。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主要采取并厂和联合管理两种形式，此外还有少数企业迁厂或裁撤。并厂是几个企业集中生产，统一核算；联合管理则是有一部分是分散生产、统一核算，有一部分是分散生产，分别核算。据统计，到了1957年6月，在高潮中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中，进行合并的约占半数；采取联合管理的约占三分之一，联合管理中，实行统一核算和分别核算的，又约各占半数；其余则为单独管理、迁厂或裁撤。

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生产改組的具体形式和作法,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并厂:选择生产较先进,设备和厂房又有潜力的大厂为核心,把产品类型和工艺性质相同的若干小厂并进去,实行集中生产;或者是把工艺过程衔接的不同工序的工厂,和协作关系密切的工厂,以一个大厂为核心,合并成为全能厂集中生产。也就是“以大厂带小厂,以先进厂带落后厂”,由那些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大厂来带动为数众多的小厂,以利于提高小厂和落后厂的工业生产水平。

(二)迁厂:就是对分布不合理,离开原料产地或销售市场很远,因而造成不必要的原料或成品来往运输的浪费,增大生产成本的企业,进行地区上的调整。

(三)联合管理:就是在一个行业内选择若干中心厂,在平衡生产能力和不打乱原有协作关系的前提下,按照地区相近,工艺性质相同或者工艺过程衔接等条件,把分散的小厂领导起来,实行统一管理。通过联合管理来统一安排生产,加强协作,交流技术。这又有两种形式:分散生产、分别核算和分散生产、统一核算。联合管理也可以作为并厂的过渡形式。

(四)单独管理:就是对某些规模较大,或者产品特殊,有独特的风格和工艺,有一定的服务对象,适宜于分散生产、单独经营的企业,就不去改变它们的原有组织形式。

(五)裁撤:对某些产品完全不合需要,厂房、设备也陈旧不堪的企业,就在改组中逐步淘汰,从业人员由国家安排。

商业网调整主要是合理部署商业网点,改变原来的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网点过剩,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网点不足的情况。同时要考慮所经营商品的特点。如经营生产资料的,以及不属于人民日常需要商品的(如医疗器械、电器材料、乐器、钟表眼镜),宜于集中而不宜分散;经营日常所需商品的(如杂货、食品、油盐酱醋),又宜于分散不宜集中。为此,商业网调整工作,基本上是根据具体行业、具体业户、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了保留、合并、迁移、撤点、增設、

扩大、調剂人員等不同办法，灵活掌握，区别对待。

在經濟改組中，也有的地方出現一些缺点。主要是一时集中得过多、过大，和对原有的协作关系注意不够，有些关系中断，影响生产經營。經发现后，都作了改正。

經濟改組主要是生产力的合理組織問題。但是，生产力的組織和生产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經濟改組是生产关系改造的結果，而这种改組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造。例如在全行业間乃至几个行业間进行企业的合并、联管、迁移、調整，在私有制的情況下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只有在破除私有制的障碍，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由社会主义国家統一管理和調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当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也有生产的集中；但这种集中是在資本家們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經過“大魚吃小魚”的悲惨过程實現的，其結果是进一步加深資本家之間的竞争，加深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把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推向壟断阶段。而公私合营企业的經濟改組，則是在“以大帶小、以先进帶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原則下进行的，其結果是加强各企业、各行业之間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加强生产社会性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致性，推动合营企业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造。

調整公私共事关系 公私共事关系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以后新建立起来的。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不仅有利于發揮資產階級分子在政治上、工作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帮助他們逐步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也有利于对企业进行改革改組，發揮公私合营优越性，提高公私合营企业生产經營水平。

公私共事关系既是共同工作关系又是階級关系。公私共事关系包括企业职工、公方代表和資產階級分子三个方面。工人階級

在企業中居于領導地位，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對於搞好公私共事關係當然具有領導的責任。但是，公私共事關係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資產階級分子的态度。

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後一段時間里，資產階級分子的資本主義立場基本上還未改變，許多人對於交出企業心有未甘，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還不心服，對於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不但完全陌生，許多人更有不同程度的抵觸。表現在對企業不關心，對公方代表不服氣，工作上縮手縮腳，怕負責任，一些人更是敷衍消極。在這種情況下，公私共事關係本來是不容易搞好的。加以公方人員還沒有處理公私共事關係的經驗，既不敢積極地領導，又不敢放手地大胆地使用資產階級分子。還表現在有些公方人員對私方人員不敢信任，對私方人員的職權不夠尊重。而職工群眾長期受資本家剝削，歷史上遺留下來對立情緒，也不可能很快地消除。因此，許多公私合營企業的公私共事關係還不夠正常。

為此，黨和政府於1956年下半年進行了調整公私共事關係的工作。首先是對公方幹部和職工群眾加強黨的統一戰綫政策教育，使幹部和職工明確認識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對資產階級分子合作共事採取正確态度。這就是既要熱情地團結他們，尊重他們的職權，在工作中同他們多接觸、多商量，及時地向他們交待黨的政策，幫助他們了解工作情況，幫助他們學習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以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又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採取適當的方式，對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提出誠懇坦率的批評和意見，幫助他們學會批評與自我批評，幫助他們更好地進行政治思想改造。

其次是對資產階級分子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教育他們積極工作，努力作到守職盡責。教育他們對改善公私共事關係採取積極正確的态度，主動地接近公方幹部和工人群眾，接受公方代表的領

导,努力向职工群众学习,以争取改变工人群众的观感。

再次,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方面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在党委和公方代表领导下,明确资产阶级分子的分工范围,吸收他们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机构,让他们批阅他们职责范围内所需要批阅的文件,让他们参加职责范围内应该参加的会议,等等。

自从采取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后,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逐步有所改善。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政策的实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又经过改革、改组和公私共事关系的调整,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规模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生产经营也有了很大的改进。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32%;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额,也比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额增加了15%以上,充分表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

公私合营企业的企业改革、经济改组以及公私共事关系的调整,都是长期性的工作,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逐步进行改革和调整,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组织更加合理、更加完善。这样改革和调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深入,使公私合营企业逐步达到国营企业的水平。

经过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我国取得了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1958年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随即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豪迈雄伟的社会主义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公私合营企业在大跃进新形势的要求推动下,又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改革和改组。这时候的企业改

革和經濟改組，是和国营企业在統一領導、統一部署下一起进行的。改革、改組的内容和方式，也与国营企业大体相同。同时，經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公私共事关系也更趋于正常了。

第四节 个体商业的合作化

小商小販的两重性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小商小販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我国由于經濟落后，人口众多，小商小販成为商业中十分发达的一种形式。根据 1955 年的统计，全国小商小販約二百八十余万户，从业人員三百三十余万人，他們在全国私营商业总戶数中占 96%，經營的商品流轉額占私营商业商品流轉总額的 65%。小商小販是个体劳动者，一般仅有少量本錢，開設小規模商店或肩挑叫卖和摆摊出售，不雇佣职工或只雇佣少数輔助人員，主要以自己及家屬的劳动收入来維持生活；这和以剝削雇佣劳动来实现剩余价值的資本家商店是有所不同的。

小商小販是一种便利消費者的商业形式。他們散布于城乡广大居民区，和消費者有密切的联系。他們沒有固定营业时间，可以出售一針一綫等零星貨物，能及时改变和增加經營品种，群众需要什么就卖什么。有时还为顧客作一些輔助劳动；并能按一定路綫巡迴出售，或深入偏僻、边远地区，送貨上門。在过去农业生产分散落后、农村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小商小販在农村中更有重要的作用。他們的“一籠子”經營方式，适合农民购买习惯；他們多数是半农半商，有的半工半商，熟悉每村每戶的情况；他們的經營往往是

連购带銷，把分散的小土产、副产品和廢旧物品集中起来，同时把农民需要的零星日用品送到家家户户，实际上負担着农村商品流轉中的一部分收购、分配和短距离运输的任务。还有许多飲食、服务业的小商小販，供应面食、点心和为居民理发、修补、收购廢品等。在一定的时期以内，小商小販这种經營服务形式在城乡商品流轉和滿足居民需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不能完全代替的。

小商小販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他们不仅是劳动者，同时又是商品流通中的小私有者。他们同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場的联系极为密切，具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多少年来，他们都是圍繞在资本主义批发商的周圍，深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識的影响，带有經營上的投机性和盲目性。他们需要資金设备不多，經營灵活，开歇业方便的特点，也助长了这种投机性和盲目性。他们的这一面同社会主义的計划經濟有矛盾，經常成为冲击市場、破坏国家計划和价格政策的一种力量。所以，对于小商小販必須加强領導、教育和改造，使他們抛弃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才能發揮他們的經營特点，使他們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逐步地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組成部分，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商业的补充。

对小商小販的整頓与安排 由于小商小販需要資金少，面广分散，开歇业容易，在社会經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城乡沒落阶级分子必然会不断地流入小商小販队伍，使小商小販的成員变得非常复杂。这是在对小商小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經常会遇到的一个問題。

小商小販的数量，1952年以后是減少的。但在許多城市中，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仍有所增加；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

的一段时期中,也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新的小商小贩出现。上海市从解放到1955年,摊贩增加了七万八千多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的1956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沈阳、西安、济南、青岛、成都、哈尔滨、贵阳、无锡、苏州、郑州等十六个大、中城市中出现了无证商贩(自发户)十六万多户。据沈阳、天津、武汉、郑州、哈尔滨五市的统计,摊贩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占80.3%,小业主出身占3.8%,资本家占5.2%,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占8.8%,其他占1.9%。

针对这一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必须对小商小贩经常进行清理整顿。纯洁他们的队伍,并加强行政管理,把管理和改造结合起来。这不只是为了限制小商小贩的盲目发展,为稳定市场和物价、保证供应所必需的,也是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所必需的。

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地就对小商小贩进行了许多清理整顿工作,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和社会力量,打击投机,进行登记,清除潜藏在小商小贩中的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取缔和安排无证摊贩。结合清理整顿,还指导摊贩组织摊贩联合会,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进入计划建设时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各地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和教育工作,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对无证小贩,凡生活有出路者可动员他们停业,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动员他们回乡生产,对有劳动条件的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地痞流氓等坏分子不接受管理者,则依法办理。在清理整顿中,对他们加强爱国守法教育,发动群众监督,揭发投机违法行为,并促使他们改善经营管理,实行明码实价,公平交易。

同时,小商小贩由于资金微小,在经营方面也有很大困难,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安排,维持他们的生活和营业,发挥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地就根据“统

“兼顧、全面安排”的方针，适应当地市場和小商小販的实际情况，划分了市場、营业地点和經營范围，使得大部分小商小販基本上維持下来。1953年以后，随着国家經濟建設的进展，和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統购統銷的实行，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发展很快，曾使小商小販部分地被代替。国家立即对小商小販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組織貨源、开展批发业务、降低批发起点，实行經銷、代銷等办法，使小商小販能維持經營。

1950—1955年全国小商小販基本情况

	单位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小商小販戶数	万戶	369	414	387	375	293	280
从业人数	万人	541	613	548	498	382	330
其中：攤販戶数	万戶	197	206	218	237	188	—
从业人数	万人	216	232	243	263	206	—

上表中1950—1954年的小商小販数字是从私营商业总数中减去雇傭职工二人及二人以上的座商及行商得来的。

小商小販的社会主义改造 小商小販是一种私有制經濟，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着矛盾，国家对他們必須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同时对小商小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由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步改造，小商小販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联系逐步被割断，他們原来所依存的基础逐渐消失，这就必然会大大促进小商小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小商小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和资本主义商业是不相同的。资本主义商业是一种剝削經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国家只能用沒收(对官僚資本)或者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民族資本)的办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入企业，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小商小販是劳动人民，他們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

組織起来，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經濟。根据这种情况，我国对小商小販的改造，除少数根据国家需要直接吸收为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的工作人員，以及一部分座商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是根据自願原則，在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商业的领导下，按照他們不同行业的情况，分別地用不同的合作化形式把他們組織起来，逐步把他們改造成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組成部分。

市場上的購銷活动是彼此联系的。小商小販在性質上虽与资本主义商业不同，在經營上则是与资本主义商业在一个市場之內活动。因此，不能把对小商小販的改造与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截然划开(特別是在城市)，而是同资本主义商业一起按行业或按商品来进行改造。根据我国經驗，按行业改造是改造私营商业的最好形式。在我国改造私商的實踐中，按行业实行經銷、代銷时，也包括小商小販在內。所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前，經銷、代銷也是改造小商小販的主要形式。不过由于他們所經營的有許多是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不掌握的零星产品，經銷、代銷的比重比资本主义商业小。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經銷、代銷仍然是改造小商小販的重要形式。截至1956年6月份，在全国二百四十多万小商小販中，为国营商业和供銷合作社代购、代銷的約占60%左右。

小商小販是分散經營的。为了對他們实行有計劃的經銷、代銷，把他們置于社会主义經濟直接領導之下，必需把他們組織起来。小商小販組織起来以后，也便于對他們进行整頓管理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便于貫徹國家的价格、稅收政策和市場管理。从小商小販本身來說，組織起来以后，可以逐步取得消費者更多的信任，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改善經營管理，培养集体主义思想，改善

劳动和生活条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組織小商小販的形式，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前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城市中基本上不外乎統一計算盈虧的联購联銷和各負盈虧的联購分銷两种类型；飲食、服务和帶有修理、技术性的小商小販，也有些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組。在农村，則有經銷小組、代購代銷小組、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等形式。

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就成了对城乡小商小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过渡形式。到1956年底，商业及飲食业小商小販組織成合作小組的有一百一十五万户，占总戶数的46%，組織成合作商店的有八十万戶，占总戶数的32%。

合作小組是由同一行业和业务相近的一些經營額小、业务零星分散的小商小販在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领导下自願組織起来的。它的成員統一向社会主义商业承攬业务、統一組織貨源，但分散經營、各負盈虧。組成合作小組后，在承接經銷代銷任务、進貨進料上可以实行小組互助，并提取一定的公共福利基金。組成小組后，也有利于国家对他們进行管理与教育。

合作小組基本上沒有改变各个商业劳动者的个体經營，他們仍然各自占有資金，但是，它已經有了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是帶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个体小商小販的互助組織。同时，他們这种个体經營，也同私有制社会中的个体經營有很大不同。由于社会上已不存在资本主义經濟，小商品生产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小商小販的經營主要是依附于社会主义經濟的。尤其是为国营商业經銷代銷的合作小組，他們不但在貨源上要依賴于社会主义經濟，并且在价格和銷售方式上也要服从国家的規定。他們的收入主要是批零差价或手續費，是由国营商业根据他們的經營情况、

生活情况核定的。

合作小组，由于适合于小商业接近消费者，灵活便利的特点，在一个时期内比合作商店更为普遍。

合作商店是由有一定经营能力、一定资金，同行业或业务相近的几户或几十户小商小贩根据社会需要在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领导下，自愿组织起来的。它开始改变个体经营为集体经营，资金投入，不但在组织货源方面已经统一起来，在商品销售方面也统一起来了，并且统一计算盈亏，有了集体财产（公共积累）。合作商店的业务一般是为国营或供销合作社商业经销、代销。

在合作商店中，成员的资财已归商店集体使用，实行统一核算，共负盈亏，但是，它还保留着股金分红或股金计息，即承认股金的个人所有权。因此，它是小商小贩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不过，由于小商小贩的资金本来不多，特别是它的业务主要是为国营经济代销，因此在整个运用资金中，股金往往占较小的比重。根据广东新会县双水区油杂合作商店、古井区陶山合作商店，山东益都东站第一合作食堂及四川江油永平合作商店等四个合作商店的典型调查，1956年自有资金四千五百九十六元，其中股金八百六十五元，占18.8%，全年销货成本四万一千四百六十三元，为股金的四十七倍。这就是说，在合作商店中，私有财产部分往往居于不重要地位，而公共积累则增加较快。

合作商店中，小商小贩的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单干时那样把劳动投入各自独立经营的经济中去，而是投入在集体经营的经济中，有了合理分工和协作。这就减少了劳动的私人性质，增加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可以逐步培养集体主义的劳动精神。合作商店实行民主管理，逐步改进劳动条件。小商小贩之间的关系，也由过去同行竞争基本上改变为互助合作关系。

合作商店一般都实行了工资制度。合作商店的工资形式有固定工资、固定工资加奖励、死分活值、计件工资及分成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还提劳动返还金。总之，它已具有了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性质。合作商店的收入除流通费用和工资外，还提公积金和公益金。公益金用于集体福利。公积金，一般由国营商业掌握，经批准后用于弥补亏损和企业的扩大经营。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我国工农业生产上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存在着城乡家庭副业生产和若干个体手工业生产。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这种集体商业形式，是和这阶段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上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也是和当时群众消费的需要、小商小贩的思想觉悟水平相适应的。作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补充，这种集体商业形式将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

第七章

对资产阶级分子政治思想 的根本改造

第一节 所有制变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优势的强大发展 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经过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个体经济已经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切生产和流通领域内全面建立起来,成为无所不包的经济体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决定性地战胜了资本主义。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从此基本结束,中国人民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复杂的历史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了,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也大大提高,它在国家政权和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了。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人民都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作为农村中资本主义主要力量的富农阶级也被消灭。这不但基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发展的道路,而且工农联盟从此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基础,更加坚强和巩固了。由于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的壮大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也进一步巩固了。

1953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1956年，在工农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条件下，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指标，在四年的时间内就提前完成了。

这一切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都有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情况 而民族资产阶级呢？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就失去了对抗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的剥削已被限制在固定的数量和一定的时间内。他们已经丧失了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权、财产权和人事调配权，而以一个普通职员的身分，在公方代表直接领导之下工作。在整个社会上，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已处在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且也处在社会主义包围之中，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市場已经显著地缩小了。

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对接受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虽表现了重大的进步，但是社会飞速发展了，已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跃进了一大步，而他们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立场与思想意识却还不可能立即改变。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已经基本上代替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具有积极作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也就成为反动的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思想状况，就必然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的抵触。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这种矛盾，就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后，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性一面的集中表现。

当然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资产阶级分子来说，并不都是一致的。多年以来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下，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面貌已不断发生变化，特别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之后，更迫使资产阶级分子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明确地作出抉择，使他们中间的政治分野重新改组。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成为左派，即在政治上已经基本上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则成为右派，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中间最多的一部分人，则是中间分子。中间分子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场上具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另一方面，又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或者不完全心服，而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从他们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一面来说，他们已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长途上跨出了第一步，有可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接受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资本主义立场一面来说，他们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处于一种动摇抵触的状态。因此，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半心半意的中间状态。

资产阶级中的阶级分化也深刻地从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反映出来。由于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许多资本家的青年子女表示不愿意接受父兄的剥削财产，要站在社会主义一边。长期过着寄生的家庭生活的资本家家属，有一部分人也表示要走出家门，参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接受了生产资料的社会

主义化,基本上丧失了剥削工人群众劳动的条件。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不但有它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还有它的政治立场、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过,人的社会实践,最基本的是生产活动,它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但是人的认识的来源不止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①。这说明了阶级性的形成,不仅在经济上即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有其根源,这是基本的根源,而且还在与经济基础密切联系的上层建筑中,在政治和思想的活动与斗争中有其根源。同时,思想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会随着旧的基础的消灭而立即消灭。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的部分,对于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的部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反动的国家机器,人们可以用打碎的办法予以消灭,而对反动的思想意识,却不能用打碎的办法,而必须用长期改造的办法,才能使之归于消灭。所以一个阶级经济地位的丧失,它在经济上存在的条件的基本丧失,虽然对这个阶级的消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已经消灭了。前面讲过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中间派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同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程度的对立就是极好的证明。有些人机械地搬弄阶级区别是根源于对生产资料占有或者不占有的不同关系的原理,来否定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还存在的事实。这是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272页。

一种机械唯物論的观点，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总之，资产阶级經濟地位和政治状况的变化，說明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资产阶级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已經极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正处在一个由剝削者逐步向劳动者轉化的过程中，但是仍然作为一个剝削阶级而存在。

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著作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我国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經濟上誰战胜誰的問題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历史正处在一个新的轉折时期。为了解决如何繼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問題，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之間的矛盾，把一切积极因素調动起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1957年2月，毛澤东同志在最高国务會議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

在这个偉大的著作中，毛澤东同志坚持彻底的唯物辯証法，以极大的理論上的勇敢和創造精神，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他指出在我国国家統一和人民团結的社会中，还有两类性質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之間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們社会向前发展。

毛澤东同志对两类性質不同的社会矛盾的处理方法，作出了新的概括。他指出：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即团結——批評——团結的办法。

毛澤东同志在报告中，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綱，对我国当时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一系列重要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作了方針性的指示。这个报告实质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的一个政治綱領。它对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澤东同志在报告中从理論上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質問題。他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但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样，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就不同于敌我矛盾，当然也不同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間的矛盾。毛澤东同志說：“人民内部矛盾，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間說来，除了对抗性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和国家就必然力求用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毛澤东同志在报告中总结了党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經驗。他說：“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評——团结’这个方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件事所以做得如此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

毛澤东同志还論証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可能轉化。他說：“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們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評、教

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从理论上提出了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经济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还必须进行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斗争。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强调了对资产阶级分子必须进行长期的政治思想改造。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性质的深刻分析，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深刻分析，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如何处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会正确认识并且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就能逐步地彻底地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完成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

矛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突出出来。这时候，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公开提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还是非對抗性的”問題，要求学术界予以解答。这一問題的提出，反映了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否認资产阶级仍然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和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願望。学术界对这个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在毛澤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以前，各方面的論点頗不一致。有人認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是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阶级利益不可調和，因此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并且这种對抗性质是“貫徹始終”的。和平改造，在他們看来，也是對抗性矛盾的一种斗争形式，或者只是對抗斗争的一种“补充”；他們認为同一性质的矛盾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非對抗的方法解决。有人認为，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质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由于资本家失去了對抗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这个矛盾已經轉变为非對抗性的矛盾了。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則是一致的，前者决定后者。有人認为，在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對抗的，“局部的反抗”是一种“补充”。也有人認为，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具有两重性，有對抗性的矛盾，又有非對抗性的矛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也参加了这个討論。許多人的論点都是和社会主义高潮后资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定息的性质等問題一起論述的。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发表后，澄清了这些思想論点上的分歧。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間意識形态的斗争 根据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状况和毛澤东同志精辟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我国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結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間的斗争，仍然是我們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間，即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限

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种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只有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放弃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意识，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这个阶级才能消灭。只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也最后消灭，工人阶级才能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战胜资产阶级，最后地结束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我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然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而且两者可以转化，因此，它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这一方面告诫了资产阶级分子，如果他们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不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就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提醒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这种情况的实现，有待于主观的努力，有赖于对矛盾的正确处理。

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工人阶级必须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继续深入开展意识形态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方面要坚持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他们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如果错误地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那么，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顺利地实现，而且矛盾也会转化成为敌我矛盾，引起极其激烈的阶级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能错误地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看作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保持警惕，当阶级斗争尖锐化起来的时候，必须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只有

这样，才能把敌我矛盾限制在少量的范围之内，把动摇的资产阶级分子分化和争取过来，使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致大量地向敌我矛盾转化。

有些人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对抗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根本变化，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就能遏止阶级斗争，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会熄灭。我国资产阶级还有财产，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有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同国内外反动派还有联系，而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又远未完成。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社会基础。只要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不管革命力量的优势发展到何种程度，剥削阶级不经过阶级斗争，总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困兽犹斗”。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必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利用国内外的种种条件，伺机向社会主义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就是对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来说，工人阶级对于他们意识形态的改造，虽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进行处理，但是，这种改造仍然是属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同时，这种改造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不能不引起他们不同程度的抗拒。不经过一定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也是不能完成的。因之，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十分有害的。它实质上是保护资产阶级，削弱人民革命斗争的意志，使人民丧失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导致社会革命的不彻底性。它使资产阶级分子以原来的政治思想面貌混杂在劳动人民的队伍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来为非作歹；

使人民在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却处于束手无策的地步。

第二节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和工商界的整风运动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一切可用的力量来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夏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在承认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繁荣科学艺术事业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1957年春天,在国内政治生活上,提出了区别两类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有系统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加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在全党进行整风,并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对于各项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国际方面,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巩固和团结,世界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也不断壮大。帝国主义者不甘心于这种情况。1956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侵略势力,连续掀起了几次反苏反共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帝国主义者煽动和支持了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英国和法国发动了对埃及的武装侵略。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和支持的现代修正主义,以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为主要代表,也趁机抬头,破坏国际工人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作为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之一。

这一系列的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在政治上具有动摇

性的資產階級不能不是严重的考驗。

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在我國社会主义革命中，資產階級包括它們的知識分子是同工人階級較量的主要社会力量。他們參加了人民政權，有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又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而工人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交出了生產資料，但是他們中許多人是不甘心的，在政治上、思想上更是不甘屈服。資產階級中的右派總想向共產黨和社会主义進攻。但是要等待“時機”。1956年下半年，帝國主義者掀起的反共高潮和隨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鼓勵了右派的政治野心。他們認為黨提出百家爭鳴、長期共存的方針，宣傳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黨的整風運動是他們的“時機”，便趁機大肆進行陰謀活動，發動了向黨和社会主义的猖狂進攻。

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步驟的。他們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活動之後，還要進一步到工廠、農村、企業中去煽風點火，企圖煽動群眾鬧事。

資產階級右派在向黨進攻時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動綱領，其實質就是反對社会主义，反對黨的領導。歸納起來，他們和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主要表現在下面幾點：（一）宣揚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制度和資產階級文化，反對社会主义的經濟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二）反對國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統購統銷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五大運動等。（三）否認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設的成績，否認共產黨和工人階級能夠領導國家建設。（四）反對共產黨對國家工作的領導，反對黨在各個部門（特別是文教科、技術部門）的領導。要求取消黨在若干基層單位的領導。

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實質 資產階級右派假裝不反對社会主

义，实际上集中全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成什么共产主义。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就要产生宗派主义。这是极大的谎言和诬蔑。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最彻底的革命。它不仅要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来代替资本家的所有制和各种小私有者的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而且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组全部社会生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文化，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充分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条件。为了顺利地进行这些工作，就必须对于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中的任何复辟阴谋实行镇压，同时，又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教育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事情很明显，要完成这样复杂而又严重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对于国家政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才能办到。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自私、最能为全人类利益而坚持奋斗的阶级。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清除党内和人民中的各种宗派主义情绪。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则只能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谋一己的私利，从而导致无穷无尽的派系倾轧和激烈复杂的阶级冲突。因此，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所企求的不是真正清除什么宗派主义，而是要把共产党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把中国回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任帝国主义宰割。

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

义发动进攻。他們說，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遵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就是教条主义。这也是极端錯誤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不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民，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右派分子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其实就是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而是想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們国家生活，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他們的知識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反对肃清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以便资本主义复辟。

工商界的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企业和計劃經濟，否定它們的优越性，要求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反对向工人阶级学习，說定息不是剝削。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貪得无厌的丑恶本质在作祟，对于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甘心的露骨表现。明明白白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而他們却說沒有两面性，已經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不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这难道不是抗拒政治思想改造，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复辟打掩护嗎？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为了帮助人們区别香花和毒草，即判断人們言論和行动的是非，提出了六項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团结。^①这不但

是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团结的政治基础，而且是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政治立场的准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与六项政治标准是完全违背的。这说明他们完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毒草。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他们同人民之间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从工商界来说，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代表着一条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他们同工人阶级争夺对中间派的领导权，以引导民族资产阶级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政治思想改造。人数甚多的中间分子，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这一面是通向右派的，这就使他们成为右派争取和笼络的对象。他们在右派分子蒙蔽和煽惑之下，政治态度曾经发生显著的右倾。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右派分子看成是自己的“知心者”和“代言人”，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寄予同情和支持，少数人甚至充当了右派的同盟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从政治思想上说来，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还摆着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或者是跟着资产阶级右派走，被资产阶级右派带到反革命的绝路上去；或者是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走，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获得光明的前途。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立场，很自然地引导他们走前面一条路。要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要扭转资产阶级中间派的错误倾向，就必然要经过一场严肃的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场不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0页。

可避免的斗争早有预见。在党的整风运动之初，就向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进行告诫。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的时候，就指出了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并且宣布一切毒草都必须锄掉。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利令智昏，仍然要发动进攻。党中央对他们的进攻表现了极其伟大的政治气魄，采取了极其高明的斗争策略。党坚决相信大多数人民群众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相信人民群众有识别毒草和锄掉毒草的能力，因此坚决采取放手让右派大鸣大放的方针。

资产阶级右派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广大工人、农民无比的愤怒。六月初，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纷纷集会，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卑鄙手段，痛予驳斥。全国人民，在工农劳动人民的带动之下，积极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迅速形成了群众革命运动的浪潮。党积极领导了这个斗争。在斗争中，党采取了群众路线的方法，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他们是战斗的主力。同时，也相信工商界和知识界的多数，向他们进行了细致的团结和争取工作，放手发动他们向资产阶级右派展开斗争。

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大会严正地系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表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这次大会，大大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至此身陷广大群众的重围之中，受到了举国一致的痛击。

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的敌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有

必要对他们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严厉地给以打击。中国人民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向右派分子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把他们斗倒斗臭，使他们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这样作，有利于通过群众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使他们的反动面貌完全暴露，在人民群众中彻底地孤立起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帮助人民群众划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界限，还有利于教育和争取资产阶级中间派，帮助他们分清敌我，清除右派分子对他们的影响，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反右派斗争主要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但在各个战线上一齐发动，成为具有全国规模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斗争的结局注定了右派是要失败的。因为我国有着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全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信。而右派在全国人民中只占极少数。经过几个月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在全国人民正义的回击之下，遭到了彻底的粉碎。

右派分子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但由于人民的国家很巩固，对右派分子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斗透，在他们已低头认罪之后，处理上则采取从宽的原则，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进行处理，以便继续分化和改造他们。我们知道，右派分子中有一些人会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只要注意促进右派分子的分化，帮助其中有悔改表现的人逐步改造，大部分右派分子是可能改造的，可能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

右派分子在资产阶级中也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十左右。上海市参加整风运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人中，有右派分子二千一百九十五人，约占参加整风人数的5%左右。党和国家对

于右派分子，除屡教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者，必须绳之以法外，一般对右派分子不予办罪。一般称为右派分子，不叫反动派、反革命派。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并给以工作和劳动的机会，对他们的头面人物还在政治上作适当安排。根据1959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上和行动上表现出确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这些人还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今后不再当右派分子看待。这以后，就陆续有些右派分子，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审查，摘掉了帽子。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了道路。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逐步发展为全民整风运动。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一种政治局面。

1958年8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市以上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工商界、大专学校、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反右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逐步转入整风。工人农民、中小学校教职员和军队等方面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逐步展开。

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整风是全民整风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时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少的人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格格不入。只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人才会逐渐下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也是如此，当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彻底

粉碎之后，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才逐渐清醒过来。这时的任务，就是要教育他们，只有抛弃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坚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在政治上同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他们的知识技能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在反右派斗争结束之后，就立即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开展了一个以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主要是系统的批判他们的错误立场，教育他们同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教育他们懂得必须克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三心二意的两面性，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各民主党派则还要求他们彻底粉碎右派领导成分，树立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争取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六项标准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虽然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但由于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另一方面，这种人民内部的整风，与工人阶级内部的整风，则又是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他们的整风，是整顿作风。而资产阶级则与劳动人民之间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处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实质，是通过整风，教育他们改造政治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资产阶级分子的整风，也是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资产阶级内部，严肃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在1957年冬季以后，资产阶级分子的整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在各地先后开展起来。在实践过程中，工商界创造了适合他们自己的形式。天津市工商界首先使用了“交心”的形式，随即在全国各地推广起来，整风实际上就成为以“交心”为中心内容的运动。

工商界的“交心”运动，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自我检查。然后集中为若干有重要原则意义的问题，展开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澄清错误思想，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立场与资本主义立场的界限，以利于逐步改造自己的资本主义立场。

经过反右派斗争，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再加以这时全国工农劳动群众的干劲冲天，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开始形成，这种逼人形势，给资产阶级分子的交心运动以有力的推动。许多人在自我批评中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态度，许多地方还召开了自我改造的誓师大会，并且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了互相检查评比。运动末期，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制订了以结合劳动锻炼、继续改造政治立场为中心内容的自我改造规划。他们许多人并表示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在工作 and 劳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至1958年秋天，资产阶级分子的整风运动就胜利地结束。

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意义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工人阶级经过革命斗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在消灭剥削阶级的同时，全面地加以巩固。不仅必须在经

济方面加以巩固,而且必須从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加以巩固,使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革命的实践,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須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就是我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这一场斗争,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这一场斗争,中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影响,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秩序大大地巩固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地加强了。同时,整风运动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了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因此全民整风运动的高潮,又进一步推动了全民生产建设的高潮,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的局面。

1957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他们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历了这场尖锐而深刻的阶级斗争,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取得了“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当不得”的重大教训。使他们很多人从不同程度地附和右派转到不同程度地向着社会主义,不同程度地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许多人也不能不承认自己还有两面性,不能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情况就说明了,资产阶级分子中的许多人已由资本主义立场向社会主义立场前进了一大步。经过这场斗争,各

民主党派也端正了政治路线，整顿了组织，改造了领导成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第三节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

如前所说，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重要的进步，这就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左派分子有了扩大，也有了提高；中间派的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进步。资产阶级右派在孤立的情况下开始分化。但是，还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在同党的关系上，还有距离，厌倦改造的情绪也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处在一种半心半意的中间状态。这些都说明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人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他们的政治两面性也仍然存在。就是前面所说的进步也是不平衡、不巩固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不是通过一次整风运动就可以解决的。工人阶级还必须对他们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

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的方针 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必须经过两个主要的途径，一个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一个是政治思想教育。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其中尤以实践处于主导地位。人类的实践包括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人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感情和习惯。资产阶级分子过去经历了长时间的资本主义的实践，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

点和习惯是根深蒂固的。现在要改造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习惯，逐步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习惯，当然也必须经过长期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但是实践又必须同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并且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也就是政治挂帅。只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才能克服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提高觉悟和认识，端正政治方向，使实践既能取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效果，又能取得改造政治思想的良好效果。

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之后，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部分，都已安排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还有一些人是安排在国营企业或政府机关中工作），他们客观上已经是在工人阶级直接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在这种条件下，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就确定了以企业和工作岗位为基地，并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与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结合起来的方针。但是，当时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政治立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还十分突出，资产阶级右派的气焰还十分嚣张，在私有制的巨大变革之后，大多数人还处于惶惑顾虑、依昔恋旧的心情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也表明，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他们资本主义的一面给以严重的批判和打击，破他们资本主义的一面，才能引导他们走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上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斗争。经过这一场斗争，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这时就有了可能，把资产阶级分子在整风运动中所培育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来，着重从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从立社会主义一面中，破除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培养他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性。

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

主义建设的理论，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在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比较迅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同时，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这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面红旗。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把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1958年党和政府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中采取了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劳动和工作实践为基础，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的方针，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进行政治思想改造。

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归根到底，是要通过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本性的自我否定来完成的。这样，发挥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觉性，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自觉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才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逐步培育起来。上述方针的提出，就是要通过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劳动和工作的实践，逐步培

养和发挥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的自觉性，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自我改造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外因与内因相互促进的辩证作用。

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首先是全面发动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工作实践中，鼓励和推动他们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特长，帮助他们作出成绩。资产阶级分子的资本主义立场、思想和作风，必然会经常地通过业务活动和工作实践反映出来。结合工作实践，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适当引导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逐步培养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就能够使他们通过现实的教育，逐步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

在资产阶级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践的过程中，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一定的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也是从根本上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项重要措施。组织他们参加这种体力劳动的锻炼，同工农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从事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创造，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农群众的影响下，逐步地树立劳动观点和习惯，培养与提高劳动技能，逐步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是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各种政治运动，适当参加社会活动和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不但能扩大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生活观察和体验的视野，更多地获得来自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教益，而且也能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并把他们的爱国主义逐步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当然处于被斗争的

地位,但是资产阶级分子作为个人,只要积极站到阶级斗争的革命方面来,并努力改造自己,就可以在斗争的锻炼中,由被动转为主动,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

第三,加强组织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通过学习使他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规律,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跟上时代的步伐,增强改造的信心。并使他们逐步获得一种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以指导自己的实践。

在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学习上,一方面要组织他们同职工和公方干部一起学习,以便结合企业的工作实践,在公方干部和职工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经常的政治理论学习。一方面举办讲习班和政治学校,进行定期的学习,使他们获得比较系统的政治、政策和理论知识。在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学习政治理论的时候,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思想。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为了加强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于1956年3月27日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许多地区根据这个决定,举办了短期讲习班,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理论的启蒙教育。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之后,各地继续举办了更为正规的社会主义学院(或政治学校),进一步推动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据1961年10月统计,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二十五所。据十八个省、自治区不完全的统计,这些地区所属市、专区、盟、县有政治学校三百四十六所;还有许多地区开办了工商讲习班。在这些学习机构中,参加学习的人数共十五万二千三百多人,比1950年增加了

115%。以上这些学习机构,都是組織资产阶级分子离职进行学习。业余学习发展更快,仅据中央及十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組織的业余学习和十四个省、自治区的一部分县、市有关方面組織的业余学习的不完全的統計,經常参加业余学习的共二十三万多人,比1960年增加565%。

在国民經济大跃进中民族资产阶级进步 在1958年和1959年国民經济大跃进中,由于上述方針的貫徹执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新的高潮的形势之下,在党的領導之下,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下車間、上柜台、上山下乡、支援工农业生产等体力劳动。同时,在企业党組織的领导下,許多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增产节约运动,参加了领导干部、职工群众和技术人員的“三結合”,以更好地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运动。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些运动中一般是积极的,在生产劳动、革新技术和改善經營管理方面贡献了一定的力量。有一部分人还作出了較好的成績,成为先进生产者 and 先进工作者,或受到表揚。

据上海市統計,资产阶级分子1958年6月下乡支援夏收夏种的有一万人,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十万个以上的劳动日。10月,下乡支援秋收秋种的有二万人。此外,还有很多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炼鋼、筑路、运输和市政建設方面的义务劳动。在企业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中,资产阶级分子在企业参加劳动的人数更多。

1959年冬天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社会主义建設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有六十二位工商界特邀代表参加。

在这个时候,还进行了对资本家家属的改造,并引导她們参加到国民經济大跃进的运动中来。资本家家属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她們靠剝削吃飯,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但是,她們在社会生产中沒有地位,在家庭中也沒有地位。所以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家

属的改造，有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帮助她们解放，使她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和男子平等的地位；一方面要对她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她们改造成劳动者。资本家家属只有改造，才能解放；只有脱离了剥削者的地位，才能真正脱离附属物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的解放，必须以一切女性重行参加社会劳动为头一个先决条件。”^①

改造资本家家属，对于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对于资本家子女的教育也具有重要作用。党和政府一直是重视对资本家家属的工作的，通过工商界组织、妇女组织和街道居民组织，经常对她们进行教育，1956年还专门召开了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代表会议。在国民经济大跃进中，更着重通过吸引她们参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和工作，逐步对她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资本家家属参加了街道工作，参加了社会福利事业，参加了劳动生产。她们之中，也出现了一批先进生产者 and 积极分子。

经过这两年生产劳动和工作的实践，经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各种形式的学习，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对于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对于共产党，在思想和感情上比以前又有所靠拢，他们对于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也比以前增多了。特别是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走上了生产的和服务的劳动岗位，在从剥削者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道路上走上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些都说明了他们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一定的积极态度，也说明了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发展和高涨的浪潮中，大多数人无论是比较自觉或者比较勉强，总是跟着走过来了。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231页。

从政治分化的情况来看：资产阶级分子在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转变过程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即比以往较多的人，已经基本上转到社会主义立场，其中有些人比较稳定，有些人还有一定的动摇性。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比前一部分要多的人，转到半社会主义立场。他们还带着相当大的动摇性，但是也能摇摇摆摆地向前进步。一小部分人还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立场。他们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要是思想落后，经过教育和帮助，慢慢地可以进步；另一部分人，占极少数，是思想反动。他们新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分化。此外，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又经过教育帮助，也在继续分化中，其中大多数有可能逐步改造过来。

总的来说，这两年来，资产阶级分子（包括他们的家属）是大有进步的。但是，说资产阶级分子大有进步，并不是说他们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他们在政治立场的改造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事实上，他们的两面性仍然存在，在政治立场改造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很多人的身上更是很少改变。因此，对于他们的根本改造，还要继续进行。

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一般说来，有如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改造政治立场，使他们的政治立场符合六项政治标准；一方面，放弃剥削，使他们做到完全自食其力。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资产阶级分子就基本上完成了向劳动人民的转化。因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首先和主要的目标就是帮助他们达到上述两个条件，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改造来说，立场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政治立场对于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思想认识或思想方法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立场。要求资产阶级分子学习工人阶级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就

可以帮助他们改造政治立场。所以思想认识或者思想方法的改造，不应当和立场改造互相对立，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使它们互相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只有继续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才能对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进行有效的改造，也只有加强改造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才能促进立场的转变，并把它巩固起来。

党和国家为了推动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1960年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始采取了“神仙会”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便于他们敞开心扉，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在不断提高自觉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认识。

“神仙会”中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许多争论。这些观点的争论，实质上是反映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因此，“神仙会”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过它是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通过资产阶级内部自己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批判，逐渐引导他们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作的好处是，工人阶级对他们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讨论和争辩，能够更好地消化，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更能比较自觉地接受改造。所以这种方法，不但是劳动人民内部说服教育的民主方法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发展，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发展。

所谓“神仙会”，这是一个形象的生动的比喻。1960年初，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之下，采用了这个方式。从1960年以来，在党的推动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在学习与改造中，分别采用了“神仙会”的

方式,到1961年5月止,全国有将近百万人参加。这对于调动广大社会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进行自我改造,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推动资产阶级分子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需要照顾资产阶级分子的合理利益。1960年,党和国家对资产阶级宣布了继续贯彻执行赎买政策,对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生活上和工作机会上照顾到底、包到底。1962年并宣布,从1963年起,定息暂定延长三年,到时再议。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稳定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消除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许多顾虑,使他们生活习惯的改造有一个逐步的准备过程。这对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和积极接受改造,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有益的。党和国家在继续照顾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合理利益的时候,并要求资产阶级分子一心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国家“包一头”,资产阶级分子要“顾一头”,“一边倒”。这就是教育他们要一心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把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下。教育他们要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不要继续坚持资本主义,或者停止那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摇摇摆摆、三心二意的状态。一面继续参加工作和劳动实践,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面努力参加社会斗争的实践,努力参加政治学习,继续改造自己。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消灭资产阶级、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工人阶级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斗争。长期、复杂、反复,这就是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

为什么是长期的呢?第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政治立场、思

想意識、思想方法和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都是屬於他們階級本性的東西，是他們長期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養成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他們這些階級本性的東西，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逐步地破除，不可能一下子改變，這就必須有長期的鬥爭過程。並且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都具有自身的繼承性。資產階級總是沿用有利於自己的過去剝削階級的社会意識為自己服務的。我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中更是大量地存在着封建糟粕。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和先前各個階級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有本質的差別。無產階級對於歷史遺產必須給以批判的總結，繼承其有益的思想材料，而對於剝削階級的唯心主義的觀點、方法則必須堅決打破。因此，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根本改造，實際上也包括反對幾千年來舊的社會意識形態的鬥爭。這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二，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是經過他們思想認識的逐步轉變而達到的。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而認識又往往落後於實踐。這是因為，作為新的意識的反映的社會存在出現後，往往需要一個時間和觀察過程才能在意識中得到正確反映；更是因為，社會意識本身具有保守性，而剝削階級本身又最具有這種強烈的保守性。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有待於他們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工作和勞動的實踐，長期的社會改革和階級鬥爭的實踐。他們在實踐中獲得的一些概念、觀點和方法，又要經過不斷地再實踐的証實，經過新的實踐的考驗，才能逐步鞏固起來，變成自己的東西。而要求資產階級分子站住社會主義立場和養成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作風，就更需要長期的勞動和生活實踐，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才能逐步辦到。

第三，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是作為消滅整個資產階級的事業

而提出的；这个阶级的消灭，又是经过它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地分化，一部分一部分人逐渐转变立场、建立新的观点和思想方法而实现的。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个人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不同，特别是个人的主观努力不同，在很长的时间内，资产阶级分子思想进步所能达到的水平不可能是一致的。有些人进步得快一些、多一些，有些人进步得慢一些、少一些，也有少数人长时间停滞不前，甚至根本没有进步。这就需要区别不同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教育和改造工作，特别是争取动摇的中间阶层向进步方面靠拢。因此，要把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改造成劳动者，是非经过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不可的。

第四，无产阶级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要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肃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自发势力。这就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进行更多的阶级斗争。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但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一切旧制度，而且要彻底消灭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由这种旧制度所产生、为这种旧制度服务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说，要在人们的心理上最后地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一切残余，这是比在经济上消灭剥削阶级困难得多的任务，必须经过长期复杂的教育和斗争的过程才能解决。”^①

为什么是复杂的呢？首先，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既包含了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又包含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坚持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31页。

走资本主义道路，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反革命残余势力更是经常进行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都是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说来，除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外，在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代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企图把农民拉回资本主义老路，工人阶级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此外，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在无产阶级的内部也会发生阶级性质的矛盾和斗争。所有这些矛盾和斗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这就使得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呈现着极为复杂错综的局势。

第二，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的发展，也会触动和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帝国主义一面疯狂地加紧战争准备，一面又作出和平的假面孔来吸引认识不清的人。美帝国主义更是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同时千方百计地在中国大陆寻找它的同盟者。国际修正主义又配合帝国主义，以美丽的言词向立场不坚定的人进攻。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同国外资产阶级曾有种种交往，他们又是我国人民中最容易接受这种影响的一部分人。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和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必然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第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无论哪个部门、哪项工作、哪一条战线上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各个部门、各项工作、各个战线上的斗争又是相互影响的。在所有制的改造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

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互影响,城乡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其涉及的范围尤为广泛。这是因为,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其反映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而有政治、法权、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不仅受社会存在的决定和影响,而且受其它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是反右派斗争,乃至无产阶级内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在文学、艺术和理论战线上几次反对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也都在资产阶级中间引起动荡和发生影响。例如某些人所宣扬的超阶级的绝对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论点,都曾在资产阶级中间引起共鸣。这种情况,当然也会使阶级斗争复杂起来。

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还会表现为阶级斗争波浪起伏的形式。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① 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这样逐步展开、逐步解决的。在我国,由于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办法,这种矛盾斗争发展的辩证规律,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从全国解放以来,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从限制反限制的斗争,发展为改造所有制和反改造所有制的斗争,再发展为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斗争。不仅如此,在一个重大的斗争过程中,例如在变革所有制的斗争中,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矛盾集中的焦点也是不同的。这样,一些问题,经过严重的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又被提到日程上来,就可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能会出现另一个斗争的高潮。因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所呈现的图景，就不会是一条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①，这就构成了斗争的反复性。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积极的一面，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他们消极的一面，又总是拉着他们向资本主义倒退。因此，他们在改造中所表现的，不是顺利地接受，也不是一味抵抗。而是：在接受中有动摇、有抵抗，在动摇、抵抗中有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在另一个问题上动摇、抵抗。他们动摇、抵抗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也是不同的。如果在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接受教育，不太勉强地适应革命的发展，那末，阶级斗争就会大体上处于缓和的状态；如果这种动摇、抵抗加剧起来，阶级斗争就必然会跟着紧张起来；如果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不甘心本阶级的灭亡，要坚决起来反抗社会主义革命，那么，阶级斗争就会突出地紧张起来。这时，只有坚决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打倒和孤立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分子，教育和争取资产阶级的多数，革命才能顺利发展。而随着阶级敌人被迫退却、多数人趋向进步，阶级斗争又会重新趋向缓和。这就必然使得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呈现一起一伏的现象。

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就是要逐步走到自己的反面。接受社会主义是同他们的阶级本性完全相反的，不能不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被迫到自觉、由假到真的过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动摇、反复。要经过多少次的动摇和反复，不断地受到教育，他们才能走完由量变到质变、由不自觉地自觉的过程。

^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页。

总的说来,在政治和思想的领域内,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当然,无产阶级必然是愈斗愈强,资产阶级必然愈来愈削弱和趋于分化。阶级斗争总的趋势,不会是愈来愈紧张,而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它的发展不会是直线式的,而会是有紧张、有缓和,呈现波浪起伏的形式。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像波浪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① 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虽然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但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一天天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不断地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迅速提高。在这种兴无灭资的巨大优势下,我们相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了劳动人民的影响和监督,只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运用已经取得的经验,经过长期的教育工作,加以资产阶级分子自我改造的努力,是可以使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面日益增加,资本主义消极性的一面日益减少,并使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日益发展。他们中的左派将不断得到提高和扩大;他们中的中间分子会不断得到教育和改造,逐步向左转化;右派分子则会更加孤立,并产生分化。经过长期的分化过程,而最终地导致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人转化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① 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第八章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 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

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一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这个革命已經获得了輝煌的历史性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之后，立即沒收了資本主义經濟中占最重要地位和最大比重的部分，即壟断的官僚資本部分，把它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并随即利用不断增长的政治优势和經濟优势，对資本主义經濟的其余部分，即民族資本部分，进行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逐步廢除資本主义私有制，对民族資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逐步消灭資产阶级。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完成，資本主义經濟基本上消灭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資产阶级分子正处在逐步向劳动者轉化的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不断地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建設正蓬勃地向前迈进。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曾經作过精辟的提示，他們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

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俄国人民在馬克思的偉大繼承者和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首先实践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天才地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的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理。他曾經指出：“无产階級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階級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員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剝削制度的基础。”^② 在列宁思想的指导、布尔什維克党的領導之下，苏联人民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斗争任务。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偉大十月革命的繼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針的，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严格地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建立无产階級专政，在强大的无产階級专政下，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經济，建立社会主义經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消灭資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私有制；消灭資产階級，进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等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胜利，再一次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和普遍性。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又是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灵活地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来解决革命的各种問題的。用毛澤东同志著名的概括的說法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頁。

^②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頁。

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的一个光辉范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不断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逐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相互促进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他在1850年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① 列宁在谈到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② 并且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③ 革命是不间断的，但是，它是通过阶段性来进行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革命的不间断性就是各个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连续性，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革命的阶段性，就是不断革命过程中各个革命阶段的质的差别。这反映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由一个事物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4页。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1页。

③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到另一个事物的不断推移的过程。

毛澤东同志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统一的原理,解决中国革命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問題,同时又把这个原理当作一种普遍方法,創造性地运用于各个阶段的革命工作,有步驟地、不断地由一个过程推向另一个过程,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国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正是毛澤东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运用这种思想的一个范例。

在民主革命中,毛澤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經過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①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他告訴全国人民,要把民主革命的鋒芒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資本主义和生产資料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坚持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他告訴全国人民,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虽然还要领导全国人民彻底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但立即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方面,通过国家的力量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沒收官僚資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經濟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并使这种經濟在国民經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一方面,凭借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經濟力量,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它納入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經濟的领导 and 工人群众监督的軌道,为有系統地对它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創造条件。

^① 毛澤东:《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0頁。

在 1952 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条总路线的提出，鲜明地指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任务和方法，有力地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资产阶级观点，澄清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成为鼓舞全国人民阔步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号角。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们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肯定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是逐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资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左’的错误观点。”^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党和政府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步骤，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停顿地一步步前进，终于在 1956 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一方面使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突出起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又为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立场和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创造了物质前提。因此，党又提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

^① 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9 页。

义革命的任务，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能够进一步地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在1957年到1958年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中间彻底地孤立了，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端正了政治方向，政治思想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

由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随即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较迅速地由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在实践和思想教育的结合中进行的。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这对于国家有利，对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也有利。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是形成几个互相联结而又互相区别的阶段的。相对地说它们是属于量变性质的较小的发展阶段，而从一个较小的阶段发展到另一个较小的阶段，也是一种部分的较小质变。党和政府掌握这一规律，在改造中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方法，以适应生产关系逐步演变

和群众觉悟逐步提高的需要。如在所有制的改造中，是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引导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而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一般又是经过了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到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以至最高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等一系列的阶梯。每一种改造形式，代表一定的生产关系，适应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的要求；每种改造形式又不能长期停留下来，而必须不断地向更高的阶段过渡，直到所有制革命最后完成。同样，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党和政府也是适应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和群众运动，使它波浪式地前进和逐步深入。如1950年到1955年间，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到1958年又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五大运动帮助资产阶级分子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进一步划清中国人民与三大敌人的政治思想界限，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来说，无疑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则又在我国社会上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进一步帮助资产阶级分子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界限，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的改造更具有直接的深刻的意义。

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是结合着进行的。这不但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前发展，不断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才能使各种私有制经济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促使它们实现所有制改造。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改造高潮，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发展，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商品货源和销售市场，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而达到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又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逐步深入，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千百万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推动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的联系，利用这部分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同时，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与提高，逐步扩大了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替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发生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场所，从而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私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随即出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高涨。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大跃进。而国民经济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又要求进一步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调动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在实践中继续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根本改造。

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进行，充分发挥它们对立统一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获得了迅速的并且是顺利的健康的的发展，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

胜利。

二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党根据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卓越分析和关于两类矛盾的著名学说，创造了以处理敌我矛盾的原则来处理工人阶级同垄断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工人阶级同中小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一整套方法。

全面地、具体地分析阶级和阶级矛盾，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路线和处理阶级矛盾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革命的基本出发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远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论文中，在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的同时，就提出了区别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论点，并精辟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待革命态度的两面性，预见到他们在革命高涨中的分化和动摇。1927年发生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事变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个事变以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中心的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形成，资产阶级分化加深，民族危机激化。这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了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妥协性的一面，党确立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的政策，逐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就增强了革命力量，孤立了敌人，使得我国的民主革命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成為國內主要矛盾，資產階級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在這一時期，官僚資產階級仍然是人民的敵人，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工人階級如何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問題，就成為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確定正確的階級鬥爭路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的歷史條件，估計到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仍具有兩面性，在推翻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統治和剝奪了他們的生产資料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指出，對於官僚資產階級這種反動派要使用專政的方法，而解決人民內部問題，包括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則是使用“民主即說服的方法”。1950年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里，進一步說明了這種區別。

從開國以來，我國就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分析，在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問題，如無產階級專政、廢除資本主義所有制、實現社會主義國有化等問題上，創造性地採取了一面對壟斷的大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和強力剝奪，一面對中小資產階級按照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實行說服教育和贖買的政策，並且把兩者正確地結合起來。

我國的實踐證明，這種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這兩個方面是互相促進的。對大資產階級的專政和剝奪，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團結，又使大資產階級陷於孤立，有利於對他們實行專政。同時，採取這種辦法，有利於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和徹底消滅資產階級。採取這種辦法，不僅可以避免所有制變革中可能遭遇到的生產力的破壞和生產、交換的停滯，而且可以在改造中利用資本主義經濟，調動一切積極因

素,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在1957年,毛澤东同志根据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矛盾的精湛分析,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矛盾的学說。他明确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同他們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他們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中国阶级矛盾的科学分析,提出了矛盾轉化的理論,着重地提出了矛盾的处理問題。他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間的矛盾。这就是告誡大家,虽然由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有待于我們的主观努力,有賴于对矛盾的正确处理。也就是說,在可能条件具备之后,主观能动性就成为主要的了,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方針政策和采取正确的斗争形式就成为主要的了。

十余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經濟,使革命力量步步高漲,形成了“兴无灭資”的巨大优势。同时,在各项政治社会运动中吸引资产阶级参加,在反投机斗争、“五反”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中对资产阶级的違法行为和右派分子給以坚决打击,通过这些运动和斗争,教育了资产阶级分子,并通过改造的實踐和其他方式批判他們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并适当吸收他們的代表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工作;在經濟上采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的办法,并对民族资产

階級实行贖买，坚持統籌兼顧的方針，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措施，照顧他們的合理利益。通过这些，鼓励他們积极的一面，調动他們积极的因素，为恢复国民經济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又团結又斗争的原則，正确处理階級矛盾以贏得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的条件。

党对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是正确地掌握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証关系，正确地掌握了矛盾的不同地位，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毛澤东同志在階級分析上，从来不把經济因素、生产关系的因素孤立来看，也从来不把各个階級孤立来分析，而是如他在著名的《矛盾論》中所說的：“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联結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須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接着，他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間的联合和斗争为例，进行了分析，說明“必須研究这两党的階級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①毛澤东同志的階級分析方法，又从来不把剝削階級看成是一块鉄板，而是具体地分析它的每个阶层、每个集团，找出它的左翼和右翼，找出它的中間势力，找出工人階級可以爭取和調动的积极因素和必須給予打击的消极因素。这就是說，階級分析，不仅要看到階級矛盾的斗争性，还要看到他們之間的同一性，它們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可能性。毛澤东同志在《矛盾論》中又以无产阶级和統治階級、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例，說明这个問題。“‘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轉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

^① 毛澤东：《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08頁。

物本来是如此的。”^①毛澤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达到了高度的和諧的統一。

在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分化为壟断資本和中小資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买办資本与民族資本），資產階級分化为大資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买办階級或官僚买办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提供了无产階級革命的一个新的方面的經驗。

現代修正主义者認為：現代的壟断資本中已經有了“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因此，他們主張“階級調和”，反对工人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严重的階級斗争，反对无产階級革命与无产階級专政。我国对民族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共产党领导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武装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并对他們实行专政和沒收他們的生产資料为前提的。我国对民族資產階級实行和平改造，实质上是对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暴力剝夺的补充。我国以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則来处理过渡时期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我国在无产階級专政下階級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同現代修正主义者的謊言沒有絲毫共同之处。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中，要不要无产階級专政、要不要对反抗革命的反动資產階級实行剝夺和鎮压，是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反

^① 毛澤东：《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18頁。

共产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反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列宁說过：“只有承認階級斗争、同时承認无产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产者（以及大資产者）之間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从实践上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揭穿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动本質。

三

我国改造資本主义工商业的胜利，証实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下采取国家資本主义政策的正确性，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階級专政下国家資本主义的性質，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創造了适合我国条件的一系列国家資本主义形式，揭示了各种形式发展的規律性。

我国的国家資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經濟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經濟成分和資本主义經濟成分在不同程度上联系和联合的形式。它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在經濟上的联盟。这种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两个階級又联合又斗争的統一战綫的内容之一，体现着工人階級同資产階級之間的一定的階級关系。这种联系和联合的目的，正是为了逐步改造和消灭資本主义經濟，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經濟。因此，它是在我国条件下，进行階級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我国的經驗証明，作为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經濟形式，无产階級专政下的国家資本主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經濟成分的联系和联合，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页。

不能不是这两种经济成分的对立的统一物。社会主义成分的存在和不断发展，是国家资本主义比之私人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源泉，是它能够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在因素。没有这种内在因素，通过质的渐变方式来变革生产关系，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在我国国家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是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由企业外部进入企业内部，在企业中占领导地位，并逐步改造资本主义成分，最后完全代替资本主义成分而完成的。这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过程。这个斗争必然会以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和资本主义成分的消灭而告终，因为社会主义成分是以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为保证，以强大的不断发展的全民所有制的生产为基础的；在这个斗争中，社会主义始终是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

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停留在一种形式上。在我国，首先是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在国家管理、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群众监督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样，它们就不同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了。然后，由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企业外部的联系逐步发展为这两种经济成分在企业内部的联合，也就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逐步向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过渡。但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并没有消灭私有制，并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这种公私合营企业仍然不能停留不动，而必须向更高的形式过渡。这种更高级的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在一定时期对资本家实行定息。这种形式，虽然仍然保留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名义，但性质上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逐步过渡是一种客观的

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对立统一体本身的规定性。但是，这种过渡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自觉地掌握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掌握在我国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观点贯彻到这项工作中去的結果。由于国家资本主义中包含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盲目性的和具有对抗性的力量，就使得这种过渡不能不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满足于生产关系改造的某一阶段、满足于某些矛盾的暂时和缓，而必须逐步把它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在适当的条件下，还必须推动国家资本主义以跃进的形式向更高阶段发展，像 1956 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就是这样。否则，就会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损害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而在条件不具备时，又要防止国家资本主义超越目前形式过早的提高。这不仅在工人阶级中有时会出现某些急躁情绪，在资产阶级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目的冲击力量。例如在公私合营高潮以前，有些资本家为了“丢包袱”、为了把企业的损失或困难转嫁给政府而急于要求公私合营等。

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是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这种改造形式，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能发挥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限制它的消极性的作用；在这种改造中，不把资本家排除在生产之外，而能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因素、批判他们的消极因素。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关系的同时，组织、利用和发展这部分生产力，并对其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经济形式。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就成为实现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良好工具，成为教育资本家的学校。在我国的实践中，把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并

把它們互相結合起来，表現了党的高度領導艺术。我国的經驗証明，要使国家資本主义充分發揮它的这些作用，必須在企业內部建立强有力的工人監督，使社会主义經濟成分同企业内部工人群众的力量結合在一起。还必須采取一系列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思想意識上的措施和群众性运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的价格政策和利潤政策，既能限制剝削，又要保證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发动群众監督、打击抗拒改造和投机違法的行为，保护正当的經營；对資本家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对于国家資本主义的发展，又必須根据統筹兼顧的方針，全面规划，适当安排。在国家資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尤其是达到了高級阶段以后，还必須对它們进行企业改革（主要是用社会主义的經營管理制度代替資本主义的經營管理制度）和經濟改組（主要是改进生产力組織和生产力配置）。这种改革和改組，是改造生产关系的繼續。

在当前时代，国家資本主义已經成为一种普遍的經濟現象，不同性质的国家，都存在着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为統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我們必須区别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資本主义，絕不容許把这两者混淆起来。

在資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国家通过国家財政預算，兴建了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有些国家在某些工业部門实行了“国有化”；而国家通过軍事訂貨来調节社会生产，对一些私营企业的經濟活动进行行政監督和管理，則更是較为通行的作法。资产阶级辯護士們对这种情况大肆宣揚，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經濟学奠基人凱恩斯就竭力鼓吹这种“投資社会化”，认为更多地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消除危机，就可以“健全”資本主义制度。而現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替帝国主义效劳，蓄意混淆資本主义制度和社

會主義制度的界限，對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概念進行了無恥的歪曲。他們為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對這種現代經濟中最進步的生產關係，肆意加以譏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所有制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所有制的最低形式”，是“產生官僚主義和國家主義歪曲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對帝國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則大肆吹捧，認為這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因素”，是“突破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孔隙”，它的发展就是“加強社會主義因素”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作用”，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滅”。他們甚至無恥地斷言：“資本主義世界蓬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趨勢，極其明顯地證明人類正在通過各種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進入社會主義時代”。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進步的生產關係。它的出現，宣告了一切剝削制度無可避免的滅亡的命運，它代表了全人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最美好的未來。因之，全民所有制會遭到帝國主義者和它的走狗的反對，絕不是偶然的。

馬克思主義者也從來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它從屬於整個社會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換句話說，它所存在的國家的性質和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着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和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它只能是从屬於工人階級的國家，為工人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消滅資產階級的事業服務。同樣，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任何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只能是从屬於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剝削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服務。

在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和加強，絲毫也不意味着資本主義本質有任何變化。資產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

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国家既然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它就会如恩格斯早已说过的：“现代国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转成为集体的资本主义，愈益剥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顶点。”^①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就标志着垄断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结合的日益紧密，标志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控制的日益加深，使国家政权更好地为财政寡头的利益服务，而加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剥削。也正如列宁所说：“国家同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②

中国人民有着被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长期侵略和压榨的惨痛经验，也有被本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期统治和剥削的惨痛经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花言巧语是欺瞒不了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中国人民还有更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对于这种反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工人阶级起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它没收为全民所有，也就是归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才能使人民获得解放。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可能，才能使非垄断性的、中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可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有步骤有秩序的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商企业。

四

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胜利，实现并且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思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2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页。

想,創造了与国家資本主义的发展相结合的各种贖买形式。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贖买和国家資本主义結合起来的。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贖买,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錢来,而是工人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时候,也为資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潤,作为贖买的代价。

我国把贖买和国家資本主义結合起来,在国家資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創造了不同的贖买形式。这种贖买形式的发展,反映着不同阶段国家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反映着剩余价值生产的逐步受到限制;同时,贖买作为一种制度,又反过来对国家資本主义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发挥重要作用。当資本主义工商业轉变为在国家管理、国营經濟领导和工人群众监督下的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时候,它已具有国家資本主义的某些性质;但是,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还不明显,基本上还是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适应这种情况的贖买形式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所規定的允許資本家分取股息,并从盈余的余额中分取紅利。这种办法有利于鼓励資本投資于有益的生产事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剝削。当企业納入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以后,剩余价值的生产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工人已在不同程度上是为了完成国家計划任务而劳动,一部分已是为社会的劳动。这时采取“四个方面分配盈余”的贖买形式。它反映了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使盈余的較大部分实现为社会主义的积累和分配;同时也按比例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因而有吸引資本主义納入国家資本主义形式、鼓励資本家生产經營的积极性的作用。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实行定息制度,并輔以保留資本家的高薪和人事安排等。这种贖买形式使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脱离了对生产資料的占有和支配,失掉了資本的职能,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是,定息

作为一种制度而普遍实行，则又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全行业都实现公私合营时，才成为可能。并且，它是基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由国家统一调动各企业的人力、物力和积累的要求而来的，它从分配关系上，体现并促成了所有制的根本变革。

我国的赎买办法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不是生产资料的等价物，不是买卖关系。赎买的代价，总的说来，不决定于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是决定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赎买形式不仅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它实际上是根据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与要求而决定的。实行赎买政策，是我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即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继续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之一。它是党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方面。赎买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当国家资本主义处在初级形式的时候，分配利润的赎买形式是最恰当的。而当国家资本主义进入高级形式以后，定息的形式（和其它赎买形式如安排资本家工作、保留他们较高薪金等）又恰当地体现了新阶段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如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①因此，实行定息的办法，既能使资产阶级对于自身的变革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有充裕的安排时间，有利于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同时也给工人阶级提示了进一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步消灭他們的剝削根子和从政治和思想上消灭階級的革命任务。这种办法,无疑的也有利于調动资产階級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把对剝削階級的贖买,看作是无产階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革命最大胜利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說,贖买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并不是基本的。例如恩格斯曾設想过用紙币贖买的办法。我国在某种場合也实行过其它形式的贖买,如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对于沒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农具等实行贖买,对于反帝爱国、接受民主改革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在政治上給予安排,在生活上給予照顧等。但无論如何,在贖买过程中,所体现的总是工人階級同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它总是为工人階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不是个人与个人或国家与个人之間的关系,不是純經濟上的买卖关系。这种贖买关系的根据是工人階級专政和剝削階級接受改造的可能性。贖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归根結蒂决定于階級力量的对比。恩格斯在《法德农民問題》中讲到剝夺大土地所有者时就說过:“至于这一剝夺是否要用贖买办法实行,这大半不决定于我們,而决定于我們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决定于大土地所有者老爷們自己的行为。”^①列宁在讲到对资产階級实行贖买时,也是指“环境会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和对那些“决心为苏維埃政权服务”“对无产階級有益”^②的資本家而言的。

远在1950年,毛澤东同志在人民政治協商会議第一届全国委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439頁。

② 列宁:《論粮食稅》,《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頁。

員会第二次會議上就指出：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后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獻，那么在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們忘記的，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又說：“只要誰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內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貫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①毛澤东同志这些指示，也就是我国对民族資产階級实行贖买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贖买的涵义，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列宁那样認真地教导我們必須区别資本主义制度下和无产階級专政下的根本不同性质的“国家資本主义”一样，我們也必須区别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贖买”。无论是普魯东式的“工人贖金”，或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国有化”贖金，乃至近来某些資产階級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中給与地主階級的贖买債券，都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贖买沒有絲毫共同之处。这些“贖买”都根本不触及資本主义制度，而且差不多都是一种分期付款式的买卖关系。普魯东把“贖买”作为工人同資本家(或房产主)之間的个人关系，其目的是把无产階級变为手工业式的小資产者。这种“贖买”是一种反历史的反动的思想，早已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了。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国有化”，則不仅沒有改变資本主义所有制，反而强化了資本主义所有制，加重了对工人階級的剝削。如果說它和无产階級革命有关联的話，只不过是它加深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而已。

^① 毛澤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屆全國委员会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7頁。

五

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一直是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作为彻底消灭阶级的重要任务，作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来进行的。在革命实践中，創造了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和經驗，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說。

任何革命总是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消灭。毛澤东同志历来把改造被消灭阶级的成员作为彻底完成革命事业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的重要一环。1949年，当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把改造被人民打倒了的反动統治阶级的成员作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指出只有把“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①。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澤东同志更十分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不但把它作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彻底消灭阶级的一项任务，并且明确地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完成。要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使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經濟上脱离剥削者的地位，即改变他們的阶级地位，又要从根本上改造他們的政治立場，改变他們的阶级本性，使他們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識、意識又反作用于存在的辯証原理，毛澤东同志历来主張，为了发展革命事业，人人需要改造，而人是可以改造的。1937年毛澤东同志就說过：“无产阶级

^①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2頁。

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①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②

我国这样大规模、有计划地把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在历史上还是创举。这种改造又需要有怎样的具体历史条件才能保证它的实现呢？

这种改造，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是可能的。我国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首先依靠的一个根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开始就提出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③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这一原理进一步地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④

在我国与党的领导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壮大和巩固的同时，

-
-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页。
 -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
 - ④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页。

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之後，社會主義在我國已經成為無所不包的經濟體系。從民族資產階級來看，他們已經交出了自己的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剝削別人勞動的條件，即自己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對於組成這一個階級的成員來說，就意味着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的重大改變，即開始由一種經濟地位轉化為另一種經濟地位。在社會生活中，首先是人們的物質地位發生變化，然後人們的意識才可能相應地發生變化。根據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原理，我國社會經濟條件的根本性變化，資產階級分子經濟地位的變化，無疑都會作為重要的社會存在，對資產階級分子意識形態的改造，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有兩面性的階級，他們兩面性中接受共產黨領導、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性的一面，是我國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統一戰綫關係的重要依據，也是我國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政治思想改造的重要內在根據。只有在那種情況之下，工人階級才能够對他們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鼓勵他們積極性的一面，對他們消極性的一面進行批評和必要的鬥爭。十多年來，我國經過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教育和鬥爭，已經使資產階級分子不太勉強地接受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並在政治立場的改造上取得了很大進步。

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對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徹底消滅階級的革命任務所要求的，而且要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地改造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提高到革命各階段所要求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需要。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工人階級剛建立起自己領導的國家政

权和国营经济，又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而资产阶级分子这时还没有最后放弃他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还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这时期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主要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抛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在经济上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并且爱国守法，积极经营，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布之后，全面地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在所有制改造的问题上。这个时候，党和政府就要求资产阶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积极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认清大势，实现公私合营。这样，就可以在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以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集中地从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来。这时，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消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进一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了。政治立场是人们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人的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都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随着立场，就发生“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①因此，政治立场的改造是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首要和基本的问题。在资本家还掌握有生产资料的时候，他们的阶级地位还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向他们提出改造政治立场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变革之后，资产阶级分子只有首先改造立场才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50页。

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才能获得新的立足点来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認識，也只有改造立場，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由于社会意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識形态的变革比經濟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需要更长的時間，并且只能是逐步转变。这是意識形态本身运动的規律性所規定了的。我国对资产階級分子的改造随着企业改造和社会經濟基础变革后的要求而逐步深入，循序前进。这不但正确体现了意識形态革命的这种規定性，而且对于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間相互促进的辯証規律的极其高明的运用。

改造资产階級分子的途徑和方法，根本說来是两个，一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一是政治、思想教育。

实践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人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認識。因此，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就成为改造资产階級分子的基本途徑。但资产階級分子的改造不是自发地进行的，必須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教育，并且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就只有对资产階級分子进行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認識，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

当资产階級分子还占有生产資料的时候，对他們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各项政治运动，通过企业改組改造的实践、通过工人监督和對他們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和政策教育，把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結合起来进行的。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资产階級分子安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中，在公方代表直接领导和工人群众直接监督下工作和劳动，这就有可能采取业务与劳动的实践和政治思想教育相結合的办法来改造他們。这就是党所提出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統帅、以劳动和工作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崗位为基地，并且密切結合起来的方針。

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对于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是他们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不仅要求资产阶级分子认识他们所经历的这种变革的现实性,还要求他们认识这些变革的必然性,才能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接受进一步的改造。这就是说,要求他们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改造应该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这种发展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统一起来,理性认识又再回到实践。因此,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中,是不能离开实践的。

同时,政治思想教育对于实践的指导,理论对于自我改造的指导,在任何时候也都是极端重要的。当然,在资产阶级还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实践是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但是,也只有工人阶级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下,才能在他们的思想上揭露这种矛盾,使他们原来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头脑中树立一个对立面,才能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剥削行为,以至逐渐认识到剥削可耻。也只有在工人阶级对他们进行各种政策的教育下,才能使他们比较自觉地进行守法经营,积极完成国家的任务。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进入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阶段之后,政治思想教育就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这时,他们的工作和劳动客观上已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但是,他们主观上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意识又是同这种实践相矛盾的。这时,政治思想教育就不仅有揭露矛盾,提高自觉、促进改造的作用,还有直接指导实践的作用。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政治挂帅,加强学习,才能在提高认识与自觉的基础上,服务得好,改造得好。

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归根到底是一种自我改造。自我改造必须依靠自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

分子按其階級本性來說，對於改造資本主義立場是抵觸的。他們不可能本能地具備這種自覺性。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消滅，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開始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也開始獲得了改造其階級本性的客觀條件。同時，民族資產階級在其思想性格中還具有反帝愛國和可以接受共產黨領導、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因素。這些都使得在資產階級分子中培養政治思想改造的自覺性成為可能。重要的問題是要工人階級從各種實際生活、實際鬥爭和政治理論學習等各个方面進行教育，來給予他們以進步的革命的影響，幫助他們對於社會發展規律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對於進行政治思想改造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有比較深刻的認識。這樣，資產階級分子對根本改造的自覺性，就可以在他們中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地培養起來。

我國工人階級在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政治思想改造的過程中，所進行的一系列的教育和鬥爭，固然對於資產階級分子主要體現為外力的幫助，某些鬥爭在一定意義上還是一種強制力量。但這種外部教育與自我教育是相輔相成的。工人階級的這種教育和鬥爭，大部分是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式，通過資產階級自己進行的。這對於資產階級分子來說體現為他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黨領導和幫助資產階級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就是要把工人階級對他們的教育轉化為資產階級分子的自我教育。這個外部教育與自我教育對立統一的发展轉化過程，也正是培養和發揮資產階級分子改造自覺性的過程。在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進入逐步改造成為勞動人民一部分的階段之後，培養和發揮資產階級分子改造的自覺性，已成為工人階級對他們進行改造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黨所提出以政治思想教育為統帥，以勞動和工作實

踐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崗位为基地的方針,把外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結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把培育资产階級分子改造自覺性的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有人認為,我国民族资产階級先天就具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覺性。又有人認為,我国民族资产階級对社会主义改造不可能产生自覺性。因此,他們都認為培养自覺性是不必要的。这两种观点都是錯誤的。前者看不到剝削階級的改造与劳动人民的改造是属于根本性質不同的两个范疇,必須經過接受工人階級的改造才能进入自覺地改造。后者則把接受工人階級的改造与自覺地进行改造絕對地对立起来,看不到它們之間的可能轉化。毛澤东同志說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爭的結果,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①我們應該認為,资产階級分子的改造,自他教育是可以轉化为自我教育的,接受改造也是可以轉化为自覺改造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思想影响,馬克思主义先进理論的影响則是这种轉化的决定条件。上面这两种观点,都必然会导致否認工人階級的政治思想教育与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影响对培养资产階級分子自覺性的作用,这在实际工作上无疑都是有害的。

我国对资产階級分子的改造,是按照团结——批評——团结的原則,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进行的。适应改造的深入和发展,需要有不同的教育形式。

根据团结——批評——团结的原則,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改造资产階級分子,这是中国工人階級和民族资产階級进行階級斗爭的基本方法。这种改造工作,主要是結合各項政治运动,結合企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業改造的實踐，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通過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來進行的。但在一定條件下，還必須通過尖銳的階級鬥爭形式，如1950年和1952年對於資產階級不法行為的鬥爭，1957年對於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只有把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和嚴肅的批評鬥爭結合起來，才能逐步發展他們的積極性和破除他們的消極性，更好地改造他們。在1958年以前，中國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幾次由他們挑起來的激烈的大鬥爭，更對他們進行了大量的經常性的教育工作，才逐步地促使他們不太勉強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

在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特別在經過國民經濟大躍進之後，資產階級分子在政治思想上大有進步，改造的自覺性也有一定的增長，資產階級分子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成分逐漸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的教育、批評也可以更多地轉化為資產階級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評。和風細雨的批評方式也可以使用得更為廣泛。這就出現了“神仙會”的教育形式。“神仙會”所體現的和風細雨的精神和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正是在資產階級分子大有進步的情況下，根據黨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政策所採取的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有效方法。

但是，只要資產階級還存在，只要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還沒有最後完成，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總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複雜性，由於資產階級大部分人還處於動搖、反復狀態，這種鬥爭，也必然會出現高一陣、低一陣的情況。在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一部分人反抗革命、進攻工人階級的時候，工人階級必須經過尖銳的階級鬥爭，才能擊退這種逆流。在資

产阶级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出现严重动摇的时候，工人阶级也必须根据情况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才能端正他们的政治方向，巩固他们的改造成果。因此，更广泛经常地采用和风细雨的教育方式，并不排斥对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进行尖锐的斗争。只有根据阶级斗争形势，正确地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逐步引导和促使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大部分人走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我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通过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分化而逐步实现的，掌握这种分化的规律，是促进改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阶级不是一块铁板，而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经常运动和变化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在它的发展中，以及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分化。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分化，也就是一部分人向它的对立面不同程度的转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原来统治阶级中会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但是历史上资产阶级的分化大都是自发地进行的。我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则是自觉地利用这种规律，通过促进阶级的分化，大规模地逐步地把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以便彻底消灭这个阶级。

毛泽东同志说过：“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①党和工人阶级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中，就采取了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在资产阶级中进行细致的工作，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版，第900页。

培养了一批进步核心分子。这些进步核心分子，在所有制的改造中，发挥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桥梁作用。在政治和思想战线的斗争中，党和工人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左、中、右的新的分野，扩大和提高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力量，团结、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孤立和分化右派分子，取得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在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根本改造的工作中，党和工人阶级以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和自食其力为准则，通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就在资产阶级中引起进一步的分化。开始是一小部分人基本上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基本上站到工人阶级这边来了，有一些人并且已经站得比较稳，乃至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了。而以后，就会有比较多一些的人，以至更多的一些人，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基本上转变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以至转变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只要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转化为劳动人民是完全可能的。

* * *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一切活动的领导核心，党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艺术的党。它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实践，它是适合中国革命的条件和要求的。这个改造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2 023 2324 4

73469

十余年来，我国的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闡明的关于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相結合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并举的思想；关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調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等指导之下进行的。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光辉地証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思想的偉大和正确。

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还没有完成。由于还有外国帝国主义阴谋煽动，由于中国的反动势力还未最后消灭，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还不是一心一意地为着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同程度的动摇状态。在我国，彻底消灭阶级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任务。但是，沒有人会怀疑，在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并富有丰富斗争經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明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們是一定能够彻底地完成这个偉大的历史任务的。



